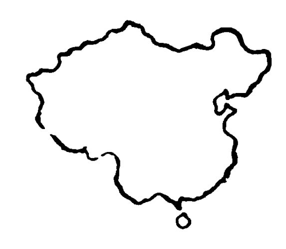
中國社會問題之社會學的研究

薩孟武著

中國社會問題之社會學的研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五日發行



精裝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平裝實價大洋八角

著者　薩孟武

發行者兼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底一九五號

本書據上海華通書局1929年版影印

中國社會問題之社會學的研究目錄

第一章　經濟問題……一
第一節　中國社會是甚麽社會……一
第二節　中國經濟的現階段……五
第三節　蘇俄的教訓……一〇
第四節　產業社會化的前提條件……一九
第五節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二三
第六節　中國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二八
第二章　政治問題……三一
第一節　民主政治之經濟的背景……三一
第二節　各國的先例……三六
第一項　英國的憲政……三七

第二項 日本的民權運動……四一
第三項 法國的革命……四三
第三節 中國經濟的現階段是不是合於民主政治……四七
第四節 中國有產階級能夠不能夠出來舉行民主革命……四九
第五節 中國民治的特質……五四
第三章 民族問題……五九
第一節 民族的形成……五九
第二節 各國的先例……六三
第一項 美國民族的構成……六四
第二項 德國的統一……六七
第三項 日本的中央集權……七一
第三節 中國人民是不是已經形成爲一個民族……七四
第四節 中國有產階級的民族意識……八〇
第五節 中國民族運動的特質……八二

第四章　文化問題……八七
第一節　文化之社會的基礎……八七
第二節　士大夫階級文化的特徵……九二
第三節　資本主義文化的特徵……九五
第四節　資本主義文化的破綻……一〇〇
第五節　資本主義文化的最後階段……一〇六
第六節　社會主義文化的形相……一一一
第七節　中國文化的將來……一一三
第五章　士大夫階級問題……一一七
第一節　士大夫階級的本質……一一七
第二節　士大夫階級的發生……一二一
第三節　士大夫階級在社會上的機能……一二六
第四節　士大夫階級的末路……一二九
第五節　士大夫階級的分裂……一三二

（附）官吏之商品化……一三八
（一）官吏商品化之意義……一三八
（二）官吏商品化之史的觀察……一四二
（三）官吏商品化之弊害……一四六
（四）官吏商品化破壞之方法……一四九
第六章　農民問題……一五四
第七章　人口問題……一七一
第一節　人口問題的重要性……一七一
第二節　馬爾薩斯的見解……一七五
第三節　人口和生活資料的實際情形……一七九
第四節　資本主義與人口問題……一八七
第五節　中國的人口問題……一九二

中國社會問題之社會學的研究

第一章　經濟問題

第一節　中國社會是甚麼社會

社會的發展，是有一定程序的，若據各國經濟史所示，則社會的發展過程，大約是由原始共產社會進爲奴隸社會，農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才達到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我們要知道中國此後的經濟組織，不可不先知道中國現在的社會情形。

中國現在的社會，是屬於那一階段的社會？若綜合各種學說看來，可分做二種，第一主張中國自秦以來，便是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第二主張中國到了現在，還是封建社會。第一說的錯誤，在於誤認交換經濟就是商業資本主義。其實交換經濟的目的，在於有無相通，長短相補；商業資本主義的目的，在於增殖資本，若用公式表

現出來則二者的區別，如次：

交換經濟 {
第一種物物交換時代：W（貨物）——W'（貨物）
第二種以貨幣爲媒介而行交換的時代：W（貨物）——G（貨幣）——W'（貨物）
}

商業資本主義：G（貨幣）——W（貨物）——G' { G（元本） G（利潤） }

第二說固然不十分錯，但我們也不能滿意。其中比較的可以使人滿意者，則爲E. Varga在一九二八年上半期世界經濟年報一書中，說明現在中國，是以單純再生產爲基礎，其中含有許多封建的要素，而屬於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他雖然主張中國現在的社會，還含着許多封建的要素，但同時他又指出中國現在的封建構造，又與歐洲中世的封建制度不同。他說：

『歐洲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是土地支配與農奴制度。土地支配制度，是領主由君主領受土地，而代代世襲之。但領主所得的土地生產物的分量，不是由領地的面積而定，乃是由農奴的人數而定。所以他們對于土地的支配，不是決定的，而對於勞動力的支配，則總是決定的。因此他們所登錄的不是領土的畝數，乃是人的口數。……

但在中國卻完全不同，封建制度固有的經濟的基礎之土地支配制度，雖然曾存在於過去，但因爲過去

各種的農業革命，早已完全破壞了，所以地主對於勞動力的支配，不是固定的，而對於土地的支配，則在中國本土，自遠昔以來，即是決定的。……在這個地域之內，老早就沒有像歐州封建制度那樣的土地支配制度和農奴制度。

爲免去誤解和曲解起見，一言以蔽之，中國雖有大土地私有，但卻沒有土地支配制度。雖然在中國亦有以地租而生活的階級，但是地租多數還是現物地租，這與封建的支配地租，亦不相同。且中國的土地所有，又常劃分爲數塊，用貨幣而行買賣。受到地租的階級，與歐洲封建制度的土地支配的貴族不同，就是不是特權階級，而是與商人階級和高利貸階級，有密切的關係。人們由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而得到的利益，與因爲供給國家使用而蒐集起來的財產，自古以來，常投於土地之上。只要有了貨幣，便可求得土地，或加入地主階級的隊伍。這種情形在歐洲封建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

現今中國雖然尚有農奴制度；但這個農奴制度，卻不帶有眞正封建的性質。其經濟的本質，不像封建制度那樣，領主——他雖支配許多的土地，但他所支配的勞動力，卻是很少，——用暴力把勞動力縛束於土地之上。在中國因爲勞動力的過剩，所以不要採取這個强制。中國的農奴制，是由下述的事情而發生，即窮貧的佃農，因爲土地的缺乏，乃束縛於地主，又因爲常向地主借債，以致於本來地租之外，不能不以工資的大部分，歸於地主，由是在事實上，逐把自己的身分引渡於地主，而舉其全部身靈，隸屬於地主。但是這個農奴制度之

經濟的基礎，又與眞正封建的農奴制度有別，在某種意義上，且可說是相對的經濟的基礎。

E. Varga 把中國現在的封建制度的特徵與歐洲的封建制度區別了之後又接着說道：

「我們現在再回來講歐洲及中國的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歐洲的農業是乾燥農耕，故其各個的土地支配，可以明白的與鄰接地區劃境線，而有獨立的可能。反之，中國農業自古以來，卽以灌溉農耕爲主，因此，水利經濟的組織化，是死活問題，這個水利經濟，只有集合大小的地域，共同協力，而後才有可能性。……所以雖含有封建的要素，但其性質又與歐洲的封建制度不同。而歐洲封建制度的國家與中國比較起來，其國家的機能，亦有很大的差別。在封建時代，本來沒有國家這個機關的。國家是分割爲個個土地支配制度，其封建的領主，則常領率其軍隊，於統治者指揮之下，而作軍事行爲或互相戰爭。行政司法便是土地支配制度的機能。反之，在中國，則國家的機能，乃擴張於全部領域之上——就是分配給全部領域內的米，組織幷監督最重要地方的水利經濟等。因此，所以中國又有官吏這個特殊階級，他們受過考試，而爲帶有封建性質而又具有學識的官僚貴族階級。但是歐洲的封建領主，則普通大約不會讀書寫字，他們除土地支配制度之外，對于國務，幾乎是不放在心上的。」

Varga 區別兩者特徵之後，對於中國現在的社會，又斷定爲有二種特徵。

「第一，中國之社會制度，現在還是由前資本主義的制度，繼續轉換爲資本主義的制度。但是這個轉換

程，不是由於土民自己來發展，乃是在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下，而進行的。就是當中國社會轉換爲資本主義的時候，同時又使中國屈服於外國資本之下，而轉換爲帝國主義列强的殖民地。

第二，這個轉換又行於資本主義沒落的時候。就是資本主義在地球上，已經崩壞其一部，而帝國主義者在世界市場上，又因爭奪販路，而作鬥爭，由這個鬥爭，又謀世界的再分割，而將爆發爲新戰爭的時候。（參看樊仲雲編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第一章）

Varga 這樣的解剖中國社會，我是很同意的，所以暫借 Varga 之筆，以說明中國的現社會。

總而言之，中國的現社會，是在資本主義將次沒落的時候，因爲帝國主義的壓迫，由封建社會而過渡爲資本主義社會。

第二節　中國經濟的現階段

中國社會，既然包含了封建的要素，那末，中國經濟的現狀，自然可想而知了。關於中國經濟的現狀，我在三民主義政治學中已用數字說明，現在可以不必再提。其應當鄭重言明的，則爲中國的經濟，還是地域經濟，而非國民經濟，我們不看別的，只看下列各種情形，便可知道：

一　各地有各地的貨幣。

二　各地有各地的度量衡。

三　各地有各地的風俗習慣。

四　各地有各地的關稅障壁。

以上各項，我們不必說明，一切事實已經排在我們的眼前，替我們來說明了。因爲經濟還是地域經濟，所以全國不能由經濟的連鎖，而結合爲一體。其結果則在人民方面，尙有種族思想，部落思想，而不能統一爲一個民族。各省同鄕會的組織，就是這個思想的表現，所謂聯省自治，也不外出於排斥「外江人」的意識。人民方面既然沒有民族意識，那末政治上自然容易爲軍閥所乘，而呈出割據的現象了。民國以來，所謂直係皖係等等都是以同鄕爲基礎，糾合同鄕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之上，爭奪權利的。這個現象，不是種族思想的表現而何，不是部落思想的表現而何？在政治上是割據的局面，在經濟上又有地域經濟與其相適應，那末封建制度，自然更不容易打破了。

以上只說明中國經濟，是地域經濟，至於中國產業的幼稚，則我們若把中國與歐美列强比較一下，便可明白。

中國的領土，人口，及其富源，差不多都甲於各國，所以中國產業若與歐美各國的產業比較起來，應該勝過數倍而後可。但在實際上，則中國產業，尙甚幼稚，我們若看下列數項，便可知道。

第一，鐵路是一國產業的基礎，一國有若干的鐵路，實可表示該國資本主義發達到如何程度；中國與資本主義國的鐵路可比較如次：（一九二四年日本內閣統計局調查）

國名	延長哩	延長哩	面積每平方粁有若干(粁)	人口每萬人有若干(粁)
英國	三九、〇一五	二四、二三四	一五、三	八、八
美國	四〇二、五八四	二五〇、一五五	五、二	三八、一
法國	五三、五六〇	三三、二八一	九、七	一二、八
日本	二二、〇六〇	一三、七〇七	三、三	二、六
意國	二〇、六六四	一二、八四〇	六、七	五、三
德國	五五、五九九	三四、五四八	一一、九	八、九
俄國	六七、七九七	四二、一二七	〇、三	五、一
中國	一一、五四四	七、一七三	〇、一	〇、三

第二，紡織工業是輕工業，工業的重心，所以牠的發達程度，又可表示工業化的程度。中國及列强的紡織工業的發達狀況如次：（一九二七年世界紡織聯合會調查）

國名	錠子數(千錠)	建設中(千錠)
英國	五七、五四八	二四一

美國	三七、三七四	—
法國	九、五二二	八五
日本	五、六八〇	一五〇
意國	四、九五一	五七
德國	一〇、九〇〇	一七〇
俄國	六、九四一	一〇〇
中國	三、四三三	八

第三，工業化的程度，又可以使用動力的程度來測量。動力可以分做兩種，一是水力，二是火力，火力的材料便是煤炭，所以由煤炭的產額，又可推測工業化的程度。中國和列強的煤炭產額可比較如次：（一九二四年日本內閣統計局調查）

國名	煤炭生產額（千噸）	煤油生產額（千噸）
英國	二七一、四〇五	—
美國	五二〇、二七〇	一〇一、九九一
法國	四四、〇一〇	七一
日本	三二、二五五	一六六

德國	一一八、八二九	五七
俄國	一六、一九九	六、一八九
中國	二〇、九〇〇	—

第四，再從重工業觀察，重工業的材料是鐵，所以由鐵的生產額，便可知道重工業發達到如何程度。中國與列強的鐵生產額可比較如次：（一九二五年國際聯盟調查）

國名	銑鐵（千噸）	鋼鐵（千噸）
英國	七、四二五	六、三三六
美國	三一、九一〇	三六、九八八
法國	七、六九三	八、四七二
日本	一四七	九三六
德國	七、八一二	一〇、一七七
俄國	七六〇	一、二八九
中國	三八一	三八〇

第五，一國工業化的程度，又可從機器的消費來推測。我們中國固然不敢與英美德法各國相比較，若與其他各國相比較，則可列表如次：（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二五年的機器消息量德國機器聯合會調查）

國名	消費額(單位百萬馬克)		對於世界總消費額的百分比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五年
拉丁亞美利加	三五八	五〇五	二、六	二、三
日本	一〇九	三一四	〇、八	一、五
中國	二〇	五四	〇、二	〇、二
印度	一三九	二二五	一、〇	一、〇
亞洲其他部分	七五	七六	〇、五	五、四
澳洲	一五二	二九二	一、一	一、三
南非聯邦	六四	九九	〇、五	〇、四
非洲其他部分	四三	六八	〇、三	〇、三

由這數項看來可以知道中國產業如何幼稚了，在這樣幼稚的產業基礎上，果然能夠實現社會主義麼？

第三節　蘇俄的教訓

誰都知道俄國是社會革命的先驅，誰都知道俄國的社會革命已經失敗，所以現在試述蘇俄社會革命的經過如次：

俄國的經濟組織，與西歐各國比較起來，是很落後的，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已經由萌芽而發展的時候，俄國才於一八六一年解放農民，而開始其資本主義化。並且俄國的資本主義，照其本質說，亦與西歐各國不同：在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是發生於民間，而俄國的資本主義，則最初乃由代表沙皇的國家來實行。詳細說來：彼得大帝因羨西歐工業的發達，乃注其全力，獎勵工業，用其公帑補助貴族和商人設立各種公司。到了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又由軍事上的必要，布鐵路網於全國，而設立軍需品工場，由是俄國的資本主義愈見發達。因此之故俄國的資本主義，當其「開步走」的時候，便是大資本主義。由大資本主義所製造出來的階級關係自然只有大資本家與無產者的對立，沒有甚麼中產階級在中活動。俄國社會的不健全，這可算是原因之一。

俄國資本主義的第二特徵，則為外國資本源源輸入而致全部的產業，都受外國金融資本的支配。其中資本輸入於俄國最多的，便是法國。

這二種特徵很與中國相似，中國的工業化，也是由國家開始，如鐵路，如漢冶萍公司，都可視為中國最初的資本主義的經營，至於外國金融資本的勢力，則大家已經明白，不必再贅。但俄國能夠由產業幼稚的國家，一躍而進入共產主義的革命者，又有一個重大原因。這個原因，便是農民渴望土地。

如前所言，俄國於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但所解放者不過表面上的名義而已。其實農民對於地主的土地，乃當支給賠償金。農民無力支給，則由國家代出，但農民當於五十年內，用年賦的方法還償國家。若並此亦不可

能，則土地之所有權，仍在舊地主的手上，農民只可占有其一部，而有用益權，對此則當於二十年內，年出十分二以下的租金給地主。所以農奴制度雖然破壞了，而農民則由農奴變爲債奴。現在試把解放當時的分與地面積和農民人數，列表如左：

土地所有者	一八六〇年男農奴人數	分與地總面積（臺利聽）	男農一人所得的土地
地主私有地	一一、九〇七、〇〇〇	三七、七五八、〇〇〇	三、一七
國有地	一〇、三四七、〇〇〇	六九、七一二、〇〇〇	六、七四
皇領地	八七〇、〇〇〇	四、二六〇、〇〇〇	四、九〇
合計	二三、一二四、〇〇〇	一一一、七三〇、〇〇〇	四、八〇

這樣看來，可以知道除國有地的農民每人可得六、七四臺利聽，尚可養活其一家之外，其他農民實不能養生送死了。在這樣情形之下，農民自然渴望土地，而欲暴動了。到了一九〇五年俄國土地的分配，大約如次：

農民分與地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臺利聽（每人只有三、一臺利聽）
地主〃有地	一〇一、七〇〇、〇〇〇
國有地及皇領地	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寺領地	八、八〇〇、〇〇〇

俄國土地分配的不平均，觀上表便可知道。反之，中國土地的分配，則如次：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十畝以下戶數	一七、八〇五、一二五	一七、九一四、二三一	一一、八二九、一二三
十畝以上戶數	一三、二四八、四七四	一一、三〇三、五七〇	八、二八一、一八七
三十畝以上戶數	一〇、一二二、二一四	六、七一二、三六六	四、九五九、八九九
五十畝以上戶數	五、三四八、三一四	四、一三七、一三六	三、〇二二、一〇一
百畝以上戶數	二、八三五、四六四	二、二七三、三五五	一一、四五六、二一九

可知中國土地的分配，尙甚平均，土地的分配，旣甚平均，則我們希望農民暴動，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俄國的階級旣然尖銳化，則社會革命自然有可能性。不過社會革命不但要破壞舊經濟組織，且須建設新經濟組織。舊經濟組織的破壞，雖然可由無產階級的暴動而實行，至於新經濟組織的建設則須以產業的發達為前提。因此，我們更須觀察俄國在革命前產業的情形。

俄國於農奴解放之後，產業年年發達，今試將解放前後的大工廠發達的形態，列表如左：

年次	工廠數	勞動者人數	生產額（千盧布）
一七六五	二六二	三七、八六二	五、〇〇〇
一八〇一	二、四二三	九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一八二五	五、二六一	二〇二、〇〇〇	四六、五〇〇
一八五四	九、九四四	四五九、六三七	一五九、九八五
一八八一	三一、一七三	七七〇、八四二	九九七、九三三
一八九三	二二、四八三	一、四〇六、七九二	一、七五九、四三一
一八八六	三八、四〇一	一、七四二、一八六	二、七四五、三四五

到了一八九七年施行金本位，產業愈益發達。至一八九二年止，股份公司資本共九億九千九百萬盧布。一九〇二年，又增加爲二十一億盧布。若由其生產方面說，則一八九〇年，全俄工廠生產共十五億盧布，一九〇〇年增至二十五億乃至三十億盧布。工業勞動者亦由一百四十萬人增至二百四十萬人，我們現在再把一九〇五年的產業情形列表如次：

鑛業及工業	經營數	勞動者人數 單位千人	勞動者人數 百分比
勞動者一〇人以下	一七、四三六	五六、〇	二、五
一〇——四九	一〇、五八六	二三六、五	九、二
五〇——九九	二、五五一	一七五、二	六、八
一〇〇——四九九	二、七七九	六〇八、〇	二三、八

五〇〇—九九九	五五六	三八一、一	一四、九
一〇〇〇人以上	四五三	一、〇九七、〇	四二、八
合計	三四、三六一	二、五六二、八	二〇〇、〇

由此觀之，可知俄國的大工廠是占優勢的地位了，若就其收益方面說，則（一）企業有一千乃至二千盧布的收益的共三萬七千（占全企業之四四・五％）其總收益共五千六百萬盧布（占全收益之八・六％）（二）企業有五千盧布以上的收入的共一千四百，（占全企業之一七％），其總收益共二億九千一百萬盧布（占全收益之四五・％），可見俄國的利潤如何集中於少數的大經營了。因此貧富對立，愈見厲害，終而勃發為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此外，俄國的產業發達程度，又可由鐵路所運輸貨物的分量推測之。

年次	運輸線量（單位千波特）
一八九五	二、九九三、五四三
一八九六	二、七四六、八二三
一八九七	二、九二四、一一二
一八九八	三、二七七、一九六
一八九八	三、六九七、六二八

一九〇〇	三、九五八、三八五
一九〇一	三、九九一、一八三
一九〇二	四、一七三、〇〇〇
一九〇三	四、五五九、三三六
一九〇四	四、五六九、五四一
一九〇五	四、二一六、四二七
一九〇六	四、九一五、九〇二
一九〇七	五、二〇〇、二一九
一九〇八	四、二四七、七五六
一九〇九	五、六一九、五九〇
一九一〇	六、〇五八、七四〇
一九一一	六、八一〇、一八八
一九一二	七、一〇九、七一八
一九一三	七、九八一、〇一九

在鐵路運輸的貨物之中，最多的是穀物，其次是煤炭木材，鋼製製品，砂糖纖維工業品，棉花農具，以及其他機器。但穀物則逐年減少（一九〇三年占全部之二二•%，一九一三年則減至一六•三%）反之，製造工業

品，則逐年增加，可知俄國漸由農業國而變爲工業國了。

對外貿易亦逐年增加如次：

年次	輸入	輸出
	金盧布（單位百萬）	
一八〇二	四〇、九	四五、八
一八〇三——一八一〇平均	三八、六	四〇、八
一八一一——一八二〇平均	三八、一	五三、五
一八二一——一八三〇平均	五一、一	五八、三
一八三一——一八四〇平均	六三、四	七六、二
一八四一——一八五〇平均	八五、二	九七、二
一八五一——一八六〇平均	一一三、一	一二三、五
一八六一——一八七〇平均	一八四、五	一八四、九
一八七一——一八八〇平均	三六[illegible]、七	三三九、三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平均	三四九、九	三九二、一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平均	三〇四、〇	四一五、四
一八九六	三九三、二	四五九、一

一八八七	三七三、三	四八四、四
一八九九	四一一、七	四八九、六

國內貿易的興隆，自然可使國內商業化，而助資本主義的發達。

俄國在這樣產業基礎之上，實行革命，革命當時，是以共產主義相標榜，其結果如何，實可供爲我們的教訓，所以不惜詳細說明一下。最初則把國立銀行移於新政府之手，其次又宣言一切銀行都歸爲國有。其後的進行則可列表如次：

一九一八年二月：沒收商船及穀倉爲國有。

五月：沒收製糖業爲國有。

六月：沒收煤油業爲國有，火柴，珈琲，香料，纖絲等的商業，以及外國貿易，歸於國營。更宣布凡工廠公司有一百萬以上之資本者，都編入國有財產之內。

一九二〇年六月：凡企業使用機器而有五人以上的勞動者，都收歸國有。

十一月：使用十人以下勞動者的小工業及家內工業亦收歸國有。

由是全部工業之十分之九，都集中於國家了。澈底的確澈底！但其結果如何呢？人民不肯努力了！生產力破壞了！飢饉發生了！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所開的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不能不變更政策，而決議實行新經濟政策了！

由新經濟政策的實行，俄國經濟又由共產主義而退回爲資本主義，牠的進行如次：

一九二一年三月廢止農業的國家監督及農產物國有，並恢復小工業及農業爲個人的經營。又改農產物的強制徵收爲食糧現物稅，並許可個人經營商業。

十二月二十人以下的小企業，及事實上尚未國有化的大企業，皆歸私人經營。

一九二三年三月：把國營大企業的一部，用所有權讓與的形式，移爲個人經營。

形勢逆轉了，個人資本主義又開始了，俄國產業的發達，勝過我國數倍，然犧牲了無數的生命，尚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可知經濟組織，是比鐵還硬的，時機未至，即欲實行社會主義，一定失敗。但是何以社會主義不能實行呢，我們更非說明不可。

第四節　產業社會化的前提條件

任何組織，不是從空掉下來的，他能夠成立於世上，一定先有成立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雖費盡功夫，也不能創造出來。資本主義所以能夠發生，乃是因爲在封建制度之下，採用了新技術，生產力天天發展，由是逐蓄積了原始的資本；又因爲人口的增加，而有了過剩的勞動力；更由社會上種種的必要，而發明了各種的機器，因此才產生資本主義，這是脫胎於封建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但資本主義發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在牠的體內，又培

養出新社會的種子。何以呢？

第一，資本主義的生產先由機器的採用，打破一切手工業者，而集中資本於少數資本家。在這些少數資本家中，又由自由競爭的結果，呈出大魚吞小魚的現象，使資本愈見集中。即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機器發明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使出生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占了人工，有機器的人，便把無機器的人的錢，都賺去了。』「大資本家還能吞併小資本家，好像大魚吞小魚一樣。弄到結果，社會只有大資本家和勞動者兩種人。換個話說，就是工商業發達之後，祇有大富人和窮人兩種人。」一切資本既然集中於少數資本家，則把這些資本移歸社會公有，自然很容易實行的。反之，資本若尚散在於各人的手上，則不但不容易把零碎的資本移爲公有，而且各人有多少資本，也不容易調查出來。

第二，資本主義愈發展，則企業形式，由個人經營，變爲股份公司。這個時候，資本雖在少數資本家的手上，利益雖歸於少數資本家的囊中，但股東所支配的，不過股票，並不是企業本身，企業的進行，則由高級勞動者管理，並由低級勞動者實行。所以資本家和企業，已沒有甚麼直接關係，換個話說，資本家在經濟生活之上，已經沒有甚麼人的作用。這同小規模企業的時代的營業主相較，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因爲小規模的營業主，常自己指揮企業的進行，且由自己的利己心，使營業能夠天天發展；反之，大公司則不過委託經理，按照章程進行，所以把大公司移爲公有，不過更換股東，即變更少數人的股東，而使大衆同爲股東罷了。因此，大公司移爲公有，是很容

易實現的。

第三，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由勞動大衆自己管理產業，所以勞動大衆須有管理的能力，而後可。如前所言，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大規模的生產，因爲牠是大規模的生產，所以勞動大衆也隨着資本的集中，而集中於少數的工廠或公司之內。他們既有接觸的機會，遂生出共同感情和共同意識，而有團結的可能。並且資本主義的生產，就其全部說，雖然是無政府的，是無組織的，若僅就其局部說，則秩序整然，一絲不亂，勞動大衆既然受了資本主義的訓練，自然可以養成組織的能力。這也是產業社會化的必須條件之一。

第四，社會革命與過去政治上的革命，完全不同。過去革命的對象，是政府，政府不過代表極少數搾取階級的利益，而孤立於民衆之外，所以民衆可用暴力，顚覆政府。反之，社會革命，則須變更與民衆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經濟組織，所以非等到民衆生活已經漸次變更之後，實在不容易變更。原來在資本主義之下，政府不是搾取階級的本身，乃是搾取階級的一個機關，即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現在各國表面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所以社會革命，非以政府爲對象，乃以搾取階級爲對象。推倒政府雖可利用暴力實行，推倒榨取階級則暴力未必有功効，因爲榨取階級的人數尙多，換個話說，如果資本尙未集中於少數人，則無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這樣的大力量，能夠剷除比較的多數榨取階級。我國共產黨的力量，不可謂不大，其殘殺的資本家，不可謂不多，然據各種調查，則亦不過限於大都市方面，至於其他各地，則多數的資本家，尙殘存着。由此可

知資本若不集中，雖用虐殺的手段，也是沒有效果的。

這樣看來，產業社會化的條件，乃是孕育於資本主義的母體之內，資本主義不發達，產業社會化是無從實現的。那末中國要想產業社會化，必須先發展資本主義麽？這個問題，除應該不應該之外，倘有可能不可能的疑問，因此我們更要討論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第五節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現在經濟是世界經濟，一國的經濟情形，不能不受他國經濟的影響。現在世界經濟是屬於如何階段呢？若據各種事實所示，則如 Varga 所說：是資本主義將次沒落的時候，是帝國主義者在世界市場上，因爲爭奪販路，而作鬥爭，由這鬥爭，又謀世界的再分割，而將爆發爲新戰爭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我們中國要想發展資本主義，果有可能性麽？

固然國內有不少的學者主張其可能。其惟一理由，大約如次：就是帝國主義者的產業，可以分做二種階段。第一階段是以輕工業爲中心，他的出產，主要是日用必需的消費品，這個時候，帝國主義者一面當以殖民地爲原料供給地，同時又以殖民地爲商品的銷售場。帝國主義者要使殖民地永久爲其原料供給地，必使殖民地本身，沒有利用其原料的機會；要使殖民地永久爲其商品銷售場，必使殖民地本身沒有生產商品的能力。因此，第一

階段，帝國主義常用種種方法防止殖民地的工業化。到了第二階段，則資本主義國的主要工業，已由輕工業進爲重工業，又由產業資本進化爲金融資本。帝國主義者既注重生產鋼鐵製的機器，那末，必須殖民地開始工業化，而後才會發生機器的需要，所以在第二階段資本主義的國家，爲維持和發展其重工業，對於殖民地的工業上亦不純取抑制的政策。而且帝國主義者既由產業資本，進爲金融資本，則爲投資起見，亦不能不希望殖民地工業化了，因爲殖民地需要資本的程度，是和工業化的程度，以同一比例而增加，工業化越發展，所需的資本亦必增加。帝國主義者要輸出其過剩的資本，自然不願阻止殖民地的工業化了。

這個主張，是有相當理由的。不過一切帝國主義者，都已開始其資本主義的第二階段麼？而開始的程度，又是一樣麼？我現在試由貿易方面先觀察那一個帝國主義者與中國最有關係。據海關稅務司的計算，一九二五年中國對外貿易，如左：(單位百萬海關兩)

國別	輸出	輸入	合計	百分率
英國及其殖民地	二〇一、三	三三六、九	五三八、二	三〇、九
日本及台灣朝鮮	二二一、一	三〇九、八	五三〇、九	三〇、五
美國及布哇菲律賓	一四七、九	一四七、九	二九五、八	一七、〇
法國及安南	七二、八	二八、二	一〇〇、一	五、八
德國	四八、〇	一三、五	六、一五	三、五

荷蘭	二〇、九	四八、五	六九、四	四、〇
德國	一六、四	三二、五	四八、九	二、八
其他	四八、〇	四七、八	九五、八	五、五
合計	七七六、四	九六五、一	一、七四一、五	一〇〇、〇

由這一表看來，可知與中國最有關係的帝國主義者，是英日美三國了。我們現在再觀察她們三國輸入中國的貨物，到底是輕工業居多麼，抑或重工業居多？（單位百萬海關兩）

日本的輸入（除朝鮮外）

產物　數目　年數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紡織物	一一二、九	一二三、三	一六一、八
砂糖	一〇、二	一九、八	二二、七
煤炭	八、五	一一、四	二一、二
魚及魚製品	八、三	一〇、三	一〇、二
金屬製品	七、〇	八、二	八、四
米及小麥粉	二、九	一、二	七、七

紙	五、六	五、三	六、七
化學製品	四、五	五、三	六、二
運輸及電氣材料	四、○	四、三	四、一
建築材料	二、一	二、七	四、○
機器	一、九	二、三	二、○
其他	四三、一	四○、七	四三、九
共計	二一一、○	二三四、八	二九九、八

美國的輸入

產物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鑛物性油	四四、六	四三、一	五二、二
烟草及煙草生產物	三一、四	四三、○	二九、五
金屬製品	一二、四	二三、四	八、八
紡織物	三、八	五、九	八、○
小麥粉	一六、四	一八、○	五、一
化學製造品	五、一	五、二	四、七
機器	四、三	四、八	二、九

其他	三六、五	四七、六	三一、三
共計	一五四、五	一九一、〇	一四二、五

英國的輸入

產物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紡織物	七三、一	七〇、八	五七、七
金屬製品	一一、〇	一〇、一	七、三
化學製造品	四、五	五、四	五、五
機器	一〇、四	六、八	五、一
煙草製品	三、八	三、九	三、四
運輸電氣及電氣材料	三、一	三、四	三、六
紙	二、[illegible]	三、六	一、三
其他	一二、二	二二、〇	一〇、八
共計	一二〇、四	一二六、〇	九三、一

我們若看上列三表，便可知道英日二國輸入中國的貨物，仍以紡織物爲最多，英國雖年有減少的傾向，反之，日本及美國，則年年增加起來。至於機器一項，由英國輸入的，年年減少，由日本及美國輸入的，雖然於一九二

四年稍見增加，但於一九二五年又復減少。由此可知帝國主義者與中國通商，仍舊以輕工業爲中心。

這樣的證明，我們還不滿意，我們更要看帝國主義者本國的輕工業是否年年退步。如果年年退步，則輕工業自然要讓給產業後進國去經營；如果不然，則產業後進國受了產業先進國的壓迫，何能發達起來。據國際統計年鑑所載，日本紡織錠子的增加如左：（單位一〇〇〇）

年次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錠子數	二、三〇〇	四、一二六	四、八二五	五、二九二	五、五七[illegible]

就是輸出紡織物於中國最多的日本，她的國內紡織業，竟然年年發達起來，她的紡織業既然年年發達，則爲維持自己的市場起見，又何能不壓迫中國輕工業的發展呢？

我們再看日英美三國所消費的棉花罷：（日本銀行調查單位千俵，每俵約二四七八磅）

國名	一九二〇—二一	一九二一—二二	一九二二—二三	一九二三—二四	一九二四—二五	一九二五—二六
日本	一、七〇五	一、九六五	二、一〇〇	一、八〇〇	二、〇四〇	二、四〇〇
英國	二、一〇〇	二、八〇〇	二、七五〇	二、七五〇	三、一五〇	三、〇〇〇
美國	二、〇九一	二、三二八	二、六八九	二、〇九八	二、三三〇	二、四九六

由上表看來，亦可知道帝國主義者的輕工業，並不年年減少，而乃年年發達了。

這樣一來，則上面所述的論者之言，又可反證中國工業化的艱難了。質言之，惟帝國主義者，不輸出紡織物，而輸出機器於殖民地，而後殖民地的產業，才能發達。現在日英美三國所輸入於中國的貨物，仍舊是以紡織物爲中心，至於機器，則不過占極少數，那末中國產業，又何能發達呢？

第六節　中國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

要達到產業的社會化，須以大規模生產爲前提條件，然在帝國主義鐵蹄之下，中國產業又沒有發達的希望，那末，要怎樣辦呢？

這個問題，的確是極困難的問題。惟一解決的方法，恐怕除了打倒帝國主義之外，沒有別的方法罷。所以孫中山先生說：『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着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

但是打倒帝國主義又是一種極艱難的工作。打倒帝國主義，不是空論的問題，乃是實力的問題。沒有實力，空喊打倒，不但不會發生効果，而且可引起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而使中國愈陷入難關。然既如前所言，帝國主義不打倒，中國經濟問題無從解決，所以我們與其坐而待亡，不如與帝國主義者拚個彼死我活。

但是與帝國主義者拚命，也不是能夠容易成功的。何以呢？帝國主義的侵略與過去歷史上各種侵略不同，過去的侵略不過是政治的侵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則爲經濟力的侵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經濟，已經埋了數十年的根蒂，不但他們的商品源源輸入中國，而且他們的產業，又繼續地在中國內地發達，我們吃的穿的，看的，幾無一不與帝國主義者有關係，而中國無數的產業又直接或間接受帝國主義者金融的支配。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何能於一舉之下，驅逐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勢力。

僥倖現在世界已經變動了。一面各地弱小民族有團結的可能，同時帝國主義者有自相火拚的形勢，在這當中，我們若能乘着帝國主義者火拚的時候，糾合弱小民族，大大地作一番民族革命，那就何怕帝國主義者不會打倒。

何以知弱小民族有團結的可能呢？第一，殖民地是帝國主義者的銷貨場，所以帝國主義者每利用教士，提高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文化，而增加他們的慾望，使他們對於文明國的商品能夠需要。然慾望與知識乃有幷行的關係，慾望既然增加，知識也必隨之而進步，由是弱小民族的民族意識漸次明瞭，而變成帝國主義者的強敵了。第二，殖民地又是帝國主義者的投資地，然而現代產業乃是大規模而又有組織的。因爲是大規模，所以多數工人可聚會一地，彼此之間發生了共通感情而有團結的機會。因爲是有組織，所以工人也受其感化，而養成一種組織的能力。帝國主義者前用資本主義侵略殖民地的弱小民族，現在殖民地弱小民族，卻由資本主義的作

用養成民衆意識和組織能力。所以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去打倒帝國主義，不過是時間問題。（參看拙著三民主義政治學一七九——一八〇頁。）

[illegible]帝國主義者要怎樣火拼呢？帝國主義者要延長自己的生命，一面不能不侵略弱小民族，以作銷貨市場，[illegible]關稅壁壘，以獨占市場的利益。但是現今世上已經沒有再可侵略的殖民地了，[illegible]所有主的變更，將甲所有主的殖民地移屬於乙所有主。換句話說：此後帝國主義者要想發展，只有犧牲他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由是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的鬥爭，遂變成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火拼，從而各帝國主義者不能不極力擴張軍備，而呈出軍國主義的現象。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便是其結果。大戰閉幕之後，發生了世界的新分割，然世界新分割之後，各帝國主義者又復擴張軍備，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是迫在眉睫的。（參看拙著三民主義政治學六九——七六頁。）

此外，尚有一個原因可以促成帝國主義的崩壞。這個原因便是帝國主義者國內的階級鬥爭。關於階級鬥爭，我們只看各國無產政黨的發達和同盟罷工的流行，便可知道。

一面帝國主義者相互之間將要火拼起來，同時在帝國主義者的國內，又有極激烈的階級鬥爭，這個時候，若再加以弱小民族的聯合戰線，則帝國主義者何能不倒。帝國主義既然打倒，中國經濟問題便有解決的方法

第二章　政治問題

第一節　民主政治之經濟的背景

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資本主義發達的過程，同時又是民主政治發達的過程。資本主義可以分做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產業資本主義，第二階段是金融資本主義。政治乃與產業資本主義同時發生同時發達。到了產業資本主義轉變為金融資本主義的時候，民主政治變為銀行王的獨裁。

何以產業資本主義會發生民主政治呢？原來產業資本主義乃萌芽於封建社會的母胎內，而封建社會則以閉鎖的自然的農業經濟為特徵，行着農奴制度。最初工業是與農業結成一起的：工匠[illegible]自己專門工作之外，仍舊兼行耕種，後來就停止農業工作，專門經營自己的作坊。這樣，就發生了社會的分工，工業集中於村落，工業集中於都市，因此，都市便由村落獨立出來。不過當時工業乃依靠於手工，手工須有一定的技能，所以人們要想得到職業，須先為學徒，練習技能，經過一定期間之後，昇為幫手，再經過一定期間之後，師傅，就是當時

的勞動關係分做學徒，帮手，師傅三個身分。這個身分的勞動關係叫做基爾特制度。基爾特制度的本質，顯然是在於限制工匠間的過度競爭，要他減輕競爭，還採用了許多方法，卽每個師傅只許使用帮手及學徒二人或三人，罕有超過五個人的。因此，師傅不能自由擴張其事業，也不能增多協作與分工，使其事業的勞動生產力大大地增加，只能以小規模來經營。此外基爾特爲避免競爭起見，如勞動時間的長短，貨物的種類品質和數量（不許製造草帽的人製造絹帽，亦不許任何人的商品品質比別人做得好，數量比別人做得多）原料的分配（全體取得的原料，平等分配給一切會員）都有規約詳細規定。然基爾特所視爲最重要的，則爲市場的獨占。就是用法律規定某一個基爾特可在某都市內，獨占某貨物的生產和販賣。人們要想在一定都市中從事特定的職業，須先加入該職業的地方的基爾特。不用說，這一種加入須得該基爾特的許可，但許可的條件和形式是極其困難的。（參看施存統譯經濟科學大綱一七七——一八〇頁）這樣，基爾特制度遂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與這個經濟組織相適應的政治，則爲封建的專制政治。地主便是貴族，最大的地主便是國王。貴族階級的特權幾無制限，商人的地位則很危險，常常要受損失。他們要納很重的租稅於君主，有些時候，商人的貨物竟沒有一點口實就被沒收了去。此外，還有種種法律隨意把商人送給法廷裁判。在這樣的危險與混亂之中，產業資本家幾乎沒有活動的可能了。（同上一八一——一八二頁）

產業資本家一面受了基爾特制度的束縛，同時他面又受封建貴族的壓迫，遂由反動的作用，對於前者要

求了自由，對于後者要求了平等。詳細說，產業資本家要發展他們自己的營業，必須社會上有自由活動的餘地而後可，他們所生產的商品，非以一地方為目標，乃欲運到全國發銷。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打破基爾特的獨占，而實現自由競爭的世界。然商品既運到各地發銷，則須按照各地的需要，以決定生產物的種類分量，和品質。因此，工人的雇用，勞動時間的長短，亦須由自己決定而後可。產業資本家要求自由，其目的乃在於此。同時，產業的發達須以財產的安定為前提，財產不能安定，產業絕對不會發達。在貴族有特權的時候，貴族不但對于商品課以苛刻的租稅，且又任意沒收產業資本家的財產。產業資本家為自己營業的安全起見，不能不打破貴族的特權，而要求人們在法律上受到平等的待遇，由是更發生了平等的思想。產業資本家一面對於基爾特要求自由，同時對於貴族要求平等，於是以自由平等為基礎的民主主義遂應運而生了。

如果產業資本家能夠打倒封建貴族，則社會亦因此而前進一步，由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時候，操縱政權的，自然是產業資本家，但是產業資本家自己又有一定的職務，並不是有「閑」的階級，因此，他們乃不能直接參與政治。考茨基說：

「現代國家的任務，極其繁難，非有零碎的分工與專門的知識者，不能濟事。但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又剝奪支配階級從前所有的餘暇。他們雖然不生產，惟榨取生產階級而作生活，但他們又不是有閑的榨取者。自由競爭是現代經濟生活的原動力，然因為有了自由競爭，遂使榨取者沒有寸時的休息而極端實行激烈

的鬥爭。他們一旦敗北，便當滅亡」

戰，「資本家沒有餘暇，沒有休息，而對于藝術的科學的活動，又沒有甚麼修養。他們雖然規則的參與國家行政，然卻沒有參加的前提條件。在現代，不但藝術與科學，就是國家行政，亦不由支配階級實行，他們乃將實行的責任，一委於工資勞動者——官僚。所以資本階級乃支配而不統治。他們能夠支配政府，已經很滿足了……」（猶諾斯基著社會革命論一二——一三頁）

產業資本家既然自己不能直接參與政治，而當雇用官僚，並一切政權者均委託於官僚，是最危險不過的。因此他們遂發明了三權分立制，並要求法治主義，一面大大地限制國家的權力，用法律來綁國權的發動，同時則設法利用金錢的力量，組織政黨，把自己的御用政客，送到議會，由議會以操縱政府。由是民主政治遂取代貴族的專制政治完成了。其實所謂「代議」，是「代」誰人「議」呢？是「代」產業資本家「議」，他們提出標語說「不出代議士，不出租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這句標語反過來說，便是「出了租稅就有選出代議士的權利」。但是他們所謂租稅，是指那一種的租稅呢？是指直接稅而言，即每年直接把租稅交給政府者才有選出代議士的權利，至於負担間接稅的數千萬勞苦大衆，則完全擯斥於這個標語之外。由這個標語看來，便可知道代議政治的本質了。

產業資本家要求自由和平等，而主張民主政治，但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第二階段，而成為金融資本主義的

時候，形勢又復一變。何以呢？金融資本家用其金融的力量，把一切產業打成一團，放在自己的管理之下，而現出經濟上的獨裁形態，由其結果，遂影響到政治方面，使政治亦捨去其虛僞的民主主義，採取赤裸裸的獨裁政體。因爲金融資本家與產業資本家不同，產業資本家所直接支配的，不過產業本身，所以他們尚有小資產階級的性質，喜歡平和，喜歡自由。反之，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國家爲了擴張軍備，須用極大的資金，這些資金則由銀行融通。國家對於銀行既然負了債務，銀行遂得以債權者的資格，直接支配國家。他們不怕國家反叛自己，國家反怕他們不肯融通金錢，而願屈服於其下。有了這種關係，國家的政權遂歸到少數銀行家的手上，政黨是銀行家的，學校是銀行家的，報紙是銀行家的，銀行家用學校以栽培有利於自己的人材，用報紙以鼓吹有利於自己的輿論，用政黨以實行有利於自己的政策，他們何事不可爲，何事不敢爲。何況現在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一面國際有帝國主義的競爭，同時國內有無產階級的反抗，他們非打倒競爭者，壓服反抗者，自己不能存在，那末，他們集中一切權力，對外行軍國主義，對內行專制政策，更是意中之事了。要之，產業資本主義一旦轉變爲金融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就當剝去其虛僞的外殼，而露出赤裸裸的本質。考茨基曾說明產業資本家與金融資本家的性質如次：

『……大金融家亦贊成軍國主義與對內對外的壓制政策。金融家不怕獨立於國民及議會之外的強大的國家權力，因爲他們不但可以國家權力爲債務者而支配之，而且可由個人的或社會的勢力而支配之。

因此，軍國主義，戰爭，國債由債權者或物資供給者的他們觀之，都是很歡迎的。何以呢？這樣一來，他們的勢力範圍，他們的搾取，他們的力，他們的富都可增加起來。」

「產業資本家則與此不同。軍國主義，戰爭，國債都可增加租稅，這個租稅則大半歸於他們負担，而增加他們的生活費。此外，戰爭又可發生生產及銷路的停止，產業的衰頹，及破產等。金融資本家要大胆，豪放，亂暴；反之，產業資本家則要節儉，細心，平和，他們如果不能操縱國權，則國權愈可使他們恐怖。他們的利益不依靠於强有力的政府，乃依靠於强有力的議會。因此，他們與大地主及大金融家不同，常傾向於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之不澈底又是產業資本家的性質。……」（摘譯考茨基著社會革命論五三——五四頁）

總括說一下，民主政治不過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牠的形成過程，便是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現在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爲金融資本的獨裁，所以民主政治也發生破綻，不可挽救。

第二節　各國的先例

我們試舉英日法三國爲例，證明上述的理論是不是合理的。我們所以舉英國者，因爲要說明何以她的民主主義最能按着一定軌道而發展；所以舉日本者，因爲要說明何以她至今連虛僞的民主主義也不能完全實現；所以舉法國者，因爲她是民主革命的典型國。現在試順序述之如左：

第一項　英國的憲政

誰都知道英國是民主政治的發源地，而英國的民主政治最能順着憲政軌道而進行；誰又都知道英國是資本主義的搖籃，而英國的資本主義最能按着自然程序而發展。本文的目的，不在於敍述英國的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如何發生和發展，而在於假藉英國的材料，以說明牠們兩者的關係。

英國的資本主義所以能夠按照自然程序而發展者，便是因爲英國是資本主義的母國，不受外力的壓迫而能徐徐進行。英國的資本主義既然能夠徐徐進行，所以根據上面所說的理由，英國的民主政治也徐徐發展。

人們都以爲英國的憲政乃開始於一二一五年英王約翰（John）發布大憲章（Magna Charta）的時候。其實當時英國社會尙是封建社會，地主——貴族在社會上有很大的權力，因此，社會上的權力者——地主——遂與政治上的權力者——國王——發生了利害衝突，終而有大憲章的發布。大憲章的要旨是：（一）國家大事須諮詢貴族方得舉行，（二）徵收租稅須得貴族同意，（三）國王不得無故拘禁臣民。

在十三世紀中葉，英國的都市已發生了商人階級，一面國王欲抑制諸侯的跋扈，乃與新興的商人階級結合，同時自百年戰爭（始於一三三八年）以後，又有薔薇戰爭，對法戰爭，需要戰爭費甚鉅，這些戰費則當借自商人階級，因此國王乃以交換條件，把種種特權給與都市，由是都市遂獨立於貴族的勢力之外，而都市中的商人在社會上亦有相當的地位。到了美洲發見，東印度航路成功之後，英國的對外貿易大大發展，因此商人階級更

有勢力，而與土地貴族成了敵體。在同一社會之下，既有了兩個平衡的勢力，由是遂以互相牽制之故，使伊利沙伯的絕對王政有其存在的基礎。考茨基說：『絕對主義便是國家權力獨立於各支配階級之外。這個時候，國家權力不爲階級支配的工具，而反似超越於一切黨派和階級之上，自有獨立的存在。然此只能發生於各階級勢力均衡，誰都不能奪取國家權力的時候。在這樣情形之下，國家權力可使各個階級互相阻撓，乘此使牠們停止一切戰爭，停止政治鬥爭，而降服於自己』（考茨基著法國革命時代的階級對立）

然在絕對王政之下，王室要謀國力的發展，乃大大地獎勵對外貿易，一五五三年設立俄羅斯公司（Russian Company），一五七九年設立東部公司（Eastland Co.），一五八一年設立土耳其公司（Turkish Co. 卽後來的東方公司 Levant Co.），一六〇〇年設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n Co.），一六一八年設立亞斐利加公司（African Co.）商人階級受了國家的援助，自然勢力天天增加，終而壓倒土地貴族。

商人階級既然壓倒土地貴族，由是勢力的均衡遂見破壞，終而影響到絕對王政之上。原來英國王室乃以關稅爲重要財源之一，不消說關稅是對於輸出入商品而賦課的，因此，商人階級遂與國家財政有了密切的關係。最初商人階級固然可由此而得到政治上的權利，然不久王室與商人階級又發生了利害衝突。因爲商人階級乃以關稅的低微爲有利，王室則以關稅的提高爲有利，一方的利便是他方的害，他們兩者利害衝突，是理之當然的。於是遂於一六四二年發生了清教徒革命。清教徒革命雖帶有宗教革命的色彩，然我們若看克倫威爾

(Cromwell) 治下的一六五一年和一六六〇年的航海條件（Navigation Act），便可知道他是代表商人階級的利益了。商人階級受了這樣的保護，勢力愈益增加。其後經過一六八八年的名譽革命，發布民權法典（Bill of Right）英國憲政始納上軌道，而成立二個正式的政黨，一是代表土地貴族的托利黨（Tories）一是代表商人階級的輝格黨，（Whigs），一六九〇年威廉三世使輝格黨員單獨組織政府，於是內閣制度以及政黨政治都見成立了。

商業既甚發達，當然可促進國內工業的發展。工業要求多量的生產，這個要求，必須發明新機器，發見新發動力，才能滿足。因此商業資本乃轉化為工業資本，而產業革命亦必然的發生出來。產業革命既已發生，英國工業遂著著發展。

工業既然長足進步，那末，工業資本家自然代替了商人階級的地位。這個時候，輝格黨是純粹代表工商階級的黨，托利黨亦隨時代的潮流，不區區為王權的擁護，而變成純粹代表地主利益的黨。不過當時的地主又與現在的大地主不同，「他們以前對於產業資本家與其勞動者的鬥爭，是絲毫不以為意的，而且常常希望鬥爭歸於資本家的失敗，並寄與某程度的同情心於無產階級。在當時閉塞他們進取之途的，不是無產者，乃是資本家。」（拙譯考茨基著社會革命論五〇頁）因此，托利黨並不是完全頑固的黨。英國由這兩個政黨的互相牽制，遂使憲政大放光彩。至十九世紀中葉，托利黨改名為保守黨，輝格黨改名為自由黨，二黨交握政權，彼仆此起，英

國的政黨內閣遂完全成立。

資本主義愈發展，金融資本遂應運而生。金融資本把一切產業都置在自己支配之下，而現出經濟上的寡頭政治。這個傾向自然不能不影響於政治方面，使英國憲政發生了一個轉換期。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又可製造無產階級出來。這個無產階級旣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又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漸次增加其勢力，英國資本主義是徐徐發展的，所以英國無產階級的勢力也是徐徐增加起來。在一八三八年已經有了察替斯特運動(Chartist Movement)，要求普通選舉，其後又利用普通選舉，把自己階級的代表送到下院，由是英國議會除了保守自由二黨之外，又有第三黨的工黨的出現。任何政黨在議會之內，都不能得到絕對多數，於是議會失去力量，而民主政治亦發見了破綻。

不但此也，自由黨本來是代表產業資本家的利害，而以自由主義相號召，現在一切產業既已隸屬於金融資本，而金融資本的性質又與大地主相似。「大地主若是宮廷貴族，則他們可操縱國王，又可由國王以操縱國權，他們常是帝政的擁護者……又是軍國主義的信奉者，而贊成對內對外，都採取壓制的政策。同樣，大金融家亦贊成軍國主義與對內對外的壓制政策。」(拙譯社會革命論五二——五三頁)因此，從來集合在自由黨旗幟之下的有產階級，現在都歸依於保守黨了。何況階級對立愈尖銳化，則有產階級恐怖無產階級的感情愈增加，保守黨要擁護私有財產制度而撲滅共產主義者的勢力，是絲毫不客氣的。在這個情形之下，自然不但資本

家傾向於保守黨，就是小資產階級也要傾向於保守黨了。自由黨的沒落，其原因卽在於此。

自由黨既然沒落，那末，英國的政黨自然只有保守黨和工黨了。在這個局面之下，可以發生如何現象呢？我們不難想出二種場合。第一場合保守黨得了勝利之後，牠必定因爲國際競爭的激烈和國內革命潮流的澎湃，採取暴力手段，極端壓迫勞苦民衆，最近保守黨內閣鎭壓礦夫罷工，破毀礦夫八時間勞動法，提出法案剝奪勞動者的罷工，便是一個證據。這樣一來，民主政治已經僅留殘形，而議會反變成支配階級壓迫被支配階級的工具了。反之，第二場合，如果工黨得了決定的勝利，則支配階級的政黨和政府，一定用戒嚴命令，取消議會的權能，由是名實俱亡，民主政治的運命更不堪設想了。

第二項　日本的民權運動

英國君主主張王權神授，躬行專制政治，而能踏上民主主義的軌道，反之，日本天皇自古卽徒擁虛器，而乃於明治維新之後，經過十數年的光陰，猶不能納入憲政的常軌者，到底是有如何原因呢？難道日本有產階級的聰明才力不及英國，從而我們當於有產階級之中，分別聰明和不聰明二種，聰明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不聰明者則當屈服於官僚專制之下麽？

否，絕對不是這樣的。原來日本的資本主義并不是於封建社會的廢墟之上，自由生長出來的，乃是因爲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要想對付這個壓迫，不得不採用最新式的生產組織，乃用其溫室的方法，助其長成的。因

此，遂生出下述三種現象，而妨害日本民主政治的完成。

第一，明治初年的有產階級不是由自由競爭，漸次併吞他人的財產，而成其富，乃是假藉國家的權力，掠奪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農民的土地，而造成其鞏固的基礎。例如明治十六年而至於二十三年，農民因爲滯納地租，致私有地受强制處分者共三十六萬七千七百四十四人，其中二十六萬三千九百六十五人卽七七%乃爲窮困所迫。他們的滯納金額共十一萬四千七十八元，卽每人平均只有三角一分，然沒收而附於拍賣的土地，乃有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一畝，價格共四百九十四萬四千三百九十三元。此外，農民爲貧窮所迫，而抵押其土地者，在明治十三四年左右，人數共二百萬口，金額共一億四千三百餘萬元，明治十七年末土地抵押負債達至二億二千三百十萬九千元，這些土地至後多入於高利貸的手裏。由此可知日本資本主義一旦開始，農民卽激急地沒落，社會上現出貧富階級的對立了。所以當時代表民主主義的政黨遂失去活動的餘地。因爲自由與專制的鬥爭愈進展則無產階級的勢力亦當隨着而伸張，由是不但內部要見分裂，對於專制政府不能實行統一的鬥爭，而且民主主義又將越出有產階級所必要的以上，而害及有產階級的本身了。日本民權運動自始卽不能發達，其原因乃在於此。

第二，日本的封建諸侯不是中央政府加以暴力的壓迫，而後滅亡的，乃是他們順着時代的潮流，自願「奉還大政」而退爲宮廷貴族的。中央政府對於這些宮廷貴族，爲要廢去世祿與賞典，乃一時附以巨額的金祿公

債。由是他們不但變成公債利子的寄生蟲，且又利用公債的流通性，變成銀行，鐵路，以及其他企業的股份投資者。前者當依靠於租稅制度，後者當依靠於保護政策，因此，他們在政治上，遂成爲「皇室的藩屏」及專制政府的有力支柱。明治初年的有產階級，大部分是由此出身的，所以他們與專制政府自始在經濟上卽沒有甚麼衝突的地方。

第三、世界資本主義乃於一八七〇年左右，進入於獨占的階段。這個時候，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自由主義都給保護主義所代替，就是獨占代替了自由競爭，保護代替了放任，金融寡頭支配代替了民主主義。日本的資本主義適開始於此時。他要抵制外國商品的輸入，不能不採用保護關稅，獨占國內市場，由此以補償開發海外市場的費用。然要與外國商品競爭，又須用大量生產的方法，因此，國家遂極力縮短封建的生產形式趨向於資本家的生產形式的轉化過程，由是日本資本主義雖然方才萌芽，而在社會上就形成爲大資本和小資本的對立，沒有中級產業資本在中活動。既然沒有中級產業資本，那末自由競爭和自由主義自然更不能存在了。日本的民主主義所以不能充分發展，其原因大約如上所言，我們觀此亦可知道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有怎樣的關係了。

第三項　法國的革命

誰都知道法國革命是由有產階級與封建貴族鬥爭而激成的，因此，我們第一必須敘述法國在革命以前

的產業狀況，由此以推測有產階級的實力；第二必須敘述有產階級與封建貴族有怎樣利害的衝突，由此以證明有產階級何以有革命的必要；第三當敘述當時法國的無產階級尤其是農民在如何境遇之下；由此以說明法國的有產者革命何以能夠得到他們的幫助而卒大大地成功。

法國的產業革命雖比英國遲數十年，然在路易十四世治下，因爲受了國家的保護，亦逐漸發展起來。可惜當時沒有統計，所以我們只能由斷片的材料，以推測之。

當時法國對外貿易，頗見隆盛，到了一七八七年，其貿易額已發展如次（單位百萬利布爾）

輸入　三一〇（殖民地的生產品不在內）

輸出　五二四（內含有農產物及原料品三一一工業製品二一三）

對外貿易的隆盛，當然可引起造船業的發達。一七五四年新船共造十四艘，三千六百四十噸。一七五六年新船又造十六艘，三千七百二十二噸。由一七六三年而至於一七七八年，新船共造二百四十五艘，七萬五千四百八十五噸，卽每年平均造出十六艘，四千九百噸。一七七八年以後的新船可列表如次：

年數	艘數	噸數
一七七八年	七	一、八七五
一七七九年	二四	五、四八五

一七七〇年	一七	四、七六〇
一七八一年	三四	一六、八〇〇
一七八四年	三三	一六、一三〇

造船業這樣的發達，其他工業當然也很隆盛。例如大革命時代馬賽一地有肥皂工廠三八，製帽工廠四〇，製糖工廠一二，陶器工廠一〇，更紗工廠一二，製襪工廠二〇，製酒工廠二〇，玻璃工廠八，製粉工廠一〇，製革工廠一〇。此外如纖維工業則發達於諾曼底，蘭格多格，里昂；鐵工業則發達於東部地方及亞爾薩斯，洛林各地；煤炭則發達於亞多亞及安贊。若據彌拉波（Mirabeau）的報告，則安贊炭礦，規模頗大，共有工人四千，馬六百疋，價值十萬利布爾的火力唧筒十架，由此可知當時法國產業如何隆盛了。

產業的興隆實可反證有產階級的勢力，不久，封建組織逐束縛有產者的生產方法的發展，由是社會上的勢力者——有產階級乃與政治上的勢力者——貴族發生了利害衝突，終而爆發為法國的大革命。原來法國在路易十四世時代，雖已成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但封建勢力尚復存在，各地有關稅制度妨害商品的流通，又有貴族的法廷任意加罪於平民，至於法律與貨幣的不統一，則更可束縛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種形勢之下，有產階級自然非打倒封建貴族不可。這個時候國王若能幫助有產階級而驅逐封建貴族者，則法國前途或可一變而為日本的維新，但情勢乃不之許，國王是「貴族中的貴族」，每年由國庫中取出三千一百萬利布爾，而將

二千五百萬利布爾供給貴族浪費。貴族的浪費，在軍隊中爲尤甚，當時兵士僅有十三萬五千八，而將校則有一萬二千人，這些將校都是出身於貴族。將校的薪俸共四千六百萬利布爾，反之兵士一切費用則僅四千四百萬利布爾，因此在軍隊中又見將校與兵士的對抗，這對於革命的成功，是有重大意義的。

國王浪費，貴族浪費，所以法國國債在一七八九年竟達四十四億六千七百萬利布爾。這些國債，由何處借來呢？用何法還償呢？貴族是有免稅的特權，而財產又爲不動產的土地，那末負担這個巨債的，自然是一般民衆尤其是有產階級了。有產階級知道貴族政府毫不足恃，要想挽救自己的財產，使自己不至隨着國家的破產而破產者，必須自握政權，由這個必要，遂發生了法蘭西的有產者革命。

但是有產階級舉行革命的時候，一般勞苦民衆何以肯出來帮助他們呢？關此，我們就要知道二種事件，第一是無產階級的無知，第二是農民與貴族的利害衝突。原來在法國革命當時，無產階級尚未形成爲一個階級，沒有階級意識，也沒有指導原理，馬剌會主張擴張勞動者的選擧權，而勞動者方面竟視若無覩，沒有反應。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的法律禁止一切市民組織團體，而勞動者亦不反抗。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自然要服從有產階級的指導，謀伸張有產階級的利益了。至於農民，雖與有產階級不無利害衝突之處，但其嫉恨貴族之心，竟使他們願意與有產階級提携，因爲法國的土地，乃在貴族手上，農民除極少數的自耕農之外，大部分都是貴族的佃農，他們對於貴族須納苛重的租稅，又受嚴酷的待遇，他們老早就想奪取貴族的土地，所以不但援助有產階

級的革命，而且革命之後，又爲了保存自己所已得的土地，乃願意從軍而作擁護共和及革命的戰爭。法國革命所以能夠成功，完全由於農民的援助，而農民所以出來援助，其理由大約如上所言。

第三節　中國經濟的現階段是不是合於民主政治

英國民主主義的成功和日本民主主義的失敗都可爲中國的殷鑒。質言之，英國民主主義所以成功者，因爲他的資本主義是漸次生長，日本民主主義所以失敗者，因爲他們的資本主義是急激發展，我們比較英日二國的情形，則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便可推測出來了。

現在中國的社會，一面雖尙有封建的色彩，但同時又急激地發展了金融資本主義。這個金融資本主義則由帝國主義者造成，由買辦階級以支配全國。誰都知道上海是帝國主義者的根據地，又是全國金融的中心，中國生產階級所欠缺的，是資本，而他們又沒有融通的地方，幷且村落的利子大過小都市，小都市的利子大過中都市，中都市的利子大過大都市。上海是全國利息最薄的地方，因此各地的高利貸都由買辦階級向上海各銀行借了一筆巨款，再把這些金錢，借給生產階級，由此而盤剝巨利。所以中國生產階級是經由高利貸與買辦階級受金融資本的支配的。換個話說，中國產業雖不十分發達，然因生產階級的貧窮，乃由債務關係，間接又間接的，受了金融資本的支配。不過金融資本之支配中國，幷不是完全利用金錢，此外尙可利用商品，就是把商品借

給商人，使其開店販賣，待其收回成本之後，再取還原價與利息，這些商人對於金融資本，雖須繳納利息，然其利息乃比村落為低，所以他們又把自己的剩餘，借給農民，盤剝巨大的利息，由是中國農民亦間接受了金融資本的支配。全國生產階級都受了金融資本的支配，則據上面所說的理由看起來，中國民主政治不容易實現，自然是勢所必然了。

不但此也，日本的資本主義，不過開始於帝國主義方才萌芽的的時候，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則正開始於資本主義極橫行而且將要沒落的時候。在這個時候，中國要想抵抗洋貨的侵入，而發展自己產業者，勢必不能採用自由競爭，而當採用保護政策，此外更當獎勵大規模生產組織。為要達成這個目的，自然須用國家權力，促進企業聯合，近來招商局要與三北公司合併，便是一個例子。這樣一來，中級資本何能存在。民主主義是中產階級所要求的，因為他們惟在民主主義之下，才能發揮其政治的勢力，又能得到國家權力的保護，現在中國既然不許中產階級存在，則民主主義自然沒有其階級的背景，而當沒落了。

大資本的發生，當然可造出無數的細民，何況中國自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侵入以來，不但都市的手工業者沒落為無產階級，便是村落的農民，也沈淪於無產階級之中。社會上既然有了無數的無產階級，這些無產階級又適存在於帝國主義將次崩壞的時候，受了外部許多的刺激，則何能不出來與有產階級爭奪支配的地位。於是有產階級為了預防無產階級的發展，一定要用國權壓迫他們，因此，有產階級乃反對一切進步，要求反動，希

望帝政，變成專制主義的擁護者了。在這當中，政府非援助有產階級而壓迫無產階級者，便當援助無產階級而壓迫有產階級，有產階級絕對不能實行普通選舉，致二者兩敗俱傷，延而害及國家本身的存在。至於政黨要想按照時勢要求，舉行適中的政策者，亦須主張一黨專政，把握領導權而後可。要之，無論如何，在今日中國，而欲實行英國式的民主政治，萬萬不可能。

第四節　中國有產階級能夠不能夠出來舉行民主革命

法國民主革命是有產階級要反對封建貴族，得了農民的援助，而後才成功的。所以關於中國民主革命，便可發生三種問題，第一，中國的有產階級有沒有革命的力量，第二，中國有產階級的利害是否與封建軍閥衝突，第三，農民階級肯不肯援助有產階級革命。

關於第一問題，必須先看有產階級是不是形成為統一的階級，而後才能決定。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中國的有產階級都由金錢關係，與買辦階級有了密切關係。E Varga 對於買辦階級的性質說得很明瞭，他說：

所謂買辦，由其狹義觀之，是外國商品的買主，也是中國原料品的賣主，即立於中國商人與外國資本家之間，而作居間人的中國富商。買辦一方面介紹買賣，而當「信用買賣」之際，若買主無付款能力，即與以三成至七成五的保證，同時更探求商品的買主，并解決一切營業上的紛議。在買貨的時候，買辦對於各地方的

原料販賣者，給與以信用的保證，使居留在大商埠上的外國洋行，與中國內地的商賈，結成了關係。買辦的機能，就部分的說，頗與英國的 Broker 相類似。他的固定報酬是很細微的，但他的主要收入則爲規定成例的經手費。他常把一部分的利益，雇用多數人員。這些人員，在對人方面是對買辦負責，但其雇用須得外國洋行的同意，并以外國洋行的意旨而解雇，買辦因爲有經手費，所以外國洋行的興盛，對於他，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不是被一個帝國主義者所屈服，而淪入殖民地的地位，乃是數個强國（如英美法日）彼此激烈競爭，而後殖民地化的。所以帝國主義者的各種對立關係，勢又影響到其所連結的買辦階級即有產階級的身上。因此，帝國主義者的對立關係，又存在於中國有產階級的內部，使中國有產階級分裂，不能成爲統一的階級。」（E. Varga 著　一九二八年上半期的世界經濟年報，樊仲雲先生編中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第一篇）

中國革命，一面是對於軍閥而作的，同時又是對於帝國主義者而作的。關此，我在別種論文中，已經詳細說明過了，（拙著三民主義政治學第四章第二節。）要之，中國軍閥都有帝國主義者做其後台老板，安福軍閥之於日本，直系軍閥之於英美，降而至廣東的陳炯明亦與英帝國主義者勾結，由此可知中國革命，直接是要推倒軍閥，間接則要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因此有產階級前由買辦階級，因爲帝國主義者的對立關係，而致內部發生分裂者，現在又由帝國主義者與軍閥的關係，而致對於軍閥的革命，不能組織統一的戰線了。陳廉

伯之勾結陳炯明便是一個例子。

關於第二問題，我們知道土著的有產階級是與封建軍閥有不同的利害關係，他們喜歡平和，軍閥則天天作亂，他們希望把全國關爲統一的市場，而軍閥則割據各地，用釐金制度以妨害商品的交通，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他們自然要想推倒軍閥了。但是我們更要知道有產階級非迫於萬不得已者，絕對不肯冒險出來作革命運動，因爲他們是有財產的，他們革命是要保全自己的財產，如果自己的財產尚有其他保全的方法，則他們何苦冒目前的危險，而求將來不可知的利益。那末中國有產階級現在是不是已經迫到山窮水盡麼?不，他們是有別的避難方法的，第一是租界，第二是掛洋旂。原來中國現代式的產業，都是發達於大都會，而各處的大都會又都有租界或外人居留地與其爲鄰。中國人是怕外的，縱是土匪也很怕外，何況租界與居留地，平時既不受中國法律的拘束，亂時又有軍艦大礮保護，則中國資本家自然以租界爲海外桃源，對於中國內亂，視若無覩了。至於產業置在內地者，他們亦可用洋旂爲護符，掛了洋旂，便可不納釐金，不被沒收，他們因軍閥而受的苦痛，是很細微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何肯出來革命。

最受軍閥的壓迫的，恐怕莫過於手工業者或小商店罷。但他們是封建的殘滓，沒有組織的能力，而他們的腦中又滿充以「眞命天子」的思想，他們是不會革命的，就是要想出來革命，也不過欲驅除「獨夫的紂」而迎立「愛民如子」的湯武，何能建設民主主義的國家。

至於大資本家則大約是由買辦階級出身的。他們住在租界之內，已經受不到軍閥的壓迫，他們是帝國主義者的經紀人；每乘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借款的時候，做了經手，打了扣折，而獲得巨大的利益，而軍閥們亦願意與他們勾結，以便與帝國主義者借債，所以他們對於軍閥，是爲虎作倀，自始卽不革命的。

關於第三問題，則情形更甚明瞭。法國革命所以能夠成功者，因爲農民要取得貴族的土地，得了土地之後，又恐怕貴族奪還其土地，所以願意代有產階級出力，擁護民主政治。俄國革命所以能夠成功者，也是因爲共產黨用「土地還於農民」的口號，而得了農民的援助。任何一國，農民都占絕對多數，任何革命都須得到農民的幫忙，而後才有成功的希望。然而中國農民大約都有土地，他們不再要求土地，他們所要求的，則爲減輕田賦。因此在租稅方面，遂與有產階級發生了利害衝突。任何革命政府，在其得到政權之後，都須有相當的財政，而後才能存在。這個財政不能不依靠於租稅，由是在一定時期之內，欲得一定額的租稅者，若輕稅工商業，則必須重稅農業，反之，若輕稅農業，則必須重稅工商業，因此，工商業者與農民遂由租稅的鬥爭，而發生利害的衝突了。中國歷代皇帝得到天下之後，卽下詔減免田租，就是要得到農民的歡心，有產階級的政府能夠實行這個辦法麼？如其不能，則農民援助有產階級，又有甚麽利益？

但是軍閥的壓迫，內亂的災禍，尙可驅使農民與有產階級提携，聯合戰線，向封建軍閥進攻。不幸中國的有產階級同時又是大地主，且是盤剝農民的高利貸，因爲他們是大地主，所以不能鼓動農民出來作農業革命，致

自己的土地有喪失的危險；因爲他是高利貸，所以農民怨恨他們的心理，實不亞於軍閥，而使他們兩者自始卽沒有提携的可能。關於中國農民不能與有產階級提携，E Varga 有下列的話，現試抄譯於左，以供讀者的參考：

「歐洲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是土地支配制度與農奴制度。……現今中國雖然尙有農奴制度，但這個農奴制度，却不帶有眞正封建的性質，……中國的農奴制，是由下述的事情而發生，卽貧窮的佃農因爲土地的缺乏，乃束縛於地主，又因爲常向地主借債，以致於本來的地租之外，不能不以工資的大部分，歸於地主，由是在事實上，遂把自己的身分引渡於地主，而舉其全部身靈隸屬於地主。」

「這樣不同的地方，一瞥之下，似乎無關緊要，其實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卻有很大的關係。有產階級所指導的農業革命，「第三階級」的革命，卽有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對於封建的土地支配制度的共同革命（卽法國式的革命），在中國乃不可能。爲甚麽呢？因爲中國不是眞正封建的土地支配制度。因爲各種有產階級同時又是收納田租的人，所以他們決不會對於自己實行革命。并且在事實上既然有了農奴制度，有產階級更不會把農民由這個農奴制度中解放出來，因爲正是這些有產階級，正是這些與土地私有相結合的高利貸資本，才把農民變爲債奴的。所以農民只有脫去資本主義的束縛，而後才能從重利田租的重壓下，把自己解放出來。……」

總而言之，中國的有產階級，無論從那一個方面說，都是不能革命的。有產階級既然不能革命，那末，有產者

的民主政治，更何由而成立？

第五節　中國民治的特質

綜括上面所說的看來，可知有產者的民主政治和民主革命都不適合於中國了。這裏所謂不適合，非指把這樣的政治和這樣的革命實行於中國，將要生出毛病，乃是指牠們兩者在中國都沒有社會的基礎，所以自始卽不能實行。換個話說，我們幷不是因爲嫌惡有產者的民主政治和民主革命，而後反對其實行於中國，乃是因爲看了牠們兩者絕對沒有實行於中國的可能，所以反對人們作徒勞無功的追求。原來一切制度都沒有絕對的利，也沒有絕對的害，得其時者爲有利，不得其時者爲有害，而所謂得時與不得時，則完全看乎有沒有社會的基礎而定。中國自戊戌變政以來，一切制度都喜歡模做泰西，而不知泰西制度乃是應乎資本主義的要求，而後產生的。就是有了資本主義，而後才產生泰西那樣的制度。泰西那樣的制度所以能夠實行於泰西，而不會馬上就生出大毛病者，完全因爲牠們有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做基礎。不幸中國社會，尙是封建的社會，現在乃欲模做泰西的施設，那末上層建築的資本主義的制度，自然要與下層基礎的封建社會發生矛盾和衝突，延而害及社會的治安了。例如新軍制度是應着資本主義的發達，用以代替封建時代的騎士階級的，然中國人民尙有封建的主從觀念，所以採用了新軍之後，就生出無數的軍閥。又如學校制度是適應資本主義的要求而謀大批生

產經營界的雇員的，然中國產業尙甚幼稚，所以開設了學校之後，又生出知識階級的過剩，由此種種，便可知道沒有資本主義的基礎，是不宜採用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的。

閒話少說，我們現在再談談政治問題吧，如上所言，民主政治在中國是沒有社會的基礎而不會實現的。那末，中國的政治要怎樣辦呢！於此，我們必須觀察國民黨的民權主義與泰西的民主主義有甚麽不同的地方，由此以說明民權主義所以有存在的價值。

第一，民主主義是用一片紙張，規定人民有種種的權利，而坐聽人民自己來實行的，反之，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則不但主張人民有紙上的權利，且又造成人民有實行權利的可能性，因此，一面逐主張了訓政，同時更實行了民生主義。原來『要實現眞正的民權主義，必須人民有政治的興趣和能力。在民衆沒有政治興趣的時候，如果就給以民權，其結果，不是放棄而不運用，就是敷衍而不盡責。無論出於那一個結果，民權主義都是等於具文。在民衆沒有相當的政治能力的時候，若給與民權，一定爲狡黠者所利用，而謀其私利，弄到結果，民權主義也不過徒有其名，實際則供爲少數人利用的工具。中國承數千年專制的積習，國家是皇帝的私產，政治是皇帝的私事，對於民衆毫無關係，惟要求兵役的時候，課人民以血稅，要求金錢的時候，強制民衆納糧，人民不受政治的利，只受政治的害，所以中國的政治思想本甚幼稚，而先哲又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爲訓，所以中國人不但沒有政治的能力，而且沒有政治的興趣。在這樣形勢之下，如果革命之後，就給人民

以充分的民權，其結果就要如上所述，不但民權政治虛有其名，而且會為少數狡黠者所利用，以行少數人專制之實，所以要實現健全的民權政治，就須先設一個過渡時期，訓練人民，使之能運用政權，這個過渡時期，便是訓政。」（拙著三民主義政治學八〇頁） 但是人民在政治上能夠運用平等的權利者，必須他們在經濟上有平等的地位。政治與經濟是分離不開的，經濟上的權力者常是政治上的支配者。這不但因為他們的金錢可以支配一切，就是就選舉的性質來說，也可知道選舉的結果，也是有錢的人得了勝利。因為公平的選舉，是要選出有能力的人和有知識的人。然能力與知識不是天生出來的，要想獲得知能，須有獲得知能的條件，這個條件便是金錢。沒有金錢的人要想獲得知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沒有知能的人要想當選，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私有權尚未撤廢以前，選舉愈公平，愈將不利於勞苦民衆。這樣看來，金錢這個東西乃是由民衆中選出支配者的太上皇，所以金錢的有無，不但在經濟上有意義，而且在政治上也有意義。泰西的民主主義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所以弄到結果乃變成金權政治。反之，國民黨則先用民生主義以造成經濟的平等，而後再於平等的基礎之上，使人民運用政權。

第二，民主主義是由個人主義出發，而主張天賦人權，反之，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則由社會主義出發，而主張革命人權。「因為個人不過是社會的一份子，個人不是自然的存在之物，乃是社會的存在之物，個人的衝動，熱情，思想，行為，以及所謂權利，都是依存於社會，所以對於個人的權利，操握最後決定權的，不是個人本身，乃是社

會的安危。因此，社會不必盡須承認個人請求權利，反而個人請求權利的時候，必當關顧到社會的安危如何。中國社會乃包含無數的矛盾性，一方有革命黨，他方又有反革命的勢力。這個反革命的勢力，是根深蒂固，不是一擊就可打倒的，他們雖然一時崩壞，終想死灰復燃，如果任他們繼續參與政治，任他們活動自由，他們就有機會可乘，出而破壞革命，所以一切反革命的人，不但不應授以政治的權利，且當禁止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因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可為鬥爭的器具，而在革命時代，又與火藥炸彈機關槍，同為內亂的器具。這些一切若不禁止，則革命尚未成功，而反革命又將蠢起了。何況中國人民以農工階級為最多，而農民尤占大多數，但是農工羣衆在今日的中國，因為產業的不發達，教育的不普及，都不能獨立完成其國民的義務，須有知識階級做他們的導師，然而知識階級大約都是遊動分子，可受革命黨的影響，亦可受反革命的影響。當軍閥執政的時候，軍閥常利用政治上的權力，造成一種空氣，以壓服一般民衆，知識階級則為軍閥的媒介，所以革命成功之後，若不仔細甄別，而乃馬上施行普通選舉，使一般民衆都有參政的機會者，則這些惡劣分子必定愚弄民衆，侵入國民大會之內，變成「猪仔，」而釀成軍閥的專制了，所以暫時必須實行革命民權，於民衆中區別革命與反革命二種人物，革命者有民權，反革命者無民權，而後社會才能安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於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

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忠効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就是因為上述的緣故。

最後，宣言所以不許効忠於帝國主義的團體或個人享有自由及權利者，乃是因為中國的革命，一方是要推倒軍閥，同時更要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不打倒，中國革命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効忠於帝國主義的團體或個人如買辦階級者，必當剝奪其自由及權利而後可。

第三章　民族問題

第一節　民族的形成

要解放中國的民族，須先知道中國民衆現在是不是已經形成爲一個民族；要知道中國民衆是不是已經形成爲一個民族，須先抽象的，理論的對於民族形成，詳細說明一下。

關於民族的形成，我在別個論文中已曾詳細討論了，（政治之基礎知識第五章三民主義政治學第一章）本來不想反覆再說，一以減讀者的興趣，二以佔無謂的篇幅。但民族如何形成，乃是本章立論的前提，所以我又不怕讀者厭煩，聊借普璺特之筆，把民族的形成過程，說明如次：

「人類常是社會的動物，人類與自然鬥爭的時候，人類社會乃隨着技術及經濟狀態的變更而變更。而社會組織的各種階段，又適應於經濟發達的各種階段。技術愈低，則集合爲社會的人數愈少。原始的狩獵經濟只集合二十八乃至五十八，牧畜經濟則可集合二三百人，農業牧畜混合經濟又可集合一萬五千人。有六百萬人口的紐約，當初只有數千人的印度人在那裏經營其狩獵生活。

「生產發展的歷史，同時又是各種社會組織統一人類的歷史，

「原始的氏族組織，乃經營狩獵經濟他們要確保自己經濟活動的地域，對於別的氏族組織，常作激烈的鬬爭，以擁護自己經濟的利益。他們對於本氏族以外的人，既然都當做敵人所以就取氏族封鎖主義，不與其他往來交際。——這是原始的氏族社會的特徵。但是人類與自然鬥爭的手段若見變化，技術若見發達，經濟的利益若見變更，則社會組織亦必發生了變革。原始的農業和牧畜，乃發生於氏族組織的裂痕之上。由是遂脫離了周圍的氏族組織，而有正當指導牧畜和農業經濟的必要。前此的慣習和氏族的排他的封鎖，已歸消滅，代此而興者，則爲對於各氏族，加以組織的連絡。——這對於指導新經濟形態，是很必要的——從前只許族內結婚，現在則族內結婚乃視爲不法了。

「氏族的神亦爲新神——統一各氏族而保護新社會組織的神——所代替。

「這樣，技術的發達，及在新技術上面發生出來的新經濟利益，遂創造了社會關係的新形態。同時舊氏族制度亦破壞了其上層建築，從屬部分，及組織部分。在這裏遂生出種族組織。現在各國，尙有種族組織存在着，或仍保持其鞏固的狀態，或則方在發生或崩壞的階段。

「社會的分工愈發展，則發生了交換關係，而日益鞏固起來。這些一切，在種族組織的狹小範圍之內，深感不便，極力要求出口。這個時候若再發生了商業資本，則種族組織又與新經濟矛盾。

「在各種族之中，發現了統一的氣運。新的經濟，和新的經濟利益，每可喚起新的 Ideologie 和新的社會的概念，也是人們對於種族的閉鎖主義，種族習慣種族神，又發生了鬥爭，而民族乃隨之而出現。

「在歷史上我們可以舉出無數這樣的例。古代猶太人的商業資本，曾引起以色列 (Israel) 十二種族的統一運動——用民族組織和民族神，以代替種族組織和種族神，而統一爲單一的國民。

「六七世紀的亞剌伯種族亦有同樣的過程。

「民族在何時於何處發生呢？這個統一的新形態，乃成長於由資本主義的勃興（商業資本的形態）而產生出來的新經濟關係之上。

「那末，氏族，種族，及民族的差別，到底如何？

「氏族，種族，民族，乃適應於人類經濟發展的各種階段，而爲人類社會的各種形態。

「果實的採取魚蝦的漁撈，鳥獸的狩獵，以及某種植物的耕種和某種動物的馴養——這是氏族之經濟的基礎。

「閉鎖的自然的牧畜經濟及農業經濟，或二者的混合經濟，乃是種族組織的內容。

「以商業經濟爲基礎的交換，及資本主義的經濟，乃是民族的基礎。」

普婁特區別了氏族，種族，與民族之後，又說明民族的發生和發展如次：

「民族的萌芽，我們在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已經看得出了。在六世紀至七世紀，亞剌伯各種族間的商業的互相關係，已喚起民族統一的運動。這個運動及新觀念之階級的推進力，乃是小商業的有產階級。其指導者的摩罕默德常往來於麥加（Mecca）與麥地那（Medina）之間經營隊商商業，而支配當時的商業的企業，這決非偶然的事。

「在各種族之間，要開闢通商的路線，並正確計算金錢，乃要求法制和慣習的統一，而破壞各族種間之疏隔的政治制度。此外又須用唯一的神，支配麥加及麥地那的市民。而與新的利害關係相適應。但是這個民族的統一，又過於微弱無力，不能與當時資本主義的情勢相適應。

「到了商業關係發達，商品經濟發生，工業資本形成的時候，這些資本主義的新形態，遂創造了在社會上占據重要地位的資本家階級。有產階級的活動範圍愈大，則他們愈致力於民族統一。有產階級又利用學者，書集，新聞，劇場，繪畫，以實現自己階級的利益。更利用對於國民大衆有極大影響的機關，使國民大衆亦出來向妨害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的政治的障礙物作鬥爭。

「有產階級破壞了封建的經濟的遺物，更破壞了封建諸侯所建設的內部的障壁——割據的侯國，關稅門——有產階級用鐵路和航路以接合各部，創設了巨大的社會組織，並使勞農大衆參加革命，其結果，非把封建諸侯政府屈服在自己階級勢力之下者，即把他們廢黜。有產階級利用國家機關，以統一民族，並創設

擴大的有產者國家。

「資本主義發達的過程，同時又是民族發展的過程。

「所以對於上述的問題，可回答以民族的發生和發展，乃與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一致其時間和場所。」

綜括說一下，社會組織的程序，可以分做三期：第一是民族組織，第二是種族組織，第三是民族組織。這三種組織，各與特殊的經濟組織相適應。種族組織在政治上常表現爲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把整個的國家，分割爲無數小國家，各設森嚴的障壁，以隔離別的領域。但是社會的分工愈發達，交易的關係愈頻繁，則封建制度就愈令人感覺不便。如果這個時候，再發生了商工業資本主義，則由通商的必要，最初便要求各地法制和貨幣的統一，其次又感覺各地方言的不便，而採用統一的言語，最後復謀運輸的便利，布了無數的鐵路，以交通陸路，製造無數的輪船，以交通水路，由是各個種族，復由經濟的連鎖，結合爲一個民族。所以民族是資本主義（不論個人的或國家的）的產物，資本主義發達的路程，便是民族構成的路程。我們若看各國的先例，便可知道。

第二節　各國的先例

民族是資本主義（不問個人的或國家的）的產物，所以資本主義若未發生，民族不會構成。反之，資本主義

若已發生，則一國民衆便可自然而然的構成爲一個民族。我們不看別的，只看美德日三國，便可知道。

第一項　美國民族的構成

誰都知道美國本是歐洲的殖民地，他的人民乃由四方八面而來，不是單一的民族；然到了現在，竟然能夠形成爲很鞏固的民族國家者，則完全有恃於資本主義的作用，所以我先以美國爲例，敘述民族形成的過程。

美國何以要求獨立？果然因受母國政治的壓迫，起而要求自由平等麼？這個固然不失爲原因之一，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則爲經濟。簡單言之，美國在殖民地時代，產業雖以農業爲主，但殖民在母國時，已經做慣了工業，所以一到美國，就有很多的人成爲職工，由是紡織業，製鐵業，魚業，都次第勃興起來。然英國則不願意殖民地發展其工業，乃用「航海條令」(Navigation Act) 以束縛之。但產業既已存在，當然能夠自己發達起來，所以最後深感母國立法的拘束。反之，當時英國又正在開始其產業革命，英國的製造家比以前更欲獨占殖民地的市場，因此遂厲行航海條令及其他各種制限的立法。於是殖民地的產業遂與母國的產業發生衝突，換個話說，殖民地的有產階級遂與母國的有產階級發生利害衝突，終而勃發爲一七七五年的獨立革命。

美國獨立當時，無論在名義上或實際上，都不能稱爲單一國家。十三州儼如十三國，各設關稅障壁，使彼此互相離隔；兼以外國的壓迫，致十三州的結合，快要切斷，由是美國全土都奮然起來，作建設强有力的聯邦政府運動。這個運動，在表面上，很像出於愛國熱誠，其實他們愛國者大部分都是有產階級。——聯邦公債及洲公債

的所有者，西部地方的土地投機者，資本家等——因爲只惟强有力的聯邦政府，才能充分促進他們的利益，保護他們的投資。這樣，新政府遂有了種種强大的權力，使美國向統一的路程，前進一步。

新政府利用其權力，先統一貨幣，設立中央銀行，獎勵產業，謀國內交通的發達，由是美國亦發生了產業革命，而見工業的隆興。然美國經濟在這個發展過程之中，又發生內部的矛盾和衝突，其矛盾和衝突的原因，則可求之於南北二部之經濟的利益之衝突。換個話說，可求之於南北支配階級之經濟的利害之衝突。質言之，北方的支配階級是產業資本家，南方的支配階級是地主，北方經濟組織是以工資勞動者爲基礎的資本主義，南方的經濟組織，則爲奴隸制度。原來在同一政府之下，只許實現一種經濟組織，如果在同一政府之下，乃有二種利害相反的經濟組織行於其間，則不是一方爲他方所屈服，便是一方脫離他方而獨立。美國南北二部，既然行着二種不同的經濟原則，自然容易引起利害衝突。其衝突的表現，則爲：（1）南方的支配階級欲把奴隸制度擴張到其他各地，然他們所欲得的土地，如對墨西哥戰爭所獲得的領土以及古巴（Cuba,）梅遜（Mason）等地，均爲北方的有產階級所左右，致他們經濟失去發展的出路。（2）發展的出路既被斷絕，同時北方的資本主義，又成就其飛躍的發展，向着中央及西部地方前進，致向來與南部成爲經濟的一體的地方，現在竟和北部地方結合而成爲密切的經濟單位。（3）北部地方既然勃興了以工資勞動者爲基礎的近世資本主義經濟，由是一面遂謀獲得政權，以伸張自己的利益，同時自由空氣又壓迫了南部的奴隸制度，使其自歸崩壞。有了這樣的衝

突，自然勃發爲一八六一年的南北戰爭。

不過奴隸制度是保守的，封建的，所以在南北衝突之時，南部是主張分離。反之資本主義則爲進取的，其活動的地域，絕對不願局限於一地，所以北部乃阻止南部的分離，換個話說北部地方所以要反對南部的分離者，不外是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必有將南部地方的土地和其富源，取爲已有的必要，美國的南北戰爭，結果不至於分離而至於統一者，其原因卽在於此。

南北戰爭，到了一八六五年，北部得到勝利，由是美國的資本主義，遂進入以全國爲經濟單位的新發展時代。此後美國遂由農業國一躍而爲工業國，我們若看下例各表，便可知道：

製造工業發展一覽表（單位一千弗）

項目　年次	一八五〇	一八六〇	一八七〇	一八八〇	一八九〇	一九〇〇
製造工業品的價格	一、〇一九、一〇九	一、八八五、八六一	四、二三二、三二五	五、三六九、五七九	九、三七二、四三七	一三、〇一四、二八七
投下資本額	五三三、二四五	一、〇〇九、八五五	二、一一八、二〇八	二、七九〇、二七二	六、五二五、一五六	九、八三五、〇八七
平均雇傭勞動者（千人）	九五八	一、三一一	二、〇五四	二、七三二	四、二五一	五、三一七
製造品輸入額	一三〇、八三八	一六一、二六四	三〇八、三六三	四二五、六九九	二四〇、六八五	二〇三、一三六
國內製造品消費（%）	八八、三九	八七、五七	九三、一四	九二、五八	九七、六〇	九八、四六
外國製造品消費（%）	一一、六一	一二、四三	六、八六	七、四二	二、四〇	一、五四

鐵道發達一覽表（單位哩）

年	哩
一八六〇年	三〇、六三五
一八七〇年	五二、九一四
一八八〇年	九三、二九六
一八九〇年	一六三、五九七
一九〇〇年	一九三、三四五

此外如通信機關，航路，國內商業，外國貿易，亦著著進步不已。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然全國可由經濟的連鎖，結合爲一體了。由是各種各色的人民，都受了資本主義的洗禮，變成爲一個亞美利加的民族了。

第二項　德國的統一

德國的產業革命，比英國遲八十年，比法國遲三十年，所以德國形成爲民族國家，也較英法二國爲遲。在十九世紀初葉，德國尚行封建制度，人口十分之八盡是農民。一八〇七年普魯士廢止農奴制度，其他各地則於一八六〇年爲止完全廢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然各邦分立，——不但政治上分立，而且經濟上亦分立——各設森嚴的關稅障壁，妨害國內貨物的交通。

然而資本主義有如傳染之病，一旦與外國（非資本主義的領域）交通，勢非把外國亦變成資本主義不可。

產業革命既然早就發生於英國，英國用其機器所製成的商品，既可橫渡大洋，轟碎萬里長城，侵入數千年來主張鎖國主義的中國，則德英二國僅隔一衣帶水，德國何能不受英國的影響。

德國的產業革命乃是依靠於英國機器和勞動者的輸入，以及技術的學習，而完成的。最初先輸入紡織機器，這可使紡織手工業沒落。我們只看一八四九年德國有八萬四千二百八十六人的手工業的紡織者，一到一八六一年則減少為一萬四千八，便可知道英國的機器工業如何擾亂德國的手工業了。德國受了英國產業革命的影響，亦漸次發生機器工業。機器工業既已發生，有產階級便見成立。此外機器工業的發達，又可促進煤鐵的採掘。茲將德國的煤鐵生產額，列表如次：

煤的生產額（單位噸）

年	生產額
一八五〇年	五、一八〇、〇〇〇
一八六〇年	一二、三五〇、〇〇〇
一八七〇年	二六、四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〇年	四六、九七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年	七〇、二三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年	一〇九、二九〇、〇〇〇

鐵的生產額（單位噸）

年份	生產額
一八四〇年	一四三、〇〇〇
一八五〇年	二〇八、〇〇〇
一八六〇年	五二九、〇〇〇
一八七〇年	一、三九一、〇〇〇
一八八〇年	二、七二九、〇〇〇
一八九〇年	四、六五九、〇〇〇
一九〇〇年	八、五二一、〇〇〇

德國成爲統一的國家，乃在打勝奧國和法國之後，普奧戰爭在一八六六年，普法戰爭在一八七〇年。然據上表所示，則德國未成立爲統一國家以前，現代式的產業已經相當發達，所以爲發展資本主義起見，才有與妨害統一的奧法開戰的必要。

於此，德國的經濟逐與德國的政治發生了矛盾，在經濟上，德國已開始其資本主義的過程，在政治上，則仍保存中世的封建的割據的制度，政治的組織既然縛束經濟的發展，那麼，經濟的發展自然要打破政治的束縛了。最初因爲政權尚在封建地主的手上，有產階級尚未發達到奪取政權的程度，所以只能在經濟上結成關稅

同盟，然資本主義愈發展，有產階級的力量愈增大，這個時候，他們在經濟方面又由鐵路，運河，道路等的建築，使全國成爲一體，又由商品的交換，使各地人民有互相倚賴的必要，由是經濟上的統一，遂愈感覺有打破封建制度的必要了。茲把德國鐵路的發達情形列表如次：（以啓羅米突爲單位）

一八四〇年	五四九
一八五〇年	六〇四四
一八六〇年	一一六三三
一八七〇年	一九五七五
一八八〇年	三三八三八
一八九〇年	四二八六九
一九〇〇年	五一三九一

（德國的鐵路建築乃開始於一八三五年）

即在普法戰爭之年，德國的鐵路已經有一九五七五啓羅米突，在普奧戰爭前四年，已有一一六三三啓羅米突了。鐵路的延長，一方面可表示資本主義發達的情勢，同時又可表示一國統一的程度。德國既由鐵道網的密布，使全國人民消除其前此偏狹的地域思想，則割據局面何能不歸於崩壞？

在當時，由外部的勢力而妨害德國的統一的，乃有奧法二國。所以德國的有產階級，因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不能不起來作民族統一運動，先於一八六六年打敗奧國，次又於一八七〇年打敗法國，由是德意志民族遂於普魯士指導之下，獨立爲民族國家。

第三項　日本的中央集權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是模範的封建國家，上有幕府，下有諸侯，其情形有似於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然封建制度過於成熟，其內部又不免發生崩壞的氣運。何以呢？在封建制度之下，生產組織是以小農和手工業爲基礎，其中，小農尤爲封建制度的砥石，所以幕府和諸侯，無不設法謀農業生產力的增進，然生產一見增進，其結果，遂與封建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

原來封建領主的權力，非依存於地租的多少，乃依存於自耕農的人數。然領主的土地是有限的，所以最後農村人口便發生了相對的過剩。農村人口之相對的過剩，可增大農民的窮困，由是農民非逃出農村者，便當用棄兒或墮胎的方法，以制限人口的增加，這樣一來，封建權力的基礎的農村人口，乃相對的或絕對的減少了。

同時，在封建的農業生產關係之下，領主常搾取全部餘剩生產物，以作年貢，因此，一般農民，都不能改良農作，又不能發生資本家的利潤。其能改良農具，施行肥料，擴張生產規模者，只限於少數的富農。所以他們在封建的搾取之下，尚可保存餘剩生產物的一部，這個餘剩生產物的一部，則可轉變爲資本，使他們搾取失去生產要

具的農民。

一面失去生產要具的小農，奔到都市，成爲無產階級，同時，在都市之內，又因爲封建的貴族爭尙奢侈，而發達了手工業；他面富農因爲生產力的發展，集積了資本，同時封建貴族因爲奢侈無度，不能不依靠於高利貸，由是封建制度遂現出崩壞的氣象。在這當中，高利貸和手工業的資本，若欲成爲勞動力的購買者，而轉化爲工業資本者，必當先除去封建的私有關係，尤當除去土地私有之封建的組織及手工業之特權的基爾特制度。於此，有產階級遂成爲明治維新的一要素。

在封建制度已開始其崩壞過程的時候，西方的資本主義又復壓迫到東方來。「有產階級由生產用具的改良，又由交通機關的發達，把一切國民，雖最野蠻的國民，亦引入文明體系之中。他們廉價的商品，無異一個大砲，可轟碎萬里長城，而降服最嫌惡外國人的野蠻民族。有產階級常强制一切國民，使他們學習有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只要他們不欲滅亡。即有產階級常强制他們輸入文明，而自成爲有產階級。一言以蔽之，有產階級常以自己爲模型而創造世界。」日本既然受了西洋資本主義的影響，那麼封建制度自然更非崩壞不可。

但是西歐資本主義不但侵略日本，又復侵略中國，何以中國變成半殖民地，而日本竟能維新自强，把中國變爲自己的半殖民地呢？原來英國開拓市場於東亞的時候，乃以印度爲第一目標，中國爲第二目標，日本爲第三目標。英國在鴉片戰爭以前，因注其全力開拓中國爲市場，所以無暇兼顧日本，到了鴉片戰爭之後，又因確保

自己在華的市場，不能伸其魔手於日本。到了能夠兼顧日本的時候，而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又復同時奔到日本，遂由彼此的牽制，而至不能暢所欲爲，因此，日本遂得保全生命，不至步中國的後塵。

但日本既然受了西歐資本主義的洗禮，經濟組織遂不能不根本變更。然最初並不變更手工業的——小農的經營，乃變更生產物流通的範圍。即國內市場尚未擴張，而國外市場已與國內市場結爲一體，輸出超過於輸入，因此生產物在國內市場乃告不足，一面物價騰貴，使大多數的民衆都淪落爲無產階級，同時消費力的增加，又使人們不能不變更其舊來的生產方法，由是「亞細亞的生產形式」即「農業與手工業的統一」——遂見崩壞，代此而興者，則爲西歐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要發展自己，保存自己，勢非打破封建制度把全國都置在自己支配之下不可。在這個過程之中，有產階級自然要求把國內各種法制，各種習慣，各種貨幣，各種權度，都編爲單一法制，單一習慣，單一貨幣，單一權度，並且設單一的關稅境界，藉以開拓資本主義的市場。所以這個時候，有產階級常出來作民族統一運動，而建設民族國家。日本也不能逃出此例。何況日本一旦開始資本主義，即有外敵的激烈競爭，則他們要保存國內的市場，並開拓國外的市場，何能不以强有力的國家權力爲後盾。這樣一來，日本的有產階級自然更非幇助中央政府，打破割據局面，而建設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不可了。日本所以能夠維新，其理由大約如上所言。

第三項　中國人民是不是已經形成爲一個民族

就理論方面說，就實例方面說，都可證明民族這個東西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資本主義若未成立，民族不會形成。於此，我們若欲研究中國人民現在是不是已經形成爲民族者，就有研究中國經濟的現階段的必要。

讀者聽了這幾句話，一定要懷疑起來，以爲中國人民自古卽已形成爲一個民族，換句話說，自黃帝入主中華以來，卽有中華民族。中華建國已經有四千餘年了，在四千年後的今日，尙復討論中國人民是不是已經形成爲一個民族，這不是同痴人說夢一樣麼？

但是我們試問論者有無證據，可以證明中華人民自古卽已形成爲一個民族。以言語的同一爲證據麼？然閩粵方言實與外國語無異。因中國人民常統治於同一政府之下麼？然統一於同一政府之下的人民，乃是國民，不是民族，朝鮮受日本政府的統治，然朝鮮人幷不是日本民族，便是一例。此外如宗敎風俗習慣，則中國各地亦不一致。這樣雜駁的人民，而可稱爲已經形成爲民族，誰又能信：

原來民族的發展，是同階級一樣。民族的發展過程，可分爲兩個時期：在第一期內，一個民族對於別的民族，雖可說是一個民族，而對於自己卻不算得一個民族。換句話說，就是對外可算爲民族，而對內還不算民族。到了第二期，對外對內，都可算是民族了。譬如昆蟲中的一個幼蟲，當其未成熟爲昆蟲時，對於昆蟲，當然只能說還是

幼蟲，然而對於別的動物，當然可說是昆蟲，到了幼蟲發育爲昆蟲時，就不獨對於別的動物算爲昆蟲，並對於昆虫也可算是昆蟲了。民族發達的二時期，也是一樣。一個民族，於第一期中，對於別的民族，確是一個民族，然而對於自己，還不能算爲一個民族。然而以甚麼爲標準，來決定民族發展的時期呢？一個民族是否成熟，須看該民族內的份子，有沒有民族意識而定。（參看周佛海先生著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二二六頁）所謂民族意識，就是如（一）項所述，由資本主義的發達，結合全國人民爲一體，使其發生隣保的感情。

這樣看來，所謂中國民族自古卽已形成爲一個民族，不過是指中國民族對於別的民族，可算爲一個民族，不是指對於自己，亦算爲一個民族。

何以中國民族，對於自己，不能算爲一個民族呢？民族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我們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觀察中國經濟組織的現階段。

我們知道民族乃連接種族而發生，資本主義乃連接封建社會而發生，同時我們又主張現在中國人民尚未構成爲眞正的民族，卽還沒有民族意識，所以要解決上述問題，我們實有證明現在中國尚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

資本主義既然是連接封建社會而發生，那末，封建社會崩壞了以後，代此而興者，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了。中國封建社會乃以周代爲最盛期，又於周末歸於崩壞。既是這樣，則中國自秦以來，在理當爲資本主義社會，何

以我們還說中國現在尚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呢?

甚麼叫做資本主義社會我在三民主義政治學第二章第一節中,把牠的特徵,規定爲:(一)商品生產,(二)少數資本家獨占生產要具,(三)工資勞動者的存在。中國自秦以來的經濟,雖亦建築在工資勞動的基礎之上,如用錢雇人爲夥計或長工之類。但由其本質觀之,有似於基爾特制度,並不能視爲眞正的工資勞動者。因爲中國工業完全是手工業、手工業以機敏爲第一條件,必須學習而後能,所以中國的勞動關係,亦分爲徒弟,職工,和雇主三個身分,與現代工廠內的勞動關係絕對不同。至於「商品生產」和「少數資本家獨占生產要具」一則更未成立,因爲中國的生產,是以定貨生產爲主,而中國的生產要具,則到了最近爲止,尚分散而不集中。

據上所言,可以知道中國的資本主義並不是秦時就有的了。那末;周代的封建制度,何以崩壞,崩壞了之後,中國社會是屬於那一種社會呢?

周代的封建制度,乃以井田制度爲特徵。甚麼叫做井田制度?簡單說,以地方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爲私田,而收私田的生產物爲己有,但當協力助耕公田,而將公田的生產物交給領主。但私田並不是代代繼承的,身死之後,當奉還領主,而領主則視其人有沒有兒子,及兒子有多少而再頒給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井田制度之下,(一)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土地私有權,(二)農民當共耕公田,無報償地把其生產物交給領主,所以井田制度,並不是共產,乃是於農奴制度之下,成立了搾取和支配的關係。

這個生產組織，只能實行於人口稀少的時候。到了人口增加，勢非自歸崩壞不可。何以呢？領主的土地是有限的，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一里劃爲九區中養八家，所以公侯之地可養八百家，伯可養五百六十家，子男可養四百家。然領主的土地雖然有限，而人口的增加則無窮底，到了最後，領主對於新增加的人口，已不能再領發土地。由是內部遂產生了無數得不到土地的無產者，而引起無數的社會問題。領主要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只有擴張領土，邊陲的領主固然可向蠻荒開闢，如秦如楚如燕如越都因此而成其大。至於中原的領土，則不能不互相排擠，引起戰爭。戰爭愈激烈，田園愈破壞，由是封建時代的戰爭，乃如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相同，本來是想解決經濟組織的矛盾，然結果不但不能解決矛盾，而反增加矛盾了。這樣一來，井田制度遂歸崩壞，以井田制度爲基礎的周代封建制度，亦歸於崩壞。所以周代封建制度的崩壞，不是因爲資本主義的發達，乃是因爲人口的增加。

周代封建制度的崩壞，既然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達，而是由於人口的增加，然崩壞了之後，何以竟會成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呢？（中央集權的國家，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關於這一點，我們又有研究中國經濟的必要。原來中國自立國以來，經濟都是以農業爲基礎，（雖然農業上的勞動關係，前後有所不同，周代是以農奴爲特徵，秦代以後是以佃農爲特徵。）經濟既以農業爲基礎，而中國農業又是築在水利經濟之上，水利經濟含有二種任務，一是防衞洪水，一是灌溉田園。這個水利經濟若不注意，則養活數百萬人的肥田，可一變成湖沼，或變成

沙漠，所以水利經濟的破壞無異於破壞中國農業。然水利經濟，只有集合各地，共同協力才能運用，因爲預防黃河的氾濫，是巨大的工程，不但不是個人所能做到，而且不是一地所能做到。如果只在河流的一部，建設堅固的堤防，而不能顧到全流域，那末在上流或下流，還是要潰決的。潰決的時候，自然要影響到全河流。（參考拙著三民主義政治學一六三——一六四頁及樊仲雲先生編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第一編）在周室初興之時，因爲人口尙稀，野生的森林未曾被人採伐，卽如孟子所謂「斧斤以時入山林」，所以由森林的作用，可以調和氣候，而預防洪水。到了周室將亡，因人口增加，領主有擴張土地的必要，乃先向山林開墾，闢爲田園，森林的作用既失，由是洪水遂爲災了。各地領主要解決洪水問題，都以鄰國爲壑，致鄰國發生水災，許多人民都至溺死，所以當時農民對於割據局面都不滿意，而欲建樹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秦是最先廢除井田制度的國，所以能夠得到民心，而統一中國。

這樣看來，中國封建的制度所以崩壞，中央集權的國家所以成立，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的作用，乃是由於中國特有的自然的生產條件了。

以井田制度基礎的封建組織崩壞了之後，中國社會是如何的社會呢？在這裏，我們應該先述甚麼叫做封建社會。陶希聖先生在其所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二篇總論中，把牠的特質，規定爲：（一）土地制度，（二）人與人的隸屬關係，（三）身分制度。其實這三者不過是封建制度的表現，並不是封建制度的本質。封建制度的

本質，乃爲閉鎖的自然的牧畜經濟或農業經濟，一個社會如果行着這樣的經濟，則該社會一定表現爲割據形勢，而帶有封建的色彩。中國自秦以來，在名義上雖號稱中央集權的國家，其實社會的經濟，仍以閉鎖的自然的農業經濟爲基礎，所以在平時，中央政府的命令，已不能行到邊陲，一旦混亂，就呈出割據的局面。

總而言之，中國自秦以來，雖然以井田制度爲基礎的封建組織已經崩壞，但是因爲經濟尚是閉鎖的，自然的農業經濟，所以社會仍不脫封建社會的積習。

然自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侵入中國以來，形勢又復一變了。其變更不同日本一樣，能夠由「亞細亞的生產形式」一變爲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乃破壞「亞細亞的生產形式」本身。其中理由，我在別個論文中已經詳細說過了，現在可以不說。簡單言之，即由於洋貨的源源輸入，致國貨沒有振與的可能。不過在一二通都大市，受了帝國主義的影響，亦漸次轉變爲資本主義。這個低度的資本主義，由其本身言之，雖然很微弱無力，但亦可左右全國的經濟。因爲現在中國的經濟，完全倚靠於帝國主義者，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各地，則爲帝國主義者的經濟根據地，因此，這些都市的生產乃可搖動全國的生產，同樣，這些都市的勞動運動，亦可指導全國的革命運動。

由國內的情形與帝國主義者的影響，兩個併合，而下以觀察，則中國現在的社會可斷定爲：

「中國現在的社會，因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乃由封建社會而過渡爲資本主義社會。」

第四節　中國有產階級的民族意識

民族這個東西，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最初出來作民族運動的，常是有產階級。——中國現在的社會，既然因為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由封建社會而渡度為資本主義社會，那末，現在——中國亦必產生了有產階級。這些有產階級能即其他各國的有產階級一樣，出來作民族運動麼？

所謂有產階級，并不是指有錢的人，想對於社會科學稍有研究的人當能知道吧！在有產階級之中，可以分做三種，(一)地主(二)產業資本家(三)金融資本家——其實即古代高利貸的變相。地主的活動範圍，常為土地所制限，只惟資本主義的農業地主，才能把全國為其生產物的市場。其他農戶則由自己產業的關係，常有封建的思想，而為封建制度的擁護者。至於單純土地所有主，則更不必論了。所以地主不能出來作民族統一運動。金融資本家和高利貸之類，其在經濟上的作用，不過把金錢借給別人再由別人受到一定利息，即其活動的對象，為人不為市場，全國雖不統一，對於他們也沒有甚麼不便，所以他們不是民族運動的指導者。至於銀行家，雖其活動的範圍較大，然亦只惟金融資本能夠與產業資本合為一體之時，才有擴張市場的必要，然其結果，又往往無視國界，而變成帝國主義者，所以在有產階級之中，只惟產業資本家才是民族運動的先鋒，何以呢？他們生產的貨物，不是不發銷於一地，乃是達到全國發銷，所以由通商的必要，必須要求各地的法制，貨幣，關稅，語言的

統一出來作民族統一運動。

以上所述，乃就一般有產階級而言，現在試把中國的有產階級分析一下。中國的有產階級，大約是由二種人物出身，一是出身於官僚，一是出身於買辦。官僚的資本不消說是由刮削民脂民膏而得的。他們盜國病民之所得，一半貯存於外國銀行，一半用以購買租界的土地。貯存於外國銀行的，自然希望外國銀行的發達；何肯出來作民族運動，而排斥外國金融資本的侵略？他們沒有民族意識，是理之當然的。其用以購買租界的土地的，則變成地主，不過這個地主，又與國內的地主不同。國內的地主，有時尚恐怕國家不統一，致生出混亂，延而害及自己的財產。至於置產於租界之內者，則常以帝國主義者為其贓污的保障，他們只希望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天天增大，又希望中國的內亂天天激烈，其所以希望帝國主義的勢力天天增大者，因為帝國主義者若能增加其勢力，則中國沒有收回租界的可能，由是他們遂可藉領事裁判權為護符，保全其財產，不至受人抄沒。其所以希望中國的內亂天天激烈者，因為中國的內亂若仍存在，則人們將以租界為海外桃源，由是租界遂可繁昌，而租界的地價亦可騰貴了。他們完全損失民族精神，何能出來作民族運動！

關於買辦階級，我在三民主義政治學第四章第一節中，已曾約略述過了。要之，他們乃站在中國商人與外國資本家之間，而介紹內外通商。他們的固定報酬，是很細微的，但他們的主要收入，則為規定成例的經手費，他們因為有經手費，所以外國洋行的興衰，對於他們有密切的關係，從而他們亦希望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的膨

張，而不願排除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勢力。可憐中國的有產階級，大半都是出身於買辦階級。在他們之中，雖然也有成爲產業資本家的，但他們最大的利益，不在於振興中國的產業，而在於販賣外國的商品，他們的金錢，是受帝國主義者的融通，又放在帝國主義者銀行之內。他們與帝國主義者既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何肯出來作民族運動，排除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更進一步觀之，中國不是被一個帝國主義者所屈服，而後淪落爲殖民地，乃是數個強國彼此激烈鬥爭，而後才殖民地化的，所以帝國主義者的對立關係，勢又影響到其所連結的買辦即有產階級的身上。因此，帝國主義者的對立關係，又存在於中國有產階級的內部，使中國有產階級分裂，不能成爲統一的階級。既然不能成爲統一的階級，更何能出來作民族統一運動！

要之，按之各國實例，民族統一運動大約都是以有產階級爲先鋒，然中國的有產階級，乃因爲自己特殊的環境，失去民族精神，所以美國式的建國，德國式的統一，日本式的維新，在中國都不可能。

第五節　中國民族運動的特質

我們既然不能期待中國有產階級出來作民族運動，那末出來作民族運動的，尙有其他階級麼？如果沒有，則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不能成立，如果有之，其民族運動的特質，又復如何？

我們以爲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運動，本與初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運動不同。初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民

族運動，乃由有產階級出來担任，其目的在求民族國家的建設；帝國主義時代民族運動，則由一般勞苦大衆出來担任，其目的在求民族的解放。因爲在資本主義方才發生的時候，各國只能致力於國內市場的開闢，無暇顧到國外，所以任何一國的有產階級，都可整頓自己的國家，不受他國掣肘，即受他國掣肘，而其程度亦甚微弱。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爲帝國主義的時候，經濟先進國的有產階級，已感覺國內市場的狹隘，乃向弱小民族侵略，把弱小民族變爲自己的殖民地。這個時候，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因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都變成帝國主義者搾取的對象。在弱小民族之中，雖亦發生小部分的有產階級，但他們都是買辦階級，而與帝國主義者勾結，所以能夠反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的，只有勞苦大衆。再者，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推翻的，他們不但有大礮，有軍艦，有毒瓦斯，有飛行艇，而且有銀行，工廠，礦山等一切生財要具，弱小民族有何力量與其對抗。所以這個時候，只惟團結弱小民族聯合戰線，與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而後才有解放的希望。要之，帝國主義時代民族運動，可舉其特質如次：

(一)全世界分裂爲二個民族的對立，即搾取民族和被搾取民族的對立，或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對立。

(二)弱小民族的有產階級，已變成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只惟勞苦大衆才能担任民族解放的責任。

(三)弱小民族不能單獨與帝國主義者對抗，必須聯合戰線，一致進攻，而後才有解放的希望。這個戰線，一

面是聯合帝國主義者國內的被壓迫民衆，同時又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

不幸，中國的民族運動，乃在帝國主義極橫行的時代，所以乃帶有上述的特質。關於這一點，中國國民黨是預先就已知道的，所以老早就決定了一個政策，以適應這樣的國際情形。

關於第一特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得很詳細。

關於第二特質，如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說：「故國民革命的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如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說「凡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有廣大的民衆參加，而農工民衆猶爲必須。過去民族革命運動之失敗，由於參加者限於知識階級，故不能得廣大之基礎與廣大之勢力於現在及將來。而民族革命運動須以其意義普及於田間及工廠，且必須使之組織於反抗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中。」就是表示這第二特質的。此外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又力斥買辦階級，謂其爲虎作倀，咕嘬中國國民的殘尸，以饜其下流的慾望。」

關於第三特質，如總理遺囑所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就是主張中國民族革命運動，非聯合廣汎的戰線，不能成功。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得尤明白，牠說：「對外當打倒帝國主義，其必要的手段：……二曰聯合世界被壓迫之民族，三曰聯合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人民。」「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及民衆，聯合奮鬥，實足爲其致命之傷。」「凡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明瞭共同之敵人爲誰，對

于共同之敵人，爲共同奮鬥，自助與互助，切勿異致，所以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之革命運動，有聯合戰線之必要。」「在帝國主義本國以內因勞動羣衆之失業，生活程度日以跌落，貨幣日以跌價，不能不陷於貧窮之境遇，而貨幣跌價，且使中等階級失其儲蓄之資。此種經濟上慘澹與恐慌，足使階級鬥爭更形激烈，其結果必至將大多數民衆驅入革命的戰線以內。而此大數多民衆又必同情於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願與之合作，爲解放而奮鬥也。」

總而言之，一切被壓迫民族在帝國主義時代，要想解放自己，其手段必與初期資本主義時代的不同。國家主義者的錯誤，完全在於不認識時間的變化，還想模倣德國的統一以統一中國，日本的維新以維新中國，因此，變成時代落伍者，而至失敗，這是理之當然的。

這樣看來，帝國主義時代之民族運動，其結果必將變成世界革命，而現出一番混合大戰。即不但被壓迫民族與壓迫民族戰，而且被辣取民衆又與搾取民衆戰，所以孫中山先生說：『就我個人觀察已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與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與强權的戰爭。……將來的戰爭，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受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强權。……推到全世界，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强權的，和黃人主張强權的，也一定

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亦說：『中國之國民革命，由中國言之，爲中國民族之自求解放；由世界言之，爲一大部份人類之自求解放。故中國之國民革命，實爲世界革命之一大部份。』

第四章　文化問題

第一節　文化之社會的基礎

中國今日的社會可說是動搖和矛盾的社會。不但人們的物質的生活發生了動搖，便是精神的生活也發生了動搖；不但這一個人和那一個人，這一個集團和那一個集團有了矛盾，便是同一的人也常常自己矛盾。這個動搖和矛盾的原因是甚麽呢？簡單說，是文化轉換期中必然地發生的現象。

一定的文化乃適應於一定的社會組織，一定的社會組織又適應於一定的經濟構造，一定的經濟構造更適應於一定的生存技術，所以生存技術變更了之後，經濟構造必隨之而變更，經濟構造變更了之後，社會組織必隨之而變更，社會組織變更了之後，文化亦必隨之而變更。這樣看來，文化的進化，結局是受生存技術的制限。的生存技術不進步，要想發展文化，是不可能的事，同樣生產技術進步了之後，要想保守過去的文化，也是不可能的事。

何以文化的發展須受生存技術的制限呢？

第一，人類是要生存的，人類要維持其生存，須先取得生存的資料。但是生存的資料乃存在於自然界，人類欲由自然界之中取得生存的資料，不能不有相當的努力。換句話說，人類要維持其生存，須先放出自己的Energy以攝取自然界的Energy。這個時候，放出的 Energy，比較攝取的 Energy 是少，抑或是多，對於文化的發展，乃有根本的決定力。如果是多，則文化不會發展，如果是少，則文化可以發展。何以呢？在第一場合，人類全部的 Energy 都要貢獻於生存資料的生產，不能從生存資料的生產之中，解放一部分的 Energy，而致力於精神文化的創造，所以文化不會發展。反之，在第二場合，人類的 Energy 不要全部都貢獻於生存資料的生產，可解放其中的一部分而致力於精神文化的創造，所以文化可以發展。那末放出的 Energy 比較攝取的 Energy，何以或多或少呢？如上所言，人類的生存資料是存在於自然界的，但是我們又不能赤手空拳，由自然界中取出生存資料以供給我們的使用。我們要想取出生存資料，須有相當的技術，就是技術發達了之後，我們纔能夠把存在於自然界之中的物質，移到社會，與我們人類結成關係。這樣看來，人類攝取自然界的 Energy，以補足自己的 Energy，在這物我之間，乃有技術存在着。技術愈進步，則人類可用較少的 Energy，由自然界中，攝取較多的 Energy。技術能夠決定文化的發展，其理由乃在於此。（參看拙著三民主義政治學九——一一頁）。

第二，有一定的生存技術，便有一定的經濟構造；有一定的經濟構造，便有一定的社會組織；有一定的社會組織，便可產生一定的文化。但是生存技術發展到相當程度之後，往往因為人類的生產力除了維持自己的生

存之外，尙有剩餘，由此而成立搾取關係，更由搾取關係，使社會變成階級社會。這個時候，搾取階級既然是搾取他人的勞動力，以維持自己的生存，那末當然不必把自己的 Energy 耗費於生存資料的生產，可解放其全部，而致力於精神文化的創造，所以文化這個東西是搾取階級所特有的。古代希臘羅馬的文化，是築在奴隸的基礎之上，而爲奴主階級的文化，中世封建的文化，是築在農奴的基礎之上，而爲貴族階級的文化，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化，是築在工資勞動者的基礎之上，而爲有產階級的文化。這個事情，想稍讀文化進化史的人大約當能知道吧。但是文化既是階級文化，卽搾取階級的文化，那末在一定的階級社會之下，文化的發達自然又有一定的限度了。何以呢？搾取階級要保存自己的地位，則其所發展的文化必求有利於自己地位的保存。凡有利於自己的地位的，他們固然極力發揮，反之，有害於自己階級的，他們則極力妨遏。這樣一來，文化的發展，自然要於達到最有利於搾取階級的時候卽見停止了。何况文化是由技術而決定，而在一定的階級社會之下，技術的發達又有一定的限度呢？比方有產階級的文化是以增加資本家的利潤爲目的的，無數技術的發明都是要增加資本家的利潤。但是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後，雖再採用新技術，利潤也不會增加起來，因此，有產階級遂墨守舊技術，而使文化現出停滯的現象。關此，波達諾夫會舉例說明如次：

「資本家所視爲最重要的，則爲對於工資勞動者給與以必要勞動時間（譯者註：就是生產勞動者生活費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質言之，就是維持勞動者生活所必需的生產物）而收其剩餘時間（譯者註：就是

除去勞動者生活費外尙有贏餘的生產物）爲己有。——這是搾取的本質。如果資本家購買了機器，以代替一部分的勞動力，則他們必須把全部勞動價值——生產機器時所使用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讓給別的資本家，出是遂發生了下述情形。

「製造機器所使用的勞動量，若假定爲一萬勞動日，而勞動者一人一日的創造價值，若假定爲一盧布，則機器的貨幣價値，是一萬盧布。今再假定消耗這個機器，須經過一萬八千勞動日，則資本家可節省八千勞動日，所以這個機器對於生產，是有價値的。但是企業家設備這個機器，果然有利益可得麼？若使必要勞動時間是半勞動日，則工資爲半盧布，企業家雇用勞動者一萬八千日，每人每日給與以五十哥拍克，則合計只有九千盧布。反之，若不雇用勞動者而代以機器，則須出一萬盧布。兩相比較，資本家自然以機器的使用，爲無利益了。

因此，雖是最完全的機器，資本家也不採用……」（拙譯社會主義社會學二四三頁。）

綜括說一下，第一，文化是依存於技術的，技術進步，文化也隨之而發展，技術不進步，文化也隨之而停滯。中國自秦漢以來，文化所以不進步者，就是因爲技術不進步。並且當時搾取者兼支配者的士大夫階級，又不是有閒的自由人。他們要想得到支配者的地位，不能不致力於國家所限定的各種學問，這些學問是可耗費他們的 Energy 的，他們那裏更有剩餘的 Energy 以發展中國的文化？第二，文化是有階級性的。中國文化的發展階

段，由我們觀察，大約可以分做三期，第一期由黃帝至殷，當時社會的分化尙未明瞭，故其文化只可稱爲圖騰文化第二期由周至秦，社會已分裂爲農奴和貴族的對立，當時文化確是貴族文化。第三期由秦到最近，社會上的階級是士大夫和庶民的對立，所以這時期文化可叫做士大夫文化。

文化是依存於技術的，如果技術不斷地發展，終而越過一定限度以上者，則文化必隨着經濟構造和社會組織的變更，由這一種的文化轉變爲他一種的文化。在其將轉變而未轉變的時代，叫做文化轉換期。文化轉換期的現象是很複雜的，舊的支配階級雖然將次顚覆，然新的支配階級又不能得到權力，經濟將變更而不變更，政治將改造而不改造，一面舊思想舊習慣舊信仰失去効力，同時新思想新習慣新信仰又未確立，任何方面都呈出動搖和矛盾的現象。這個動搖和矛盾的現象，乃日夜侵襲人類的意志，所以人類的意志也失去平衡的態度，而感覺種種的不安。這確是文化轉換期的現象。

今日中國就是在於文化轉換期之內的，這一次的轉換，不但要由甲種文化轉換爲乙種文化，幷且要由甲種文化，輕輕地渡過乙種文化，而轉換爲丙種文化。因此，三種文化乃夾雜存在於中國的社會；使中國社會現出矛盾和動搖的現象。具體的說，中國文化本來是士大夫階級的封建文化，就中國本身說，是要由士大夫階級的封建文化轉換爲資本主義的文化；然若就中國是世界的一部說，又要由資本主義的文化轉換爲社會主義的文化。三種文化同時存在於中國的社會，由是遂使中國社會現出動搖和矛盾的現象。

我現在試把這三種文化的特徵說明如次。

第二節　士大夫階級文化的特徵

士大夫階級的思想是繼承儒家的思想。誰都知道孔子是沒落的貴族而又生在封建時代的末期。在這文化過渡期當中，孔子的努力並不是要打倒封建文化，而創設新的文化，乃欲爲封建文化作最後的掙扎，而「夢見」完成封建文化的周公。孔子「述而不作」他所述的便是過去封建的思想，所以重名分，守天命。所謂「名分」是指封建社會的身分制度，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他因爲過於重視身分，遂致對人接物，都視對方者的身分如何，而異其態度。他極輕視庶民，以爲：「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聞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他極重視貴族，所以「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至對於身分相同的人，自然平等待遇，所以言談之間，又不覺「侃侃如也。」孔子既然這樣地重視身分，由是便以爲統治階級的一舉一動，對於被統治階級，都是有影響的，他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上好禮則民易使矣，」「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參看陶希聖先生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所謂「天命」便是封建時代的宗教思想，原來宗教思想乃發生於氏族時代的祖宗崇拜。關此，波達諾夫曾

說明其發展如次.

「要指導社會內部很複雜的關係，家長常利用祖宗的經驗和遺訓，即利用由代代相傳的祖宗法則產生出來的計劃。家長常依靠這個遺訓，對於社會爲祖宗意志的實行者，把祖宗的權威，置在自己的權威之上。一切家長常自視爲實行前家長意志的人，尊敬家長的意志，把牠置在自己的意志之上。當他成爲家長的時候，常由思想的保守性，維持這個見解，自視爲社會習慣的保存者而傳布於各構成員。至於前代的家長，對於繼承其地位的更前代的家長，也有同樣的關係。這個同樣的形式，由社會的構成員觀之，自然要以祖宗的遺志，置在自己的意志之上。然他們的祖宗，對其祖宗也是一樣。由是極遼遠的始祖，遂存在於子孫的意識之中，而有超人的形態了。由祖宗的崇拜遂變成神的崇拜，所以祖宗崇拜可以把神創造出來，使最古的宗教有了基礎。』（拙譯社會主義社會學八三——八四頁）

在社會尙是氏族社會的時代，各氏族雖以自己的祖宗爲神，到了氏族社會由種種原因而統一爲種族社會的時代，則在各氏族神之上，須有更高的神，以統一牠們，由此遂產生了God的思想。God在中國叫做「天」，「天」是最高的神，有絕對的權力，不但一切自然現象，如日月星辰的運行，水火風雷的發作，都受「天」的支配，就是人類的禍福貴賤也是受命於天。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由這句話看來，可以知道孔子的宗教思想。

總括說一下，孔子的思想是築在「權威的因果性」之上的。這個權威的因果性又築在權威的共同勞動(農奴的井田制度)之上，卽築在貴族之指導的機能和農奴之勞動的機能互相分離之上。波達諾夫說：

「在共同勞動之中，常有連續的事實。如指導者有命令的時候，必接續以勞動者的行爲。這不單是行爲的連續，而且是必然的和有機的關係。由是各構成員逐知道指導者的命令，其結果必發生勞動者的行爲。所以權威的因果性，在其發生狀態，乃是勞動關係。在勞動關係之中，又有原因和結果的對立。原因是某一人的行爲，結果是另一人的行爲。這裏面又含有法則性，就是命令之後，必有實行。這個法則性，對於現實的生活，是必要不可缺的。在未發展的思考，又只能認識這個法則性。」

「權威的因果性，不但只應用於人類的勞動關係，且可由原始的比喻，而轉用於其他現象之上。……若使指導者的行爲言語，姿態，及指示的模範，能夠發生勞動者的行爲，則某種自然現象亦可發生他種自然現象了。就是小熊所以進入穴內，乃是由於母熊的命令；天上所以沒有星，乃是由於太陽的命令；波濤所以奔騰於海上，乃是服從暴風的命令。」(拙譯社會主義社會學七〇——七一頁)

權威的因果性是這樣發生的，而其本質則爲傳統，就是與祖宗結合。祖宗傳來的一切制度，都視爲神的遺志或天的福音，神聖不可侵犯，「非先王之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服不敢服，」孔子的思想是這樣的受了傳統的配。

這個思想對於當時的支配階級是有二種利益的。第一可由此以證明支配的合理，使一般民衆不敢反抗。因爲一切制度既然受命於天而天又是全能全知全善的主宰，則我們下民豈得反抗，如果反抗，亦必失敗而無疑。第二可由此而妨害事物的革新，使支配者容易維持其地位，因爲當時一切複雜困難的問題都由當局者解決，古人所謂「作之君，作之師，」便是這個社會的特徵。但當時人類的思考力尙甚幼稚，只能應用過去的方法，以解決問題。然而一切革新則可變更社會的關係，使當局者的任務愈見艱難。比方新器具發明了之後，不能不變更以前的生產方法，分配方法，以及交換方法，這些問題，在當時思考力不甚發達的人類觀之，自然是不容易解決的，所以當局者每反對一切革新，甚者且用嚴刑峻法禁人發明，禮記王制所謂「作奇技奇器以疑衆，殺，」便是一例。

這樣看來，儒家的思想是於權威的因果性之下，而實行壓迫和束縛的政策的。士大夫階級的思想既然繼承儒家的思想，所以就其本質說，也是壓迫和束縛的。其在經濟方面，則墨守舊法，不許人們作奇技奇器，其在政治方面，則不許民衆參政；其在精神生活方面，則一切學術的研究都受儒敎的支配，凡學問有反於儒敎的信條者，都視爲邪說，一律禁止。一切社會現象既然受了壓迫和束縛，社會自然不會進化。

第三節　資本主義文化的特徵

資本主義社會是繼承封建社會而發生的。西洋的封建社會亦和中國封建社會一樣，缺乏自由的空氣，不問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都受盡壓迫和束縛，而妨害其進步。資本主義之歷史的使命則在於一掃社會各方面的壓迫和束縛，所以資本主義文化的特色爲自由主義。

先就經濟方面說，在經濟生活上，掃蕩中世的拘束者，乃爲由蒸氣機關的發明而發生的產業革命。產業革命把手工工業變爲機器工業，把家內工業變爲工廠工業，把小量生產變爲大量生產。一言以蔽之，生產力因爲機器的使用，逐飛躍的發展起來，這個現象實可使從來的經濟關係不能再維持下去。機器及工廠的所有主，卽近世資本家，把小規模的手工業者驅逐出生產界之外；而粉碎了基爾特及一切產業的拘束。同時又因爲大量生產和交通機關的發達，而變更了交換形態，於是大規模的近代的商業逐見發生，從而商品的市場亦成爲世界的。

在舊經濟關係崩壞了之後，新發生的，則爲經濟的自由主義。經濟的自由主義以干涉個人企業家爲有害於產業而排斥之，許個人有用最便宜的價錢購買必要品並用最昂貴的價錢販賣生產物的權利。這個權利和慾望則由自由競爭，受供需法則的支配，而得調整。

然則經濟的自由主義，對於產業又有如何作用呢？社會主義經濟學者 Pavlovitch 說：

「在從前，資本主義的基礎是自由競爭。當時有無數的工廠——製糖工廠，皮革工廠，紡織工廠，製鐵工

廠等。牠們皆互相競爭，各工廠主要奪取市場，要奪取買主，不能不與他工廠主競爭。這個自由競爭卻是工業的進步，製造品的改良，價格的便宜的根本條件之一。例如製造鐘錶的人，彼此之間，不能不互相競爭，他們在國內和國外的市場要打敗競爭者，必須應用新式的機器，而購置新發明的器具和最良的材料。因此，最良的貨物遂能用最廉的價格，出現於市場之上。這個自由競爭雖可使商品的價格跌落，而改良其品質，但必以技術的進步，新機器和新發明的應用，為前提。』

『自由競爭的時代是技術不斷地進步的時代。各國都製造了更良的機器，更良的農具，更良的，更堅固的，更有速力的，更便宜的勞動機。這個競爭不但擴張到國內的全部市場，且又發現於與外國商店鬥爭的場合。』

經濟的自由主義之歷史的使命，觀此數語，大約可以明白了。中世的生產關係因機器的發明而廢止，代此而興的，則為自由主義的原理。自由主義能夠刺激社會的生產，增加物質的富，這是任何一人都不能否認的。

次就政治方面說，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最初先表現為反對專制政治的運動，一方引起了活潑的理論的主張，他方引起了猛烈的實際運動。

在封建政治與專制王政之下，人民是沒有絲毫權利的。至於人民的權利須用法律明白規定；這個法律須由民選的代表制定；執行法律的人亦當服從法律；在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是平等……這些一切乃是政治的

自由主義運動的第一步要求。所謂人民是主權者；所謂人民的權利爲天賦的權利，不得讓給別人；所謂立法者當由人民選舉；所謂法律是全民意志的表現，行政官不過是全民意志的執行者，反抗全民意志便是反對自己，而須處以刑罰……這些一切主張都是其理論的背境，終而爆發爲法國的大革命。我們若看一七八九年的法國人權宣言便可知道。人權宣言第一條說：「人類之於權利，生於自由平等，且生存於自由平等，社會的不平等，除爲公共利益之外，不得設置」第二條說「一切政治的結合的目的，皆在保全天賦之非時效的人權。這種人權就是自由，財產，安甯和反抗壓制的權利。」第三條說「一切主權的淵源，都在國民，無論如何團體，如何個人，除明文所載出自國民之權力外，不得行使。」第五條說：「法律爲共同意思的表現，一切公民有本身或用代表，參與法律制定的權利。」第十七條說：「要保障人權及公民權利，應該有公力。公力是爲一切人民的利益而存在，不是爲受這種權力的委託的人的特殊利益而存在。」這都可證明當時實際運動乃與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相一致。

第一期的自由主義政治運動若可視爲打倒專制政府而獲得民主政治或憲政政治者，則第二期的運動，在英國乃開始於 Chartist 運動，在歐洲大陸則以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爲一轉機而開始爲普通選舉運動。憲法雖已公布，議會雖已召集，若議會只代表少數的國民，則自由主義的原則尙不能稱爲完成。因此，歐美各國十九世紀後半的歷史可稱爲選舉權擴張運動的歷史。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葉，很多的國家都實施

了普通選舉，至大戰後，有些國家尚承認婦女有參政權。

三就精神方面說自由主義不是社會一部分的原理，乃是浸透於近代人類社會一切部分的原理，卽不問有形物或無形物，凡使社會不能進步的一切拘束，都破壞之。

有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候，教會的權力（這個權力與舊支配階級乃有密切不可離的關係）亦受了制限，甚者且被廢除了。有產者政府剝奪了從來握在教會手裏的特權，宗教視爲各人的私事，這便是所謂「政教分離」。同時又打破從來迫害異教的制度，任何市民都可公然信仰自己所欲信奉的宗教，換句話說，人民有信教的自由。

其次爲思想的自由，思想實如和布豪斯 (L. J. Habhause, Liberalism) 所說，是社會的產物，所以如果不能向他人發表，與他人交換者，不能稱爲思想的自由。因此，思想的自由又具體化爲言論及出版的自由。任何一國，人民若支配於專制政府之下，一定出來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任何一國，有產階級無不爲獲得這些自由而作戰。

教育亦採用自由主義的原理。第一則把指導教育的責任，由教會而移於國家，第二則科目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與實際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學問，以代替中世時代的空泛學問，第三則打破中世時代教育的形式主義，先則盧梭提倡自由教育，次則裴斯塔洛齊 (John Heinrich Pestalczzi) 福勒伯爾 (F. W. A. Froebel)

等提倡個性敎育，終則赫爾巴特 (John Friedrich Herbart) 又加以修正，而成爲近代的敎育學之基礎。敎育的民衆化又普及於全國各地。出版的自由，印刷術的發達，而又加以新聞的勃興，那末知識自然普及於民衆之間了。其結果則在人類史之上，現出學術的黃金時代，而爲前古所未有。在其間，猛然勃興者，則爲自然科學，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實用方面，各種發明都接踵而生，使人類的生活和世界觀，完全一變。

第四節　資本主義文化的破綻

資本主義文化的特徵及其對於社會的貢獻，大約如上所言，但是到了現在，促進資本主義文化發達的自由主義，又在各方面發生破綻了。

自由主義先在經濟方面發生破綻，而陷入窮途之中。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的意見，社會的經濟關係，若任其自由，不加干涉，必能調整，成爲體系。例如某商品的價格若失之過高，則資本家必競爭生產這個商品，從而其價格遂見下落。就是因爲各競爭者都競爭自己的利益，終則在社會上，乃生出公正的結果。但是自由競爭除了這樣的調整作用之外，又可發生生產過剩的現象，例如社會若需要嗶嘰過多，企業家可得到巨利，則必有很多的企業家競爭製造嗶嘰，由是嗶嘰價格遂見下落，終而落到生產價格之下。這便是經濟的恐慌。生產過剩及其結果的經濟恐慌，在社會尚以自由競爭爲其產業的指導原理的時候，乃爲必不可避免的現象。每次恐慌又

必引起產業的縮小，職工的解雇，資本家的破產等各種現象。

產業的自由競爭，便是產業的無統制。而其結果則可使自由競爭的生產方法須用巨大的經費，而成爲最不經濟的生產方法。原來社會對於某一類的商品應該需要若干，縱令能夠預先測定，但要應付這個需要，不免有猛烈的競爭。各競爭者無不想多應付些許的需要，而生產較多的貨物，由是販賣的時候，遂用巨大的經費於廣告和宣傳。因此，在自由競爭之下，貨物不能便宜。

資本主義打破了從前的身分制度，使一切人民有平等的機會。但是平等的機會纔見開放，而自由樹的果實，即爲少數人所獨占了。一般大衆變成無產階級，失去其從來獨立的地位，除賣其勞動力於少數資本家之外，沒有生活的方法。這些無產階級得了極便宜的工資，在極汚穢的工廠之中作長時間的勞動，其狀態與奴隸無異。嘿茲曾說明這個情形如左：

「人們都以爲得了自由，一定能夠得到幸福與繁榮。產業最解放的英國，果然是最富裕。英國的資本家比別國的資本家都富，英國的工廠商船比別國的工廠商船都多。自由的果實很像古代寓言中的黃金的林檎。但是自由之樹不但生了黃金的果實，且又生了苦澀的果實——勞動者。初期的工廠極其粗陋，通風和採光都不完備。英國的自由人則受「契約自由」的眷顧，在這樣陰鬱的建築物之中過着日子。鑛山之內，無論男工，無論女工，無論童工，都要工作。這些女工則當爬行於隧道之內，挽炭車而搬煤炭。十九世紀之初，英國解放

黑奴，不許英國殖民地的奴主再使成人奴隸每日作八小時以上的工作，少年奴隸每日作六小時以上的工作。但是白人的市民乃不能受到這種保護呵！法律對於貧民的子弟曾規定可使其服務於强制勞動；有了這個法律，遂致成千成萬的五六歲小孩，離其父母而販賣於各工廠。他們在工廠是沒有工資的，只換得最下等的食物充飢。若使小孩不肯勞動，則鎖其雙足，懸於機器之上，至夜又囚於小屋之中。他們的勞動時間，早上由五時或六時始，晚間至九時或十時止。」(Carton Hayes: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P. 85—86)

資本主義本來希望實現萬人自由平等的社會。然其結果不但不能實現，而且財富反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上，至於大多數的民衆，其境遇乃比較古代的奴隸更見悲慘，所以自由主義可說是已完成其當初的使命，現在祇妨害社會的進步了。

不但此也，資本主義組織一面破壞了多數民衆的生產機關，使他們變成貧窮，而淪落爲無產階級，同時又發生了一大堆的失業者。失業者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不但是必然的現象，而且是最必要的產業預備軍。何以呢？資本主義社會因爲生產的無統制，遂使市況一盛一衰。需要增加，則當下動員令於農村及村市的子弟，而吸收於工廠；需要減少，則生產過剩，又當吐出前所吸收的職工於工廠之外，使他們充斥於勞動市場，以待好市況時的再吸收。這種現象，由資本主義社會觀之，乃是絕對必要的。

由新機器的採用，資本的集中，大工廠的設立，遂使生產力不斷地發展起來。這個生產力的發展不但與職工的增加不相稱，反而可減少職工的採用。由是失業者除受了市況盛衰的支配之外，且又永久的增加起來。凡固執自由主義的原理者，必以此爲無可如何的問題，其實資本家亦假藉「產業的自由」反對政府的一切干涉。

現在再論政治的自由主義的破綻吧。資本主義社會一面以自由主義爲其理論的基礎，同時自由主義又與國家主義同其意義。何以呢？初期資本主義的自由，乃指由法律而使權利平等，換句話說，卽指由國家而使權利平等。因此，資本主義一面是自由主義，同時又是國家主義，任何一國，當資本主義方纔產生的時候，無不統一其國內，而形成爲近代的國家，便是明證。

但是資本主義兩方面的「自由」和「國家」，在推翻封建社會之時，雖然互相結合而無矛盾。然推翻了之後，乃暴露出矛盾的現象。

第一，打破封建時代割據的局面的力，現在又欲突破資本主義國家的境界了。這是因爲生產力和交通機關的發達，而使市場成爲世界化的緣故。於是從前保障進步的國家，乃漸次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勢力，對於要突破國境的力，竟然嚴築防堤，以妨害之了。關稅，軍備，排外的國家主義便是其結果。

第二，如前所述自由之樹，對於資本家雖給與以黃金的林檎，而對於大多數的民衆則惟結了苦澀的果實。在國內既然發生了利害不同的二個階級，則保障「自由」的國家絕對不能同時包容利害相反的兩階級，於是國家遂變成代表支配階級卽有產階級的利益的機關了。國家之階級的性質，由此愈見明白。

財產私有的自由，不過使少數資本家的財產能夠安全；選舉權的擴張，不過使有產者的代表，假國民代表的名稱，而送於立法院之內。這樣一來，在有產階級則以保守既存的國家秩序爲「自由」，在無產階級則非變更固有的社會秩序，不能得到「自由」。於是用「自由」的名稱而成立的國家，乃變成自由的壓迫者了。國民的自由到處均受國家的壓迫，國家愈益反動，把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一切社會機關，都用爲壓迫國民的工具，廢棄了保障自由的法律，而制定抑制自由的法律。常備軍膨脹到國防所必要的限度之上，警察亦擴張到維持治安所必要的程度之上。這樣，資本主義社會愈成熟，雖然普及了形式的民主主義，但國家乃愈發揮反動勢力的特色。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二大原理，乃愈益自相矛盾了。

那末，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社會會生出怎樣的現象呢？恩格爾曾用簡潔的筆描寫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如左。他說：

『犯罪年年增加，從前盛行於白晝的封建的罪惡，現在雖然一掃而盡，且已驅除於後方。反之，從前行於秘密之中的罪惡，現在則公然行之而不怕了。商業愈成爲詐欺之術，法國革命的標語「博愛」，在競爭的市

場，竟表現為奸謀與嫉妬。暴力的壓迫雖然消滅，但買收的壓迫竟代之而興。社會的勢力，從前是劍，現在則為黃金。初夜權由封建的領主而移於有產階級的工業家。賣淫極其流行，幾是前代所未聞。結婚雖須得法律的承認，但無異於秘密的賣淫姦通之數，則更增加不已。」（恩格爾著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要之，由封建社會變更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道德觀念亦復一變。封建時代的罪惡雖然減少，但封建時代的道德亦復消滅。民衆淪落為無產階級；同時家族制度的基礎大見動搖，而家長的權威亦至微弱無力。其中如日本者，雖用法律維持家長的權威，但其法律不能不傾向於反動的。其實，無產階級的家庭在經濟上已使封建時代的家族制度失去存在的理由。家內工業既然變成工廠工業，則家族已非獨立的經濟單位，而家長亦喪失了維持一家經濟的能力。在這種現象之下，家族制度何能不崩壞，夫婦父子間的道德何能不變更？

以封建領主為對象的「忠義」（Royalty）的觀念，於封建制度崩壞之時，亦歸消滅，一方變為愛國心，他方變為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雇傭關係。忠義變為愛國，乃是因為地域經濟變為國民經濟，即因為共同生活單位的擴大，不得不然的。至於主從關係變為雇傭關係，則因為一切社會生活都採取現金主義的緣故。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切都可換算為貨幣價値，即一切都可化為商品。一國的政治乃為金錢之力所左右，同樣言論，學問，良心，信仰，貞操，亦可用貨幣交易之。

財富愈增加，社會上一部分的人愈益奢侈，由是一切不生產的，破壞風俗的施設和職業，乃增加起來了。

第五節　資本主義文化的最後階段

自由主義在各方面既然陷入絕路，由是遂不能再爲資本主義社會的指導原理，代此而興者，則爲帝國主義。Pavlovitch 在其所著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基礎中，有下列的文句：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的發展，又是其直接承繼者。但惟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高階段的時候，纔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完全變化於正反對的方面而形成爲由資本主義向其更高的社會的經濟組織而前進的過渡狀態。在這個過程，根本的經濟要素乃用資本主義的獨占以代替自由競爭。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及一般商品生產的根本特性，獨占則爲自由競爭的正反對，但現在則自由競爭已漸次變爲獨占了。這樣大規模生產壓倒了小規模生產，更大的工業代替了大工業，生產愈集積，由此遂發生了獨占——卽喀特兒，新迪克，托辣斯，把無數銀行的資本合併於獨占的事業而獲得了極大的利益。」

甚麼叫做獨占？簡單說，便是自由競爭的消滅。有了自由競爭，物價可以低廉，品質可以良好，機器可以改良，然此對於資本家是沒有利益的。因此，資本家乃組織了聯合，以制限貨物的生產量，協定貨物的價格爲目的。若使外部有向這個資本家聯合——托辣斯或新迪克——挑戰者，則全部把價格降低至生產價格之下，用全力

擊破敵人，驅逐該競爭者於產業界之外。

所以自由競爭的時代，是技術不斷地進步的時代，是生產力不斷地發達的時代，反之，獨占的時代則可阻害生產力的發達而停止技術的進步。這便是資本主義已完成其歷史的使命而阻害社會進化的時代，即所謂「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

帝國主義之經濟的意義，若由其對外觀之，更可明白，在資本主義的初期，資本主義國因爲要求市場，乃向世界各地謀獲得殖民地。到了世界大戰以前，地球上已經沒有再可獲得的市場了。現在試把一九一四年六大强國的殖民地的面積和人口，與其本國的面積和人口，比較如次：（地域單位百萬平方粁，人口單位百萬人）

國名	殖民地		本國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國	三三·五	三九三·五	〇·三	四六·五
俄國	一七·四	三三·二	五·四	一三六·二
法國	一〇·六	五五·五	〇·五	三九·六
德國	二·九	一二·三	〇·五	六四·九
美國	〇·三	九·七	九·四	九七·〇
日本	〇·三	一九·二	〇·四	五三·〇

世界市場已盡爲人分割，則各國自然不能再在世界市場，繼續其自由競爭了。他們此後要想獲得新市場，必須奪取他國所已占領的市場。於是在國外，亦與在國內同樣，世界大工業家之間，成立了獨占的協定，終則自由主義前期資本主義的根本特性，使資本主義對於文化的進步有所貢獻者，現在則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已死滅了。資本主義國競爭進入於帝國主義的階段，在經濟上則有國際的托辣斯和新迪克，在政治上則有列强之間的同盟和協商。

帝國主義打破了小資本家之間的自由競爭；獨占的金融資本家的力量亦澈底破滅了國內的競爭者，然在國外，則因爲不能用普通手段去奪取市場，由是又更進而採用攻擊的手段。其中最有効力的，則爲大規模的Dumping 大戰之前，德國對於南斐及中國，常採用這個戰法。由是國家一面逐高築保護政策的城壘，同時在他面愈益擴張軍備，把巨大的獨占資本武裝起來，弄到結果，則國民常受軍事費負担的壓迫。現在試把一九〇八年六大强國的軍事費與全部經費的百分比，列表如次。

國別	百分比	國別	百分比
英國	四八・六%	日本	二五・一%
法國	三七・〇%	德國	二八・三%
俄國	三五・六%	美國	五六・九%

軍備競爭的結果，自然非引起戰爭不可。無限伸張的生產力，無限要吸收利潤的獨占資本，既然互相對立，

而又加以大規模的軍備，則其必然的結果，自然非戰爭不可了。不過這個時代的戰爭，其性質又與資本主義初期時代的戰爭不同。資本主義初期的戰爭，乃是被征服國家欲獨立於專制國家之外而作戰爭，即要求國民統一而作戰爭。反之，帝國主義的戰爭則爲掠奪戰爭，即非爲解放而戰爭，乃爲征服而戰爭，非爲自由而戰爭，乃爲支配而戰爭。列甯曾說明初期資本主義的戰爭之歷史的性質如次：

「法國革命對於人類可劃一新時代。自法國革命而至於巴黎公社爲止（一七八九——一八七一年）有產階級之進步的國民解放戰爭，乃欲撤廢封建的專制和外國的拘束，而成爲特殊戰爭形式，這是進步的戰爭。一切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對於人們（有產階級）要廢除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及國民的壓制者，無不給與以同情而幫助之。在法國革命戰爭之中，法國人雖然有掠奪或占領外國之事，但此次戰爭能夠震動歐洲的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基礎，所以其歷史的意義並不因是而變更。在普法戰爭，德國雖然掠奪了法國，然數百萬的德國人有了此次戰爭，竟然能夠脫出二人專制君主——即俄國的沙皇與法國的拿破侖三世——的壓制之外，所以其歷史的性質也沒有變更。」

反之，最近的世界戰爭又復如何？德國自稱爲要保存德國的文化而作戰，聯合國則宣言要由德國的野蠻主義之中擁護自由，文明，和民主而作戰。其實這一次世界大戰不過因爲新帝國主義者德意志要想打破舊帝國主義者而奪取市場，反之，舊帝國主義者則欲撲滅新興的帝國主義者，兩相衝突，而後發生的。換句話說，這一

次大戰不過是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

帝國主義的弊害，不但如上所述而已，資本主義到了最後階段而發揮其帝國主義的特性的時候，國家又將愈帶有保守的反動的色彩。巨大的獨占資本隨意操縱政府，操縱議會，國家的政策完全爲大資本所左右。階級對立愈益鮮明，而其鬥爭愈益尖銳化，終則武裝的支配階級——大資本，竟然制定了反動的法律，充實了常備軍與警察，——把從前允許國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都歸於無效。

社會木鐸的新聞紙，變成財閥的機關，國民代表的議會，變成財閥的走狗。大資本家的力量竟然利用了買收與暴力，以獨占一切國家機關。學者不能自由發表其研究，宗教家不能自由布教，教育家只能於教育大臣及視學員的監視之下，教授學生。

反動團體由財閥受了直接的援助，由政府及政黨受了間接的援助，這的確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別的產物。這些團體常使用暴力，壓迫進步的運動。同時，以政府當局爲中心的反動勢力則擴張其組織於民間，以對抗新興的勢力。國粹主義，家族制度的維持，排外思想的提倡，都是其結果。

要之，資本主義本以自由主義爲特徵，當初可促進文化的進步，而實現自由與解放。到了資本主義以帝國主義爲特徵，則其內的矛盾愈益發露出來，可使一切進步停頓，又可壓迫自由，致人類不能爲更進一步的發達。

第六節　社會主義文化的形相

帝國主義雖有種種的弊害，但其在歷史上，我們又不可無視其意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其中乃含有很多的新社會秩序的要素。

包存於帝國主義之中的新要素，第一是產業的統制。這個統制本來是由獨占而發生，即由資本家的協定，以維持價格及絕滅自由競爭爲目的的。即非以社會的利益爲目的而行統制，乃以謀資本家利潤的安全而行統制。獨占若使獨占者不是私人企業家，則此之資本主義初期的無統制的生產方法，的確有更好的科學的性質。

第二是國家自爲大資本家。郵政，電信，鐵道，烟草大約都爲國家所獨占。這些產業漸次國有，實可指示一切產業的國有化的推移。不過在資本主義時代，國家不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國家，乃是代表少數有產者利益的國家，因此產業雖然國有化，然其利益亦僅歸於有產階級所得。但這可由全民奪回有產階級的政權而更正之。

第三是國際主義。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激烈的競爭。但是獨占由其本質觀之，是超國境的。資本突破國境而相團結，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既是世界的，則帝國主義國的對立自然可妨害經濟的世界化。於此，遂發生了資本主義的矛盾，有產階級把無產階級放在國家主義之中，而自己於必要的時候，又與他國的有

產階級握手，世界經濟乃要求國際主義，我們若看萬國和平會議，國際聯盟，及其他各種國際平和機關，便可知道。在國內鎮壓自由競爭的力，在國際亦須鎮壓自由競爭。不過在資本主義的時代，只能發現爲强國搾取弱小民族罷了。

帝國主義的要素，到了將來，當如何發展呢？此若不能認識，則將來的文化亦不能預想。我們以爲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只有無產者大衆，於是逐生出一種矛盾的結果。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延長，社會主義乃產生於帝國主義之中，然社會主義又與帝國主義相對立，這便是歷史之辯證法的進化。

在此立場，我們便可預測社會主義的文化。社會主義的文化在經濟上可用「社會化」(Socialisation)代表之。甚麼叫做社會化，就是一切產業都歸於社會公有，應社會的必要而合理的統制之。

由產業的社會化，一定又廢止了財產私有制度，從而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區別，即階級對立，亦歸消滅。在政治上既然沒有階級的支配，由是社會主義遂以眞正的「民權主義」爲其政治原則。

私有財產既然廢止，則資本主義時代的自由競爭亦必消滅。反之，社會連帶的觀念則出來代替自由競爭，以作社會生活的指導原則。在此意義，社會主義實與個人主義爲對立的物。個人主義既然推移爲社會主義，那末，道德習慣以及一切上層建築亦非變更不可。

又者，在資本主義時代，最初發展爲國家主義，次於帝國主義的階段又發展爲國際主義的傾向，到了社會

主義社會則可完全實現了。何以呢？因爲在這裏沒有妨害的障碍物的緣故。不過在國家主義時代，尙有愛鄉心愛校心等，同樣在社會主義時代愛國心亦可存續，但這個愛國心不久必爲人類共存共榮的理想所融化，而變爲人類愛。

不過以上所述的進步，須以高度生產力的存在爲前提。若使社會上沒有比今日更大的生產力，則產業的社會化不能實現。然高度的生產力乃依靠於技術和科學的進步，所以有人以爲資本主義文化由蒸氣機關而產生，社會主義文化當由電氣學的進步而產生。

第七節　中國文化的將來

看了以上所言可以知道士大夫階級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乃各有各的特徵。現在這三種文化乃同時存在於中國，所以中國社會竟現出動搖和矛盾的現象。

但是士大夫階級文化的運命，到了現在，已經宣布死刑了。原來士大夫階級文化不過是封建社會的遺物，而築在手工業和自然的農業的基礎之上。自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侵入中國以來，破壞了手工業制度，更擾亂了農村的自然經濟，士大夫階級文化的基礎既然崩壞，那末士大夫階級文化本身自然也非消滅不可了。

不過士大夫階級文化崩壞了之後，代此而興的，又是那一種的文化呢？資本主義文化是以自由主義爲特

啟，這個自由主義則產生於初期資本主義的時代。因爲初期資本主義是無政府的，是無組織的，無論資本家或勞動者都要出現於市場，自由鬥爭，而決定自己的權利，因此他們遂以自己爲自己運命的開拓者，信任自己的能力，發展自己的個性，使自己在社會上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有了這個關係，便生出自由主義。

但是他們的自由主義又非放縱主義，他們一面崇奉自由，同時又服從法律，尊重輿論。這個矛盾的性質，在外觀上確是矛盾，其實乃同樣發生於市場關係之中。波達諾夫說：

「因爲生產的專門化，生產者不能用自己的生產物以維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他們不能不把自己的生產物，運到市場販賣。運到市場的時候，他們又當屈服於價格，而受經濟的強制。這個價格不是他們自己定的，他們也不能加以變更。若使價格不利於他們，他們雖然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或繼續自己的營業，也須販賣商品。這的確與滅亡——陷入於經濟的破滅之中，沒有甚麼區別。他們雖然用了很大的努力，而其技術也很精巧，但自己的商品仍舊須用已確定的價格賣出去。……』（拙譯社會主義社會學一二四頁）

『原始社會的家長，對於某構成員若說：「你把你所製的衣服送來」，該構成員就沒有辦法，只有將自己的衣服送給家長。同樣，買主對於賣主若下命令說：「你所製的衣服賣給我半鎊」若使賣主服從了這個命令，一定賣主知道在一定的市場關係之下，除此之外，沒有別法。詳細說，半鎊是市場價格，若使賣主不承認這個價格，一定覓不得買主，而致商品不能發銷。但買主的要求雖是一個原因，賣主發售商品，雖是一個結果，

然買主的意志對於賣主，是沒有權力的，是沒有權威的，這大約是商品生產者所知道的吧。賣主沒有服從買主的必要，同時買主若不出市場上應有的價格，也得不到商品。賣主和買主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能變更這個價格，就是二人乃同樣地服從於這個價格之下……」（仝上一一九頁）

市場價格便是他們的輿論，便是他們的法律。他們在市場上既然養成了服從市場輿論和市場法律的價格的習慣，所以浸假又能服從社會上的輿論和法律，使初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出民主主義的現象。

不幸中國的資本主義雖然現在方纔萌芽，但因爲受了帝國主義者金融資本的壓迫，而致現出獨占的現象。在市場上只有少數金融資本家的獨占，沒有多數產業資本家的自由競爭，因此自由主義遂不能充分發展。一面社會上尚有封建遺物的種種壓迫制度，人民不想打破；同時人民雖然要求自由，但平素在市場上又未曾受到服從價格的訓練，而致任情放縱，無所不爲。沒有法律，沒有輿論，而封建道德又復崩壞，這便是現在中國人墮落的原因。

那末，中國可由士大夫階級文化一躍而入於社會主義文化麼？如前所言，社會主義文化是以產業的社會化爲前提的，而產業的社會化，則只能實行於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時候。因爲資本主義愈發達，則資本愈集中，社會上一切產業盡歸於少數資本家的手上，所以把這些歸於少數資本家手上的產業，移爲公有，而加以合理的統制者，不但事實上容易辦得到，而且對於社會，也不至發生影響。可憐中國因爲受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以

致產業沒有發達的機會，一面極幼稚的生產要具尙分散在民間，同時高級的生產要具則完全沒有，縱令有之，也不過操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既是這樣，何能實現產業的社會化，以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

要之，中國社會還是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一面要由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過渡爲資本主義的社會，然帝國主義的侵略竟妨害其過渡，同時又隨着世界的潮流，欲由資本主義的社會過渡爲社會主義的社會，然物質的條件又不之許。因此，一切文化的好的方面都不存在，反之惡的方面則皆發生，放縱主義，拜金主義，壓制主義，暴力主義，偶像崇拜主義無不存在於今日的中國。

那末，中國文化必須破滅而沒有出路麼？有，只有一條出路，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附註〕本章第三節至第六節是節譯平林初之輔所著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社會問題講座第八卷）而成的。

第五章　士大夫階級問題

第一節　士大夫階級的本質

要研究中國的社會，絕對不能無視士大夫階級。固然士大夫是不是一個階級，很有議論的餘地。有人說：士大夫不過一種身分，不能稱爲階級，因爲階級是由經濟過程尤其是生產過程而發生的，就是某一羣人在生產過程上，有同一的職能，而對於別一羣人的關係，又復一樣的，便構成爲同一階級。士大夫在生產過程上，沒有甚麽職能，所以只可視爲身分，而不可視爲階級。

那末，身分是甚麽呢？階級是勞動過程的產物，身分則爲國家法制的產物，就是人們在法制上，如果地位相同，就可構成爲同一身分。大地主是一個階級，貴族則爲一個身分，因爲前者在生產過程上有一定的職能，後者則沒有職能的緣故。人們由國家法制，取得了一種「貴族身分」的特權，如果他是貧窮的人，他就要到工廠做工，而成爲無產階級，所以身分與階級是二種不同的物，有身分極高而階級極低者，又有階級極高而身分極低者。

身分既是國家法制的產物，那末，士大夫是不是由國家法制而設定的呢？中國自古以來，雖有取士的制度——科舉，但是這個制度，乃於士大夫之中，選擇有才能的人以作官吏；並不是於一般大衆之中，選擇有才能的人，以作士大夫。所以由這一點看來，士大夫不能視爲身分。

那末，士大夫是甚麼東西呢？原來中國社會的編制，乃與西洋不同。縱在西洋，除了生產上兩個基本的階級——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外，尚有許多的社會層，所謂「知識階級」(Inteligentya)便是許多社會層之一。知識分子所以能夠稱爲一種階級者，據日人青野季吉所說，則如次：

「那末，知識階級，在那一點上，與其他階級不同呢？最主要的，是他們乃運用頭腦以得收入，資本家由資本得了利息的報酬，地主由土地得了地租的報酬，勞動者由筋肉勞動得了工資的報酬，知識分子由頭腦勞動也得了許多的收入，所以由收入的源泉來觀察，他們之間是顯然有區別的。」

「知識分子的階級性，不但可由他們收入的源泉來觀察，又可由他們生活的方法來觀察。知識階級有自己特有的觀念生活，這個觀念生活最能表現知識分子有其階級的存在。」（青野季吉著知識階級的根本問題）

綜而言之，知識階級所以能夠成爲一個階級者，第一因爲他們的收入是由頭腦勞動而得的，與資本家的利潤，地主的地租，以及勞動者的工資不同。第二因爲他們的生活是觀念生活，與其他階級的物質生活不同。在

這一點上，中國士大夫的本質很和西洋的知識分子一樣，所以西洋的知識分子若有其階級的存在者，則中國的士大夫亦不妨稱爲一個階級。

不過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與西洋的知識階級，若仔細比較一下，又有不同的地方。西洋的知識階級由其社會上的地位說，是站在兩個基本的階級之間，而爲搖動不定的中間階級，他們非歸屬於支配階級者，便當歸屬於被支配階級，反之中國的士大夫階級，在古代則完全是支配階級，而立於社會最上層的地位。在士大夫階級之上，雖然尚有皇室，但是這個皇室不過是士大夫階級用以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與西洋的知識分子常爲貴族或有產階級所雇傭者，絕對不同。中國有皇室，無貴族，便是因爲貴族的利害與士大夫階級不同，士大夫不許其存在，因此歸於消滅。

最能表示士大夫階級的本質的，莫過於孟子所說：『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力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這句話，所謂「勞心」就是指示士大夫階級的觀念生活，所謂「治人」就是指示士大夫階級在社會上的地位，所謂「食於人」就是指示士大夫階級在經濟上的權利。有了「勞心」的觀念生活，便可生出「治人」的社會上的地位，更可生出「食於人」的經濟上的權利，所以士大夫階級的地位和權利，完全由於「勞心」這個觀念生活，而後產生出來的。

於此，我們就須研究「勞心」何以能夠得到「治人」的地位和「食於人」的權利的理由。原來人類的勞動過

程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便會生出分工與協力的現象。要想結合分工使其成爲整個的工作，要想管束協力使其步調不亂，必須於許多的實行者之外，再置一個指導者。由是人們在勞動過程之中，遂分裂爲二種機能；一是指導的機能，一是實行的機能。前者發布命令，後者則遵守命令而致力於工作；如果後者不從前者的命令，則勞動行程必將引起衝突和矛盾，而致一般人的生活都歸破滅。由於這個必要，遂使指導者在實行者之間得了一種信仰。但是均是人類，何以他們能夠指導呢？便是因爲他們有經驗，能勞心的緣故。因此，人們遂由信仰指導者的心理，推演而信仰一切勞心的人；並由勞動過程上的指導者和實行者的分裂，而謂一切社會活動都須有二種人物，一是担任指導（勞心）的，一是担任實行（勞力）的，前者有「治人」和「食於人」的權利，後者有「治於人」和「食人」的義務。士大夫階級在社會上所以能夠得到那樣偉大的力量者，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考茨基說：

「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區別，頭腦勞動和手工勞動的區別，由生理上觀之，是不妥當的。無論如何純粹的思索，都是肉體的一機能；無論如何單純的勞動，亦非純是筋肉的活動，乃有精神的活動伴乎其中。換句話說，也就是腦和神經的活動。

「但是這個區別，乃是歷史的事實，並不是偶然地任意地發生出來的。精神勞動從來是視爲上品的勞動，尊貴的勞動，以某程度的搾取爲前提的勞動，又是搾取者自己所喜歡的勞動。反之，肉體勞動則從來都是被搾取者，被壓迫者的勞動，所以又是卑賤的勞動……」（Karl Kautsky, Die Intelligentz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精神勞動的尊貴，肉體勞動的卑賤，既是歷史的事實，那末，中國社會由勞心和勞力的機能，而區別為兩個階級者，自然是理之當然了。

第二節　士大夫階級的發生

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與西洋的知識階級，不但在性質上，有許多的共同點，就是他們兩者發生的理由，也有很多類似的地方。考茨基說明知識階級的發生如次：

『在從前，優先從事於精神勞動的，是搾取者自己，至少也是搾取階級的人。例如中世代表精神勞動的教會，便是大地主，因為是大地主，故與封建的搾取直接保有强烈的利害關係。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下，搾取者須埋頭於搾取，沒有從事於別種勞動的時間，更沒有這樣的要求。他們免去了肉體勞動，同樣地又免去了精神勞動，惟以利潤的追求為己事。至於精神勞動則在原則上，成為與資本主義的搾取沒有直接關係的知識階級的特殊任務。這些知識階級是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以換得生存資料而維持其生活的。搾取者自己雖然不從事於精神勞動，然精神勞動的範圍卻天天增加起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用大工業以代替手工業，更把手工業勞動分化為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由是除了單純管理機器的勞動者之外，尚有技師，化

學家，工廠監督等的必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又把國家變成中央集權，把人口移住於大都市，把小國合併爲大國，把需要有特別教養的行政官的廣大複雜的組織體以代替狹小的自治共同體，由是官僚遂急速發展了。國際貿易愈發展，同時國際政治也發展起來。這些一切領域——大都市大國家世界——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生活，又造成了通信及宣傳機關，而有莫大的權力。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又把一切生產變爲商品生產，因之商品生產者間的衝突，又培養辯護士出來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剝奪了大衆的閒暇工夫，破壞了民衆藝術，這個民衆藝術則爲支取現金的營業藝術所代替。……此外尚有許多別種的方法，發達了藝術和科學，增多了知識分子，由是頭勞動腦者的需要增加，其供給也急速增加了。」(Karl Kautsky, Die entelligentz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就是據考茨基的意見，本來支配階級是兼從事精神勞動的，其後因爲資本主義的發達，支配階級要埋頭於搾取，無暇兼作精神勞動，甚至於無暇兼作政治活動，由是遂產生了許多知識階級出來。所以他又說：

「現代國家又有從前國家所沒有的中央集權的官僚組織。現代國家的任務極其繁雜，非有零碎的分工與專門的知識者，不能濟事。但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又剝奪支配階級從前所有的餘暇。他們雖然不生產，惟搾取生產階級以作生活，但他們又不是有閒的搾取者。自由競爭是現代經濟生活的原動力，然因爲有了自由競爭，遂使搾取者沒有寸時的休息，而極端實行激烈的鬥爭。他們一旦敗北，便當滅亡。

「資本家沒有餘暇，沒有休息，而對於藝術的和科學的活動，又沒有甚麼修養。他們雖想規則地參加國家行政，然卻沒有參加的前提條件。在現代，不但藝術與科學，就是國家行政，亦不由支配階級實行。他們乃將實行的責任，一委於工資勞動者——官僚。所以資本家階級是支配而不統治。他們能夠支配政府，已經很滿足了……」（拙譯考茨基著社會革命論二一——二二頁）

「知識分子成了一個階級，亦與無產階級一樣地爲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所特有的物。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可使支配階級不能同雅典的貴族及加特力教會的僧侶一樣地，有興趣和餘暇以顧慮國家的行政事務，并致力於藝術和科學的創造。高級的精神的活動，在以前是支配階級的特權，現在則一委於領受工資的勞動者了。因此，職業的學者，藝術家，技師，官吏，遂急速地增加起來。」（同上四二頁）

知識階級的發生，大約如上所言，我們由此亦可推測士大夫階級發生的原因了。原來中國的士大夫階級乃產生於春秋末季，在此以前，政治活動極其簡單，支配階級便是統治階級，換句話說，土地貴族一面是支配者，同時又是統治者，而行祭政一致的政治。在西洋中世，祭祀是僧侶的事，政治是貴族的事，僧侶是知識的保存者，貴族則爲權力的所有者。中國的土地貴族既行支配，又行統治，更行祭祀，由此可知當時社會如何幼稚了。社會既然幼稚，則在政治上自然沒有分工的必要，從而士大夫階級亦不會發生出來。到了春秋時代，社會漸漸分化，尤其是各國的交戰講和，須有專門人材的必要，同時在貴族內部亦發生了分化，幸運的自然可以維持其本來

的地位，不幸的則當失去土地而沈淪為高等遊民。這些高等遊民如何生活呢？他們是有知識的，因此，他們遂以知識為自己謀生的手段，或講學，或遊說，前者可把知識分子再生產出來，後者則可使知識分子昇為統治階級。到了戰國時代，這些知識分子都乘社會的動搖，做了列國的卿相，而取得統治者的地位，幷唱哲人政治的學說，以鞏固自己的政治的權力，於是士大夫階級遂見成立。

士大夫階級雖然取得了統治者的地位，但是國家的支配權仍舊在土地貴族的手上——因為當時國君便是大地主的緣故——所以當時的士大夫，完全和西洋的知識階級一樣的，他們是統治而不支配，介在壓迫(貴族)和被壓迫(農民)兩個階級之間的。

那末，他們士大夫何以能夠由單純統治階級而變成統治兼支配的階級呢？於此，就要研究中國的生產條件。中國經濟到了現在，還是自然的農業經濟。這個自然的農業經濟是最容易發生割據的封建制度的。但中國農業的生產條件，又不許封建制度的存在。因為中國農業的基礎是築在水利經濟之上。這個水利經濟有只集合各地，共同協力而後才能運用。如果各地割據，只能在河流的一部，建築堅固的堤防，而不顧到全流域，那末，在上流或下流，還是要潰決的。潰決的時候，自然要影響到全河流。水利經濟的破壞無異於破壞中國的農業。由於這個必要，遂成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集權的國家要預防封建制度的復興，不能不打倒土地貴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貴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階級，以組織官僚國家，由是士大夫階級遂永久代替了土地貴族的地

位。在這當中，我們更須注意的，則爲每朝始祖都是出身於草莽之間，他們是豪放的，大胆的，他們能夠得天下，而不能守天下，他們要想守天下，不能不把政權交給細心謹愼的士大夫。士大夫既然接受了政權，遂把國家的組織改造一下，以適合於自己的利益，於是士大夫階級遂漸次變成爲國家的眞正支配者，而皇帝僅是士大夫階級的工具了。中國皇朝更迭不已，而士大夫在社會上的地位，到了最近，還是一樣，便是因爲這個緣故。

士大夫階級的發生，大約如上所言，然能維持其存在到了最近者，則爲儒家思想的影響。一切觀念形態雖然都是適應於一定的社會組織而發生，然觀念形態既已發生了之後，又常影響於社會組織之上，而使其固定化。誰都知道孔子是沒落的貴族，一面講學，用束修維持生活，同時又遊說諸侯，謀得卿相的地位，所以孔子是中國最初的政客。當時除儒家之外，固然尙有許多的學派，但儒家的學說乃最合於士大夫階級的利益。他一面主張忠君，同時又贊成放君。這樣的二重道德，實可把士大夫階級超然於皇室之外，永久保存其地位。何以呢？如果單純主張忠君，則將受民衆的怨恨，而與君主同歸於亡，反之，如果單純贊成放君，則將受皇室的壓迫，而不能存在。儒家能夠視時勢的要求，忽而忠君，忽而放君，故能深得士大夫階級的歡迎，終而變成士大夫階級共同的宗敎，其後經過漢代，遂定爲國敎。

儒敎定爲國敎之後，儒家的思想愈益支配了士大夫階級的心理。那末，儒家的思想是甚麼呢？我在這裏不是研究儒家思想的內容，乃是研究儒家思想的目的。誰都知道儒家思想是由「修身齊家」出發，而結局則歸於

「治國平天下」。「治國平天下」是政治家的職務，而在社會尚未發達，民智尚未進步的時候，人們要用自己的才能，實行「治國平天下」的抱負者，必須置身朝廷，得取政權，而後才有可能性。孟孔栖栖季世，猶復遊說諸侯，教以王道，及乎言不能行，始退而從事著作，由此可知孔孟本人如何注意於取得政權了。

儒家的思想既以「治國平天下」爲其最後目的，而孔孟的行動又欲取得政權，那末，讀了孔孟的書的士大夫階級，自然也想做官了。這個時候如果除了孔孟的書之外，尚有其他學問，則讀書的人固然不能指其全部都想做官，但是中國從前教育，乃專教五經四書，即專教孔孟的學說，所以中國教育方針，不在於啓發民智，而在於製造政治家。這樣一來，不但士大夫階級都想做官，便是一般民衆也以做官爲士大夫階級的特權了。

這個「讀書做官治國」的思想既然成爲士大夫階級的心理，到了後來，士大夫階級又忘卻了「讀書」的最後目的的「治國」，而只知道「治國」的中間手段的「做官」，讀書和做官，合爲一體，由是教育方針乃與「治國」脫離關係，而惟成爲士大夫階級「做官」的工具。到了這個地步，中國的士大夫階級遂完全變成官僚階級。

第三節　士大夫階級在社會上的機能

現代人一聽到士大夫階級，往往發生厭惡的感情，其實這個感情是錯誤的。士大夫階級在過去歷史上，實有很多的功績，不過現在他們的使命已經完成，所以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常讓給別人上台罷了。

那末，士大夫階級的使命是甚麼呢？中國的士大夫一面是統治階級，同時又是知識階級，就是一半是官，一半是師，而行政教一致的政治。他們是官，他們是要統治的，然他們的統治實在勝過土地貴族的統治。土地貴族的統治是不受節制的，惟以自己的利益爲標準，反之，士大夫階級的統治，至少要受儒家思想的拘束。儒家思想是主張王道而排斥霸道的，是主張統一而排斥割據的，前者可使新統治者注意到民衆的福利，後者可使新統治者建設中央集權的國家。這些一切對於中國的社會，都是有利益的。他們反對苛政，他們反對偏安，其得力於儒教者甚多。因此之故，在中國政治上至少也可現出消極「無爲而化」的政象，和暫時的統一而不割據的局面。

但是這種利益不是永久能夠保存的。如上所言，他們讀書的目的，本來在於「治國平天下」，然到了後來，他們竟然忘卻這個「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而惟汲汲於「做官」。當他們尚未做官以前，他們是學做詩，做賦，做文章，做八股的，用這樣的學問，何能實行「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他們不能不消極了。可是社會已非從前的社會，各種複雜的關係，無不要求特別的才能。他們消極，自然不能無爲而「化，」反而無爲而「亂」了。亂事既生，統一的局面因之破壞；代此而生的，則爲羣雄割據，盜賊蠭起，土匪流行。

他們是師，他們是要教育的。他們把貴族階級所獨占的知識，推擴到民衆之間，因之，篆隸繆蟲變而爲民衆文字的小楷，詩詞歌賦變而爲民衆文章的白話，所謂民衆化普遍化的教育，他們雖曾努力過的。可是努力的結果尚未發生，而他們的努力竟中輟。他們讀書的目的，在於「做官，」官既可做，書的內容又何必過問。何況民

智的增進，一面可使政治不容易辦理，同時又可增加官吏競爭者的人數，他們爲自己的利益打算，爲獨占官吏的地位打算，自然要中輟教育民衆化的運動，用極難澁的文章——如律詩八股等——以作取士的標準。於是中國文化不但爲士大夫所獨占，而且又與民衆沒有關係，而成爲有閒階級的一種消遣了。

雖然這樣，但他們在過去歷史上，確曾完成了爲君爲師的責任，這是我們所不可無視的。

他們除了上述的使命之外，在中國社會上，又曾實行過二種的機能。

第一機能是他們常站在皇室與民衆之間，而爲一個調節機。如前所言，士大夫階級一面鼓吹忠君，同時又贊成放君；即主張二重道德的。這個二重道德，對於中國社會，乃有極大的效用。民主政治必以人民有相當的能力爲前程，像中國從前人民那樣的幼稚，絕對不能實行民主政治。既然不能實行民主政治，則欲統治龐大複雜的國家，必須樹立絕對王政，而後才能駕御各地，而舉中央集權之實。但是君權過大，又可釀成君主的虐政。一面要求鞏固的君權，同時又怕君權的濫用，由是二重道德遂有必要了。即君主的行爲無越出一定的限度以上者，則主張忠君的道德；反之，君主的行爲若越出一定限度以上者，則主張放君的道德，於庶民中再擇一位「眞命天子」自居於謀臣策士，而重新建設一個新皇室，所以士大夫階級在政治上是能運用新陳代謝的作用的。

第二機能是他們能夠維持中國民族的存在。民族是什麼，我在別種論文中已有詳細說明了。簡單說，民族乃是言語相同，領土相同，經濟生活相同，精神狀態相同的一羣人的集團。中國社會是極其複雜的，人民雖同住

於華夏之地，但有大山巨川爲阻，彼此不相交通，言語既不一致，生活又相懸殊，至於精神狀態，則更不能統一，然經過數千年之久，漢族仍舊是漢族，而不分離爲無數小種族者，則完全有恃於士大夫。何以呢？中國一般民衆雖然沒有共同的言語，共同的生活，共同的精神狀態，但是士大夫階級一面因爲讀了孔孟的著作，遂生出同一的思想，並採用同一的文字；同時又因爲國家有考試制度，遂有集合的機會，乃用「官話」以作共同的言語，因此，便產生了共同意識，而創造了士大夫的文化。所以中國人民能夠形成爲整個的集團，完全有恃於士大夫。士大夫既然代表了中國的民族，遂由「吾聞以夏變夷不聞以夷變夏」的思想，保存了中國文化，不至淪落爲北狄南蠻的生活。不過士大夫的民族意識是有一定限界的，他們排斥夷狄，是恐怕「以夷變夏」延而害及自己的存在。如果夷狄不妨害士大夫的存在，而保護士大夫的利益者，則他們又將放棄民族的意識，出而主張「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了。所以士大夫階級一面雖有民族意識，同時又有世界主義的思想。

第四節　士大夫階級的末路

中國的士大夫階級便是中國的支配階級，不但他們的目的在於做官，便是他們的生活方法也依靠於做官；因此士大夫的人數與官吏的人數應該保持平衡而後可，如果不然，則由供給需要法則的作用，一定現出政界「恐慌」的現象，延而妨害社會的治安。在中國古代，士大夫階級的人數是有制限的，教育之不普及，文章之難

學習，科舉之難及第，這些一切都可制限士大夫階級的過剩。然自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侵入中國以來，竟把中國一切制度破壞淨盡，就是古代的教育方法也爲學校制度所代替。

原來學校制度是適應資本主義的要求而後產生的。何以呢？資本主義的經營雖以增加資本家的利潤爲目的，但若觀察其經營的實際情形，則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的所有主，從而又不過是利潤的獨占者，至於担當實際經營的責任的，則完全委於技術上和管理上的各種雇員。任何有才幹的資本家，絕對不能以一人的力量，或率其家族親戚，担當經營的全部。所以一個國家欲把資本主義移植於本國，而使其生長者，必當設立學校，大批地生產技術上和管理上的雇員。

在經濟上，成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政治上亦必形成爲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統一國家的完成，已可增加官吏的人數，何況這個時候，國家的機能又復增加，那末，自然更添設了許多的國家機關，而需要許多的官吏，由是更非設立學校，大批地生產國家的官吏不可。

我們不看別的，只看近隣的日本，便可知道。明治維新之後，在教育上最先着手的，是義務教育的實行，其次則爲實業知識和法政知識的啓發，第一是養成有教育的勞動者，以便採用精巧的機器，第二是養成公司的雇員，第三是養成國家的官吏。當時在實業學校讀書者，差不多都入公司辦事，在法政學校讀書者都有做官的資格，而且按之實際，法政學校的畢業生差不多都吸收於國家機關之內，這是我們所知道的。

不幸中國社會還是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換句話說，中國的生產組織還是手工業和自然的農業。在這樣的生產組織之下，而乃採用最新式的學校制度，那末封建社會的下層基礎自然要和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發生衝突了。學校每年一批一批地製造畢業生出來，這些畢業生則沒有謀生的地方，然他們是人類，是要生存的人類，他們要想生存，何能不出而擾亂社會。

在這當中，他們維持生存的唯一方法，只有二條路，而這二條路又是他們從前維持生存的方法。他們從前或爲人師而取得一定的束修，或爲人君而取得一定的祿俸，他們現在亦只有入學界做教員入政界做官吏了。但是學界的教員和政界的官吏，都有一定的數目，何能容納這樣大批的士大夫階級。由是政界恐慌了，學校發生風潮了。

人到窮途，每每想出種種方法。他們絕望之餘，或自己集股開辦野鷄學校，或奔走於失意軍閥之前而變成政客。然前者可把知識分子再生產出來，使已感過剩的士大夫階級更感過剩。後者則可興風作浪，陷中國於內亂之中。內亂愈厲害，產業愈不會發達，由是士大夫階級前因產業不發達而至過剩者，現在又因士大夫階級的過剩，愈使產業沒有發達的希望了。

從來中國內亂，雖有種種原因，然士大夫階級的過剩，的確不失爲重要原因之一。我們若細心觀察一部廿四史，便可發見某朝的文化愈發達，則繼此而生的內亂必愈擴大而延長。因爲文化愈發達，則士大夫階級的人

數愈增加，士大夫階級的人數增加到一定限度之後，常由供需法則的作用，引起政界的混亂。政界混亂，則教育停頓，不會生產新的士大夫出來。但內亂非經過相當時期，等到士大夫階級滅亡將盡，而只殘存社會所需要的數目者，不會停止。這個相當時間則視士大夫人數的多少而定。人數愈多，內亂的時間愈長，人數愈少，則內亂的時間愈短。漢唐與宋是中國文化最發達的時代，又是士大夫階級最出風頭的時代。然漢亡之後，乃有三國的內亂，唐亡之後，亦有五代的內亂，宋室未亡，便發生南北朝的對立，由此種種，可知士大夫階級的過剩與中國的內亂有如何關係了。

但是這個用內亂以減少士大夫階級的人數的方法，又不能實行於今日。今日一面發生內亂，同時在帝國主義者勢力之下的學校，因為受不到影響，又把士大夫階級源源製造出來。亂上加亂，自然是勢所必然的。然而內亂雖然不能減少士大夫階級的數，卻能降低士大夫階級的質。人們生在亂時，求學已不安心，而卒業之後又無把握，則除極少數的人之外，何肯勤懇求學。士大夫階級的質既然降低，自然要失去社會一般的信仰，由是士大夫階級本身遂與過去不同，失去固有的存在，而變成單純的知識分子了。

第五節　士大夫階級的分裂

中國從前的士大夫階級，就其個人觀察，雖然各有各的意見，但若觀察其全體，則均利用君主，以君主為工

具而維持自己的生存，所以當時的士大夫，尚不失成爲整個的階級。然自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侵入中國之後，又把中國的社會組織改造一下。原來中國就其本身說，是要由封建社會而進入於資本主義社會，就其爲世界經濟的一部說，則要由資本主義社會而進入於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之故，中國的資本主義雖然方纔萌芽，而社會上已有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換句話說，中國社會到了現在乃同時發生二個階級——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求奪取國家的支配權。在這當中，士大夫階級又失去固有的存在，變成單純的知識分子，即變成中間階級。他們由其中間階級的性質乃分裂爲二個集團，其一是依附於有產階級，而盡力於增進有產者的利益，其二是依附於無產階級，而盡力於增進無產者的利益。在第一場合，知識分子常把自己同化於有產階級，發揮有產階級的思想和感情，而確立有產者的文化在第二場合，知識分子常把自己同化於無產階級，發揮無產階級的思想和感情，而確立無產者的文化。在這文化運動當中，知識階級很像是指導者，其實乃附屬於二個階級。這是中間階級的性質上不得不然的。

按歐洲各國的知識分子對於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態度，可以分做二種：其一是本來是擁護有產階級，後又變爲擁護無產階級的，其二是自始即擁護無產階級的。第一形式存在於西歐，第二形式存在於俄國，現在試述其原因如次：

西歐各國的知識階級本受有產階級的保護，最初曾帮助有產階級打倒貴族階級，而成立有產階級的社

會。有產階級對於知識階級亦能加以充分的保護，（因爲資本主義有充分的利潤，資本家可以利潤的一部，雇用他們，使他們均霑利潤的利益）使他們在文化上有所盡力。但到了現在，一面因爲利潤的減少，同時知識階級的人數又多過從前數十倍，由是有產階級遂不能保護知識階級的全部，而致在知識階級之中亦發生反對有產階級的分子。這些分子常投身於勞動階級中，指導勞動階級的運動。又者在西歐各國，最初知識階級不但享受有產階級的深厚的保護，而且大半又是出身於有產階級；與有產階級保持親密的關係，所以他們常爲有產階級出力。然現在則知識階級出身於無產階級的，爲數亦不少了。何況勞動階級的勢力又天天增加起來，對於知識階級能夠與以直接或間接的保護呢？則他們代勞動階級出力，又是勢所必然了。

反之，在俄國，則知識階級最初便同化於無產階級，而代無產階級盡力。第一因爲俄國的資本主義乃比較西歐各國落後，而其發達又由外國的資本和國家的權力創造出來，所以俄國資本主義雖然已經發達，而有產階級的勢力尚甚薄弱。換句話說，在俄國，勞動階級的發達乃在有產階級之先，而勞動階級的勢力亦較有產階級爲大，勞動階級自始就能吸收大部分的知識階級，其原因乃在於此。第二因爲俄國知識階級的發生，其情形又與西歐不同。如前所言，西歐各國的知識階級，最初乃由有產階級分化而成，至後始有出身於無產階級的，因此知識階級方纔發生的時候，乃與有產階級保持親密的關係，其後因爲增加了無產者的知識分子，由是兩者的關係纔至疏遠。反之，在俄國，則知識階級最初就是出身於貧窮的貴族和無產階級之中，所以知識階級本與

有產階級沒有甚麼好關係。俄國知識階級於尼哥拉一世之時方才萌芽，其發達則在於亞歷山大二世，尤其在農奴解放之後。由這農奴解放，一面貧窮的貴族愈見增加，同時農民變成工資勞動者的人數亦增加起來。這樣，在俄國知識階級是與勞動階級同時發生的。何況有產階級的力量又甚薄弱，不能保護知識階級，則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投身於勞動階級，代其努力，又是勢之當然了。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由士大夫階級出身的。即他們本來不依附於任何階級，而有自己獨立的存在。但社會既已變更，他們此後當永久分裂為二個集團，各自幫助自己所喜歡的階級麼？抑或和西歐一樣幫助有產階級的，不久亦當變而幫助無產階級麼？這則視中國的經濟情形如何而定，現在不便預言。

最後，關於知識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係，試把考茨基的意見抄譯如次，以供讀者參考：

「知識階級的過剩和生產經費的節省，都可使知識分子沒有求職的機會而發生不滿的感情，但是這個不滿的感情可以結合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麼？在他們兩者之中有沒有共通的利害呢？

共同的利害關係自然是有的。問題所在乃為這些許多的共通利害能不能使他們形成為利害的連帶。若就各個的利害說，則任何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是共通的。這樣的共通利害，雖在工資勞動者與企業家之間，也是有的，勞資協調的理論就是由此而發生。

只惟本質的決定的利害與無產階級相共通的，纔能和無產階級結合。那末，知識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

係，是怎樣的呢？有人說：知識階級的利害，由其本質觀之，是與無產階級相共同的，第一因爲他們亦爲飢寒所迫，第二因爲他們也是賣其勞動力以維持生活。這二個特徵固然是和無產階級一樣，但是飢寒所迫，不是自有文明以來，即有其事麼？工資勞動者不是在十九世紀以前，即已存在麼？然他們何以到了十九世紀才形成爲革命的階級？創造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乃是資本主義的大產業。

若再仔細觀察，則可發見知識階級本身也是沒有共通的利害關係，而只有職業的利害的。醫生與律師，畫家與言語學者，化學家與新聞記者，有甚麼共通利害可以團結他們？不但精神的利害，便是物質的利害，在各種職業之中，也是不一樣的。在這一點上，他們實與大產業的無產階級不同，而有似於不知共通的階級利害而只知職業的利害的中世手工業者。

更進一步觀之，知識階級雖從事於同一職業，然其生活狀態和利害關係，也是不一致的。大規模的新聞社編輯長與一個的通信員，有甚麼利害可以共通？名聞全球而收入駕在王侯之上的醫科大學教授與村落醫生，也有甚麼共通利害關係？因此之故，在他們本身已有激烈競爭，要犧牲別人的利益而開拓自己的進路了。

不但此也，知識階級又是一種特權階級，而與無產階級有別。他們的利害無論如何衝突，但他們都有貴族的性質，精神貴族主義的知識階級，每用種種手段，維持其貴族的封鎖，以保全自己的利益。他們雖然主張

自己的特權乃是因爲自己有非凡的能力，但亦自知這個主張爲不當，因此，遂用種種人爲的障壁，以妨害後進者的闖入。他們反對婦女教育，便是因爲這個緣故。他們這樣的努力，自然與要打倒一切特權的無產階級的努力不能一致。

這樣看來，知識階級的利害和無產階級的利害不但不能一致，而且是相反的。所以欲由利害關係，使知識階級成爲無產階級的朋友者，實在不是妥當的方法。(Karl Kautsky, Die Intelligentz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此外，考茨基在其社會革命論中，又說明知識階級的性質如次：

「他們集合而成爲知識階級。……他們各有身分意識，又有身分的自負心，但因爲在他們之中各部分的利害，過於特殊，所以不能發生共通的階級意識。他們分屬於各個階級和各個政黨，而知識階級對於這些階級和政黨，則供給精神的鬥士。一部分爲支配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他部分爲無產階級而奮鬥，但大部分到了現在，尚有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不但因爲他們多出身於小資產階級，而且因爲他們是「中間階級」，其社會的地位，與小資產階級一樣，乃介在支配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

考茨基的話，雖然只對於西洋的知識階級而言，但亦可應用於現今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故我把牠抄譯出來，以供讀者參考。

附　官吏之商品化

第一節　官吏商品化之意義

吾人欲討論官吏之商品化者，不可不先知商品之意義。商品者不問其直接生產者或關係者，皆不以自己使用為目的，而謀與他物交換時所生產之貨物也。然物與物交換，乃為原始時代的形式；至於今日則一物與他物交換，皆以金錢為媒介。故商品之公式，可定為：

貨物——金錢——貨物

然此時乃以買而賣，商品之意義尚不能完全發揮，蓋價值一元之布帛，以一元之代價賣與他人，更購一元之柴米，無得無失，與今日商品之觀念大不相同也。今日則以賣而買，用金錢購買貨物，更用貨物以得金錢。故其公式，可定為：

金錢——貨物——金錢

此時也，終點之金錢與始點之金錢，必其價額有增而後可。不然，則買賣不成意義。故一元所購之布帛，必

用一元五角，賣與他人。此前後所差之五角，稱爲餘剩價値。故在今日社會之下，商品可定義曰：

商品者，獲得餘剩價値之時，用爲媒介之貨物也。

商品爲獲得餘剩價値之媒介，故一切可爲餘剩價値之媒介者，今日皆已化爲商品，勞動者之勞動力，其最著者也。然中國則更進一步，而將官吏化爲商品矣，請申其故。

夫官吏所以化爲商品者，實官吏本身本有商品之性質也。蓋吾人欲得官吏也，必有多少之自由競爭；既得官吏之後，欲保其地位也，亦必有多少之自由競爭。吾人用自由競爭以得官吏，猶商人用自由競爭，販賣商品；吾人用自由競爭以保官吏，猶商人用自由競爭，繼續販賣也。其中所不同者，則商人獲得商品之手段，爲金錢；吾人獲得官吏之手段，爲才幹。商人獲得商品之目的，在於增殖金錢；吾人獲得官吏之目的，在於發揮才幹。換言之，吾人用才幹獲得官吏，又利用官吏之地位，發揮才幹，以利社會，實官吏之本來意義也。故官吏之公式，可定爲：

才幹——官吏——才幹

然官吏實伴二種利益，一爲祿俸，一爲權力。祿俸者，用之以令官員得營其地位相當之生活也；權力者，用之以令官員可以自由發揮其才幹也。卽祿俸與權力，皆所以達成官吏之目的，非有別種目的也。然官吏之祿俸，每浮出其生活費之上，而生贏餘。官吏之權力，又足助其威勢，以收賍賄。祿俸之贏餘，賍賄之收入，可爲官吏

之極大餘剩價値。於是官吏漸失其本來意義，而爲獲得餘剩價値之器具；而人之要求官吏也，亦不以發揮才幹爲目的，而以餘剩價値之發生爲目的矣。此時也官吏已漸次化爲商品，其與商品不同者，則獲得官吏之手段，仍爲才幹也。是爲官吏商品化之前期。

世上一切活動之目的，皆不外金錢二字。國家之强弱，個人之苦樂，亦無一不以金錢爲前提。官吏既可發生餘剩價値而得金錢，則掌握官吏黜陟權之人，亦欲利用官吏，以收餘剩價値者事之當然。於是前之用才幹以作獲得官吏之手段者，今則用金錢以代之矣。是爲官吏商品化之後期。此時官吏之公式，可定爲：

金錢——官吏——金錢

夫用金錢，獲得官吏，又用官吏獲得金錢者，非其始點之金錢與終點之金錢，價額有所差異，不成意義。故終點之金錢，不能不較始點之金錢爲多。此中理由，實與商品無異也。官吏既與商品相同，故人之謀獲得官吏也，常用商人觀察商品之眼光，觀察官吏，先則定其品質，計其時間，察其場所，而計算其投下之資本與獲收之祿俸，孰大孰小。果投資小於祿俸者，必百計鑽營，惟恐不得，既得之後，又復用商人利用商品之法，蠅營虎佽，增殖利潤。不過商人用間接之法，隱祕之法，搾取消費者勞動者之血液；官僚則用直接之法，公然之法，剝奪一般人民之脂膏。商品支配於供需法則之下，價格已經確定；官僚則權力在手，賍賄可以自由而已耳。

閱者疑吾言乎，今有宦遊之人，旋其故鄉，親戚朋友，聚首談心，其所言者果何辭乎？吾知其上必不問政績

之如何，下必不問其職務之繁簡，異口同聲，惟祿俸之厚薄是問。果吾國人民非視官吏爲一種商品者，何至以商人之眼光，問其餘剩價值之多少乎？且也吾國俚言，不有「做官賺錢」四字乎？又有昇官發財之言，師訓其徒，父教其子，日夜孜孜，未曾或息者，非以此四字爲至上目的乎？夫「做官」爲一事，「賺錢」爲一事，今合而言之者，蓋謂「做官」爲「賺錢」之手段，換言之，官吏爲餘剩價值發生之手段也。夫一國里諺，可表示其國人之思想。Time is money，雖爲西人愛惜光陰之意，然其他面又可表示西人之拜金主義。蓋光陰雖極貴重，然欲表示其貴重，又何限於金錢？今用金錢表示之者，實可知西人以貨幣價值，爲最上價值，用爲標準，而測定一切之物之價值也。有此關係，故西人由拜金主義，而陷於資本家之跋扈。吾國則由官吏生錢主義，而令官吏化爲商品，終而成爲一種誤謬的經濟思想也。不然，則官吏之財產，由於貪邪，他種職業之財產，由於努力，何以貪邪所得之財產，乃與努力所得之財產，在社會上，同受尊敬乎？

吾推究此種思想所以發生之故，實因中國產業不能發達有以致之。中國農業，始自太古，歷化以來，未曾改良，地力既盡，而水旱蝗蟲，又復時至；卽有鑛山，亦難採掘；至於工業，則爲手工之類；而交通又不利便，故商業亦難發達；三者經營慘澹，而所得者，未必能糊其八口之家。至於官吏，則一歲祿俸，可食數年，若加營和，則朞月之間，必成巨富。故無論上下階級，皆以「做官」爲「賺錢」之最良手段。然官吏有限，而希求之人無窮，以有限之官吏，供無窮之希求，勢必至於爭，爭則強者勝，而弱者敗，勝者獲得官吏，而敗者不能不退就他種職業矣。故

曰：農工商之在中國，不過爲一種副業，而從事於農工商之人，皆非出其本意，乃以競爭結果，不得已而就之也。吾國稱農人爲田舍郎，稱工人爲梓匠，稱商人爲市儈，二者皆有輕蔑之意；至於士人，則學習「做官賺錢」之秘訣，爲後來官吏之候補者，故獨受社會尊敬也。然農夫工人商賈，雖不能置身於朝廷，而其所希望於子弟者，亦莫不以「做官賺錢」四字，爲其最高目的。於是官吏不僅爲吾國之一種商品，且爲吾國之主要商品矣。

第二節　官吏商品化之史的觀察

此種官吏商品化之狀態，濫觴往古，並非始自今日。惟因始自往古，故能深入人心，爲國人之一種經濟思想。吾考察其發生時代，大約始自秦漢。蓋官吏所以化爲商品者，乃因官吏可以發生餘剩價值；而官吏之能發生餘剩價值者，又因官權強大，臨於民上，可以隨取隨求；而官權之強大，則與帝權大有關係；蓋官權爲帝權之派生，爲帝權之延長，而吾國帝權之確立，則自秦漢始也。范蠡不富於相越之時，而富於泛舟五湖之日，由此可知春秋之時，官吏尚不能發生餘剩價值，換言之，官吏尚未化爲商品也。及至秦漢，則中央集權，帝位鞏固，官民關係，漸見隔離。官吏漸有權力，漸生利潤，而人民之視官吏，亦漸次視同商品，爲餘剩價值發生之主段矣。其最初現於史上者，則爲漢文十二年晁錯拜爵之疏，凡納粟於邊六百石者，授爵上造；四千石者，授爵五大夫；一萬二千石者，授爵大庶長；應其多寡，高下其級。武帝元朔方年，又賣武功之爵，爵凡十七級。於是官吏遂爲買賣之

目的物，而完全化爲商品矣。其後漸移漸換，有時王室雖未曾視官吏爲商品，而行買賣，然一般人民已深信官吏爲商品，用之以發生餘剩價值矣。晉陶淵明曰：『吾豈爲五斗米折腰耶？』此言雖可表示淵明之氣節，然其反面亦可指示當時人民對於官吏之觀念。蓋出仕乃欲爲國努力，以福社會，非在於五斗米也。有福社會，雖折腰亦復何妨！不肯折腰，非因官職不合於吾人之個性，不能用以發揮天才，裨福社會，乃在於五斗米之厭棄，是淵明亦以官吏爲生產五斗米之手段也。淵明如此，他又何論。此種史料，稍加考察，當舉不勝舉。其中最可注意者，則岳飛「文官不愛錢」之言也。然岳飛雖知文官不愛錢，爲天下太平之前提，而不知文官本身實有產生金錢之性質。希望文官不愛金錢，是猶希望商人不以商品營利也。

官吏之商品化，始於秦漢。然此後二千餘年，尚有種種變更，今試分爲三期，而考察之，如次：

（一）君主集產時代　在專制君主國，官吏之任免，皆出於君主之獨斷，故此時官吏若已化爲商品，則此商品實獨占於君主。君主對此商品，如何利用，雖有十分自由。然君主若謀皇室之安全者，勢不能不博民心之信賴；欲博民心之信賴者，勢不能不細察官吏之人物。故當時官吏雖已化爲商品，然君主亦不能完全視之爲商品，而行買賣；縱行買賣，而對於購買者之利用，亦不許其過量產生餘剩價值。蓋餘剩價值過多，勢必刮索民膏；刮索民膏，必招民怨，而間接亦危及皇室之地位。故在君主集產時代，官吏之餘剩價值，常有制限。然其制限，又由何而定之乎？

夫官吏利潤之多少，既與官吏之刮索民膏，互相比例；而君位之安危，又與人民之喜怒，有所關係。故君主欲謀自己地位之安全者，常欲官吏不生餘剩價值，是故君主所希望之最低餘剩價值，毫無限界。然至多亦欲官吏所得之餘剩價值無危及皇室之安全，出此之上者，必不之許，故君主所許之最高餘剩價值，乃有限界。反之，要求官吏之人，又欲其餘剩價值之增加，故其最高之餘剩價植，亦無限界。然其人要求官吏之時，常比較其所得之餘剩價值與其所失之金錢，孰大孰小，果所失大於所得，必棄官吏而不求，故其最低之餘剩價值，亦有限界。今試比較二者（君主及求官者）所定之餘剩價值之限界，若君主所容許之最高餘剩價值，低於求官者所希望之最低餘剩價值者，官吏之買賣，必不成立。若君主所容許之最高餘剩價值，高於求官者所希望之最低餘剩價值者，則餘剩價值之多少，決定於兩限界之間。此時惟視君主之賢明與帝權之大小，餘剩價值或有利於君主，或有利於求官者。由此觀之，在君主集產時代，官吏之餘剩價值，乃有一定限界。

（二）商品無主時代　清室顛覆，民國成立，國家主權，由君主一身，而移屬於人民全體。此時人民為國家活動之源泉，官吏之任免，刑罪之執行，無一不以民意為歸依。顧人民主權過於模糊，而國家觀念，又難把捉。於是人民主權，遂由模糊而歸於烏有；國家觀念，亦由抽象而移於空虛。人民國家，分離為二，人民不以己身為國權之發動機，不以國家為民意之構成物，國家遂為無主之物，國家既為無主之物，而古代商品化之官吏，亦變成無主之商品矣。

官吏既爲無主之商品，於是欲用官吏獲得餘剩價值之人，乃用先占之法，掠奪官職。然官吏不若土地之可相續者也。而其餘剩價值又不若土地工廠之有制限者也。官吏非可相續，故獲得官吏之人，乃於把捉官吏之瞬間，盡力絞取餘剩價值。此時也，代表國家人格之君主，已歸消滅，代表國家人格之人民，又無能力。由是掠奪餘剩價值之無限慾望，前由君主壓迫而不能逞者，今則除人民反抗之外，一無所畏矣。然人民反抗之能奏効者，當有刑罰爲其補助，而刑罰之有威力者，又惟恃於統一之國權。今國權既已瓦解，故刑罰亦爲無主之物。且司掌刑罰之人，亦爲一種官吏。官吏既爲官吏，亦惟從官吏之本質，求其餘剩價值之增加，更何肯利用刑罰，困人且困己乎？

刑罰既失威力，故人民雖有反抗，亦無效果。蓋刑罰如抄家之類，可沒收官僚所已得之餘剩價值，人民之反抗，除有特別決心之外，惟有迫其辭職。然辭職之後，官僚以前所已得之餘剩價值，固完全無變也。在朝則握極大權力，下野亦不失爲一方富豪，官僚絞取餘剩價值之無限慾望，不但不能由此而制止，且復由此而增長矣。故曰，官吏無主時代，官吏之餘剩價值，毫無限度，此實與皇室時代不同之點也。（君位可以世襲，今日一切官吏，皆不能世襲。可以世襲者，必先求永保世襲之法。不能世襲者，則惟求利用而已。）

（三）商品集中時代　官吏既爲無主之商品，任人爭奪，而其結果，遂現出官吏集中之大弊。此中理由，固與今日資本家絲毫無異也。蓋營業之人，欲求餘剩價值之豐厚也，第一必求生產之增加，第二必求市場之擴

大。欲求生產之增加，與市場之擴大，故用託拉斯形式，擴張工廠，獨占市場。官僚欲求餘剩價值之增多也，第一必求爵級之高陞，第二必求地盤之擴張。欲求爵級之高陞與地盤之擴張，故用督軍形式，布置勢力，獨占地盤。托辣斯用惡辣手段，增大自己之市場，遂致全國之資本，盡集中於少數企業家，演成經濟上之專制政治。督軍亦用惡辣手段，擴張自己之地盤，致全國之官吏，盡聽於少數人之黜陟，演成政治上之專制政治。故曰：中國督軍，即西洋之托辣斯，督軍之割據各省，即托辣斯之分割市場也。然而資本家欲得餘剩價值，惟求商品之暢銷，買者之爲何人，固不必過問，亦無過問之必要。至於官僚則非引用自己之親族者，非僅人情反覆，不可信任，且其入所得之餘剩價值，亦不能增加吾身之財產。於是彼輩不能不引用自己之子弟親戚，而全國官吏，遂爲一二人所獨占矣。

第三節　官吏商品化之弊害

官吏之商品化及官吏之集中，已如上述，然其結果，又何如耶？簡單言之，(一)官吏商品化之時，可以引誘人民獵官之心。一面磨折勞動精神，他面增加官吏候補者之供給。(二)官吏集中之時，可以閉塞仕官之門徑，一面毀滅人民才幹，他面減少官吏候補者之需要。(三)二者相合，遂引起政界恐慌之現象。今試詳論如次：

(一)先就官吏之商品化觀之，在今日社會之上，安樂勞苦，皆以金錢爲前提。然金錢非不翼而至，欲得金

錢，須有獲得金錢之手段。在此等手段之中，孰能多得金錢者，衆必趨之若鶩，此乃勢所必然，無足怪也。今日獲得金錢之法，不外從事職業，而職業之中，則有士農工商。然，農夫耕田，手足胼胝；工者治器，朝夜不息；商人行賈，經營販賣，其投資與勞力，非能卽化黃金收歸己有。萬一水旱之至，市場恐慌，則以前投下之資本與勞力，勢必化作雲煙，不留隻縷。至於官吏，則高車駟馬，安坐享樂，無資本之喪失，無工作之勞僕，而期月之間，動輒巨萬。此與農工商相較，孰優孰劣，衆所共知。夫求富之心，人所同也，避勞求逸，避危求安，亦人情之常也。今官吏致富，較之農工商爲速；官吏之安逸，不若農商工之勞苦；官吏致富之安全，不若農工商致富之危險，人人厭棄農工商，專趨仕宦，勢所必然也。於是乎舉全國之精神與全國之努力，盡集中於官吏，而官吏候補者之供給，遂充斥於朝廷矣。然而吾人當知官吏之致富，在於貪邪，農工商之致富，在於勞動。夫勞動與財產大有關係，財產由勞動而產生者，則勞動必因財產而加勤。今財產旣不由勞動而得，反比例於貪邪之大小，人人蔑視勞動，尊重貪邪，理之必然也。且官吏之致富，在於剝索民膏；農工商之致富，在於生產貨財，一方爲消費的，一方爲生產的，人人皆棄農工商，而就官吏，是生產愈少，消費愈多，國而不窮，安可得耶？

(二)次就官吏之集中觀之，人類組織社會，基於共同利害；共同利害，一面以血緣爲根據，他面以地緣爲標準，二者相結，遂生出各種關係。然在此關係之中，又有濃薄之別，復由濃薄之別，而生出親疏之念。親者欲其安樂，疏者聽其貧窮，此人情之常，不足怪也。今日欲求安樂，必需金錢；而獲得金錢之法，又莫良於官吏，而黜陟

官吏之權，又盡操於一二人之手。彼輩由親親疏疏之念，用其所親，棄其所疏，勢之必然也。於是乎，社會上一切重要地位，乃不以才幹爲標準，惟視一二人親疏爲決定，爲吾戚者雖愚蠢亦居高位，有才幹者若他人亦拒不納。國家公器，遂爲一二人所獨占，官吏候補者之需要，遂因是而大減矣。夫個人用其自己才幹，獲得個性相當之地位，以發揮其獨有天才，實人類進化之原，亦人類天賦之權利也。是故各國憲章，對於人民就職官吏之權，皆設專條，加以保障。今二三人物乃用權力，閉塞人民進取之途，人民抱有才藻，而不見用於世，仰天太息，轉而惡用其才，自然之勢也。而未來之士，既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反而作消極生活，不求進取，亦理所必然也，於是庸者愈多，能者愈少，國而不亡，安可得耶？

(三)由官吏之商品化，遂增加官吏候補者之供給；由官吏之集中，遂減少官吏候補者之需要。而其結果，又何如耶？夫市場之商品，若供給多而需要少者，必生市場之恐慌。此時非縮小供給，或別闢市場，則市場必由恐慌，而陷於混亂。蓋市場乃支配於供需法則之下，二者當保平衡也。此種理法，亦得應用政界，故在政界之中，若官吏候補者之供給，超過於官吏候補者之需要者，則政界恐慌，勢且立現。但官吏候補者半係無能之輩，除投身宦海，以求衣食之外，別無求生之法。而才智之士，又因國內之不安寧產業之不發達，亦無他途可就，此種身的制限，遂可妨害供給之縮少。加之，各國法律，皆定惟本國臣民，始得爲本國官吏，此種場所的制限，又可妨害市場之擴張。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彼輩遂以生存關係，不能不推倒他人所已占之官位，而奪取之矣。然已占

官位之人，又有權勢者爲其後援，故未得官位之人，果欲推倒已得官位之人者，勢當先推倒其主帥。有此關係，彼輩乃羣集而樹一幟，力與當道對抗，對抗之時，何擇手段，而政界之恐慌，遂變爲全國之混亂矣。萬一此派得勝，則其部下人物，盡可彈冠相慶，相率而登仕途，以前占據官位之人，不能不下台告退。然此下台之人，果肯坐視之耶？勢亦必謀地位之恢復，而欲推倒新當道耳。一起一仆，不有底止，此所以民國成立以來，無日安寧也。

第四節　官吏商品化破壞之方法

據上所言，吾人可知中國歷來紛亂之原因矣。再言之，中國紊亂乃由於官吏之商品化與官吏之集中；而二者又由於官吏之發生餘剩價值。故吾人若欲平定紛亂者，當先破壞官吏產生餘剩價值之事。然破壞之道又如何乎？

吾人第一所當討論者，即官吏之任用方法是也。蓋任用之法得宜，則官吏不能買賣，此實破壞官吏商品化之第一要件也。今據各民主國之制度，國家最上級之官吏，固皆由於直接或間接之選舉。（大總統由於直接選舉，各部行政總長，必得議會任信，是間接亦由於選舉。）至於中下級之官吏，則其任用方法，共有三種；第一，由人民選舉之，第二由立法府選舉之，第三由上級官吏任命之。

今試比較三種制度，任用由於人民之選舉者，人民固可自握黜陟之權，而防止官吏之獨占。然一切官吏

皆由民選，則政治生活必融入社會生活之中，舉全國人民之時間與勞力，屢犧牲於政務，人民經濟固有妨害，而國家政事，亦必停滯不能進行矣。任用由於立法院之選舉者，則院內各黨，必以黨派關係，擇有利於已黨之人物，任用為官吏，而此官吏，亦必以政黨之勝敗，直接有關於己，由是選舉之際，將半因報酬，半因私利，假借國家權力，干涉選舉，而官吏遂變為政黨之器具，不為國家之機關矣。且政黨之勢力，消長無常，則官吏之更迭，亦必天天發生。由是官吏一面不能舉其全力，盡瘁國務，他面必以失職在即，而汲汲為退職之計矣。任用由於上級官吏之任命者，則上級官吏，可以包攬官爵，視為商品，買賣贈送，無所不至，且上級官吏多由政黨之力而登庸，故亦必選擇有利於已黨之人物，任用為官吏，如是則議院選舉官吏之弊，又發現於茲矣。

三者皆有弊害，故當視察吾國情形，加以斟酌。若由吾人觀之，則中下級官吏由上級官吏而任命之者，雖有上述各種弊害，但比較的尚優於他法。至其弊害，則可用下列各法救之。

次就任用之資格觀之，或謂民主國之政治，為常識政治，為輿論政治，故行政官，無須資格，若有常識，能從民意而行動者即可。此言雖有一面之理，然實不能用之以律一切官吏。蓋民間輿論，即假定其為至善至美；然亦不過就其大綱而言。至其實行方法，則當恃行政官之手腕。巴刻 (G. E. Barker) 曰：『德謨克拉西雖為 Popular control 之意，然 Popular control 未必當為 Disorganizatoin 之意義，更未必當為 Government by amateurs之意義。彼貿易隆盛之會社，固有不識商務之管理人。然此管理人，不過司掌監查；至於指

揮實際事務，必爲專門家之理事。是故刑事之裁判，雖有二三陪審員，開陳意見，然應用法律，亦必委於專門家之判事。」官吏資格之必要，觀此數語，亦可以知矣。且資格確定之後，官僚必難濫用自己之家人親戚。此實預防官吏獨占之良好方法也。

今日各國對於官吏資格認定之制度，皆爲考試。考試乃於短時之中，決定其人能力，爲法未必正當。但除考試之外，別無他法，故惟加以改良，即第一中央政府當設立考試院，而此考試院之人員，當臨時召集組織，不受行政院之管轄。第二，考試當分二種，一爲學力考試，他爲實力考試。學力考試及格之後，更於一定期間之內，令其從事實務，察其實力如何。如是，則一面可防考試之弊，他面又可防自由任用之矣。

三就任期言之，達步司（Dubs）曰：「德謨克拉西否認常備軍制度，使軍閥無從成立，故亦否認無任期之官吏，使官僚主義，不得存在。然此觀念惟可適用於在上位握權力之政務官。至于下級屬僚，非徒不宜適用，且以固定其任期爲當。」此言實獲我心。蓋上級官吏，權力甚大，若令久居其位，勢必私攬國權而釀成官僚之專制。至於中下級之官吏，毫無權力，雖令久居其位，亦無專橫之可畏。反之，其人地位，若不保證，則上官必任意罷免其人，而任用自己所愛之人，此實官吏獨占之最大原因也。且今日各國制度，皆歸趨於議院政治。議院政治必伴政黨內閣，政黨消長無常，故內閣之更迭，亦必頻繁。上級官吏與內閣有密切關係，其不能久居其位，勢所當然。至於中下級之官吏，則與內閣毫無關係。若國家不能保障其地位之安固，則由政黨之消長，內閣之變

吏，上官之吏迭勢必危及其人之地位。此種弊害，實與前述之議院選舉官吏，無以異也，一九〇一年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於官吏之中分別二種；一爲與政黨有關係之官吏，（如各部總長）他爲與政黨無關係之官吏（如司長科長），與政黨有關係者，可以罷免，與政黨無關係者不得罷免，德國憲法第一二九條曰：「官吏之任命，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皆爲終身」亦爲是也。

四就薪俸言之，官吏薪俸之目的，一面爲勤勞之報酬，他面欲使其人得作地位相當之生活，故決定薪俸之際，當斟酌其事之輕重難易，又當適合於當時之生活程度而後可。而其中尤當注意者，則爲須以民間同種類之公司職員之俸給爲標準，如是，則一面不至因薪俸之過高，致人人均有獵官之心；他面不至因薪俸之過低，而致失去良驥。然此種規定，雖可防止人民熱中仕官之弊，尙不足以安官吏之心。官吏當忠勤盡職，不能兼作他業。失職之後，又不能卒然改就他途。萬一年老而退官位，身死而有妻子，則孤兒寡婦，必至窮於衣食。此若不加注意，則官吏在職之時，勢必汲汲爲退職及死後之計，而作種種不正當行爲也。故當斟酌其人勤惰，及其在職年間，或與退老金，或與遺族撫恤費，使其無後顧之憂，而後可。然此又當與民間公司職員之俸給，保持平均，不然則官吏之利益，又遠過於民間，而引誘人民獵官之心矣。

五就官吏之監督言之，夫官吏所以化爲商品者，因其發生餘剩價值也。官吏之餘剩價值與其謂爲出自薪俸，無寧謂爲出自贓賄。故吾人對於官吏之弄私，當極力監督而後可。監督之法，其積極手段，則爲財政之公

開，消極手段，則為嚴刑之制裁。吾國財政，專尚秘密，故當局便於營私，今用法律，強制公開，實防止官吏營私之最良手段也。然砲台若無火藥，不過冷鐵，法律若無刑罰，等於廢紙。彼輩官僚，非畏財政之公開，乃畏刑罰之制裁故，財政公開之後，若無刑罰以隨其後，則公開亦不奏效。又者，刑罰非僅加其一身，即其人之家族，亦無妨坐以共犯，蓋「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鼹鼠飲河，不過滿腹」其必黃金累累，原田每每者，蓋為妻子計也。孟子曰：「嚮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亦為之」彼輩心理，盡於此。言妻子享弄私之利益，則妻子受弄私之刑罰者，實應報之要求也。妻子為弄私之誘因，以妻子而肯為不義者，則必以妻子之故，而不敢為不義矣，此實預防犯罪之良策也。今世刑罰主義，可分二派：一為應報主義，他為目的主義。應報主義以刑罰為犯罪之報應，目的主義以刑罰為犯罪之預防。弄私罪及妻子，實合二種主義也。夫一國社會組織，乃與其國之文化，大有關係。即社會組織為文化之基礎，文化為社會組織之表現，二者相稱，而復始能奏効。今吾國尚是家族主義，一人有慶，全家賴之。故吾國刑罰，亦當以家族主義為基礎。所謂「罪人不孥」，此乃個人主義之古代及未來之後代所宜用，非今日所可採取也。

第六章　農民問題

任何一國的革命黨要想得到政權，絕對不能無視農民，這不但因爲農民在社會上常占絕對多數，而且因爲農民是糧食的供給者。他把糧食供給都市，又把糧食養活軍隊，如果對付農民的政策，不得其法，那末，農民雖不作積極的反抗，只要消極地截留糧食，都市亦將恐慌，軍隊亦將暴動，使革命政府不能存在。考茨基說：

「飢荒與物價飛騰，成爲全革命（指法國革命）時期中最普遍的現象。有人以爲這是偶然的現象，因爲恰在這些年頭農業的收入很不順利。據吾看起來這決非偶然的現象，是與革命有相互關係的。在那個時代，法國的農村經濟還未脫離自給的狀態。農民對於都市的製造品的需要，除了少許奢侈品以外，可以說是很少；不但一切生活必需的食糧衣服由自己生產，就是簡單的家具與農具亦在農民家庭內自行製造，此外本是市城營業供給的東西，也有鄉村手工業者滿足其需要。

「迫使農民售其食品於都市的，不是他們對於都市製造品的需要，而是國家强制徵收的租稅。假使農民不將其生產品穀物酒牛等類售諸市場，就無法繳納租稅。此外農民還須以自然物繳納地租於其貴族領主，或在其領主的土地上面供給勞力。以這樣的方式集中於貴族領主的生產品，一部分爲貴族領主與其家

屬所消費；一部分則以交易的形式售諸市場，換取金錢，在都市中營其放縱的生活。

「革命的急潮掃蕩了封建領主的勢力在過渡期內，即一切應繳的租稅亦無形豁免了。因爲國家尚未能利用其政治的權利，强制徵收。在這種情形下面，農民自然不似以前有農產品急於求售的必要。他們開始利用新的自由，飽食暖衣，並企圖消滅國家與封建制度所遺留的貧困狀態。惟一的引誘能使農民將其農產品售諸市場，就是物價的騰貴，此外并無理由可使之以賤價出售。祗此一層，已足使巴黎生活昂貴發生與各縣的劇烈的衝突」（黃惠平譯考茨基著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我何故引用考茨基的話？就是要說明革命政府縱不壓迫農民，若使對付農民的政策不得其法，亦可因爲糧食的缺乏致都會發生恐怖的現象。要是壓迫農民，則更不必論了。

前年武漢政府何以崩壞，據當時目擊者所說，完全因爲對付農民不得其法。武漢政府固然誤信共產黨的主張，然共產黨自己的政策也有誤謬。他們不知中國農民的情形，竟欲模彷俄國的辦法，强制沒收農民的土地，因此被沒收的農民暴動了，未沒收的農民截斷糧食了。中國農村經濟，到了現代，還同法國大革命時代一樣，未脫離自給自足的狀態，所以他們也不必把自己的農產物運到武漢求售，由是武漢糧食遂告不足了。糧食既告不足，一般物價隨而抬高，物價的騰貴固然能夠引誘農民將其生產物售於市場，然當時武漢的中央紙幣又復跌落其價格，現金和有信用的紙幣盡給私人保存去，通用於市面的，只有天天跌價的中央紙幣，這個現象又可

使農民不把自己的生產物運到武漢。於是武漢陷入飢餓之中了，武漢政府終爲飢餓而倒。這話是不是正確，著者實不敢斷定。要之，一個政府對於農民若無妥當的辦法終久必至於覆滅，這是無疑的。

若把眼光由現在轉而觀察過去，則更可證明農民問題的重大。原來中國租稅是很幼稚的，只有直接稅，沒有間接稅，在直接稅中，又只有田賦一項，所謂營業稅，財產稅，所得稅等等在古代是沒有的。這個稅法實可表示中國人雖然重農賤商，其實乃保護商人而摧殘農業。租稅既然專依靠於田賦，那末當國家需要財政極迫切的時候，農民的負担當然不能不加重了。農民在平時雖是渾渾無知，不欲動作，然一動就不容易制止。所以農民的負担如果超過一定限度以上者，則農民必因爲勤耕土地於己沒有利益，寧願放棄土地，出而暴動。由農民的暴動，糧食愈告不足，由是全國陷入飢荒，初則土匪滿地，次則羣雄割據，終則王朝更迭。

這樣看來可知一個政黨在其未得政權以前，應該要如何注意農民問題，既後政權之後，應該要如何講求農民的利益了。農業是中國最重要的產業，農民是中國惟一的生產者，又是中國最窮的人。農民的財產並不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無限的負担加在農民身上，便是破壞中國產業，便是驅使數千萬農民做土匪。由是歷史又迴轉了。質言之，初則土匪滿地，次則羣雄割據，終則王朝更迭。

那末，中國農民要怎樣對付呢？原來在農民之中，可由私有地的大小，而分做各種階級層。這些階級層每由

自己地位的不同，而異其階級意識和階級利害。所以對付農民的政策，也應該隨着各個階級層而不同。因此，我們要想研究對付中國農民的政策，第一便須考察中國土地分配的情形。

關於中國土地分配的情形，可惜沒有有信用的統計，供我們參考。即如 L. Madiar 所說：「中國政府雖有統計，但全然是無用的。若把政府的報告仔細加以觀察，有些地方的耕地面積，據這個報告實可大過全面積二倍以上；而統計表中在這一頁所載的耕地面積，又有比載在次頁的同一地方的耕地面積大至二倍或三倍的；並且常有一地方的耕地面積經過了一年增到二倍以上的，而過了一年，又減至一半以下的。」（新生命月刊第二卷第八號中國的農業經濟）用這樣的統計做材料，自然得不到好結果。但除此之外，又沒有別的更有信用的統計。近來日俄研究中國社會情形者甚多，然其所作的統計，也是沒有信用的，往往這一本書所載的統計與別一本書所載的不同，令人不知所從。

中國土地分配的情形，日俄二國所作的統計，完全相反。據俄國所作的統計，中國農民戶數共五六、〇〇〇、〇〇〇戶，各戶平均以六人計算，則農民人數共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在這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之中，地主共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傭農共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遊民土匪兵士及農村的小商人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佃農共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至於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的地主之中，又可分爲，

類別	畝數	人數	占有地
貧農	一—一〇	百分之四四	百分之六
中農	一〇—三〇	百分之二四	百分之一三
富農	三〇—五〇	百分之一六	百分之一七
小中地主	五〇—一〇〇	百分之九	百分之一九
大地主	一〇〇以上	百分之五	百分之四三

若據民國十七年二月日本東亞同文會所出支那年鑑所載，則中國土地的分配狀態如下：

所有面積	總面積	百分率
十畝以下	一七、九一四、二三一	四二、三%
十畝以上	一一、三〇三、五七〇	二六、六%
三十畝以上	六、七一二、三六六	一五、八%
五十畝以上	四、一三七、一三六	九、七%
百畝以上	二、二七三、三五五	五、六%
合計	四二、三四五、六五八	一〇〇、〇%

我們現在不要信用蘇維埃共和國所作的統計，而信用帝國主義者日本所作的統計吧！由日本所作的統

計看來中國土地分配的狀態是很平均的，農民所有土地的面積由十畝而至於三十畝的，要占全體的百分之七十，但是這種狀態到底是好麼，抑或是壞呢？十畝以下的土地固然不必說，就是三十畝以下的土地，也不能算做中產之家，所以若據日本所作的統計，那末中國的農業幾乎百分之七十是小農經營了，在這樣小農經營之下，會生出如何結果呢？李普克尼拉（W. Liebknecht）在其土地問題論一書曾說明法國的小農經營的狀況如次：

「在法國，據最近的即一八六一年的國勢調查所示，人口約三千八百萬人，地主之數共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人。但法國的家族平均比德英二國爲少。在英國合二個家族共有十一人，法國只有九人，法國的地主雖然有很多的人尚未結婚，但法國大多數的人口，亦可由此而謂其有私有地。

法國的小農，八十年來，竟然彷徨於迷途之中。他們今日的經濟的和物質的幸福，亦與一七八九年當時一樣！他們在一七八九年，把貴族的城垣和規定隷屬關係而保證不正的文書，一律焚毀，然而在事實上，竟無所裨益。他們身經無數戰爭，血染三大陸，竟然無益於事！他們在七十五年之中，又戰爭，又勞動，又饑餓，又節食，然結果也是無益無益！這不是不快的夢，乃是苦痛而冷酷的現實。他們所擁護的零碎土地，雖得到勝利的敵人亦不敢染指，然現在竟變成他們的負担，他們的咀呪，他們的束縛，又變成束縛他們而使他們窒息的繩子了。他們以爲可永久脫離古代祖宗的悲慘境遇之外，然而這個悲慘境遇現在又復來臨了！他們的狀態完

與一七八八九年相同！」

那末，李普克尼希又以何者爲根據，而敢擅下這個斷語呢？第一是法國農民的抵押負債的狀態：據一八五一年的國勢調查，農民以所有地爲抵押的債務，竟達到一百億法郎，一八六一年又增加爲一百二十億法郎，卽於十年之內，增加二十億。法國耕地的總價格，共値四百八十億法郎，抵押債務竟有四分之一，由此可知農民的貧窮了。所以李普克尼希說：「一國實行了過小地制度，則由土地所得的收穫，一定比之用合理的耕作所得的收穫更少；此外又可使土地貧瘠，不能生產，且又減少人口，由是國家遂見零落了。法國的小農深受小農法小生產的害，他們過於貧窮，不能購買高價的農具，以作近代的農耕。他們陷入絕望之中，既作辛苦的勞動，——他們的辛苦幾乎要使手足出血了！——而土地和自己身體又復疲憊。浪費勞力，收穫少而地質枯竭，乃是零碎地制度之經濟的特徵。」（參看新生命書局出版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第一部四七——五〇頁）

何以小農經營會生出這樣的弊害呢？原來過小地經營實在不容易維持一家的生計，所以農民不能不兼營種種副業。自都市工業驅逐了農民的自給自足工業之後，過小地的剩餘農業物更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由是副業在農民經濟上的地位，愈提高起來，終則農業竟不以販賣爲目的，而以生產自己所必要的食糧爲使命了。這樣，小農經營遂離開商品生產的領域，而變成家計的一部。健壯的男人都出外做工，土地的耕種則一委於老弱的婦女，這樣一來，農業的生產力自然愈益減少，何況她們力量如果不彀，則過小的土地又可再行細分呢？

所以考茨基說：「所有地愈小，要得副業的動機愈大，副業愈占重要的地位，則土地愈將細分，終則不能供給家計之用了。如果過小土地的經營愈是不合理，則將愈見其然。……這個時候，決定選擇那一種植物而栽培的，乃由於家計的必要，不是由於地力的必要。……爲獲得貨幣而作的勞動愈占重要的地位，爲家計而作的勞動愈變成副次的勞動，則前者可吸收家族中最優秀的勞動力，把自己的狹小土地的勞動，一委於妻，小兒，及殘廢的祖父祖母，父及長兒則當出外儲財。這樣，無產階級的家計遂成爲主婦的苦差和其勞動力的浪費，而現出可憐的結果了。同樣，過小經營的農業既是家計的附屬物，所以其結果也是一樣。」要之，過小地經營必須兼營其他副業，而後才能存在；然既兼營副業，則該地的土地必細分到極端。（同上八六—八八頁）我們試看下列的表吧！

省區	年份	十畝未滿	十畝以上	三十畝以上	五十畝以上	百畝以上
京兆（今河北）	民六	一二五	一八九	一四八	一二二	六四
	民七	一五二	一三五	一四五	一一五	六三
	民八	一六〇	一四一	一五一	一二二	七〇
	民九	一五九	一六〇	一五七	一一五	六四
直隸（今河北）	民六	一、三六四	一、〇八七	七九七	五〇二	二一六
	民七	一、三七三	一、〇八一	七九七	五〇九	二二四
	民八	一、三五五	一、〇九四	八〇二	五〇九	二二三

	民九	一、三六五	一、一〇一	八一七	五二二	二三一
吉林	民六	五二	九七	一一〇	一二二	一五八
	民七	四二	九八	一六一	一三二	一五三
	民八	一三八	一二二	一九四	一七一	一七五
	民九	四五	一〇七	一七七	一三三	一一六
山東	民六	二、一〇七	一、五五二	九五八	四九七	二四一
	民七	二、一八五	一、五三八	九三三	四八八	三〇八
	民八	二、三九〇	一、五〇三	八八四	四三九	一五一
	民九	二、二六〇	一、六八六	八九六	四四七	一九九
河南	民六	一、五九七	一、五六九	一、五二五	八七七	五六三
	民七	一、八三〇	一、一一九	七九九	四九〇	三二五
	民八	二、五六〇	一、六五二	一、〇八六	六五四	三五九
	民九	二、五三二	一、六三〇	一、〇八八	六八六	三八五
山西	民六	二八三	三六〇	三九八	三三八	一五二
	民七	三八四	三九四	三六二	三三七	一五二
	民八	二八三	三六〇	三九八	三三八	一五二

	民九	二八三	三六〇	三九七	三三八	一五二
陝西	民六	六一六	三六九	一八九	八九	六四
	民七	四九六	四四四	二一四	九九	五六
	民八	三九八	四五二	二五三	一四七	五八
	民九	三八〇	四五二	三六三	一九〇	五五
江蘇	民六	二、七二六	一、三一二	四八七	二六〇	八七
	民七	二、三一五	一、二九四	五六七	二七一	九五
	民八	二、二八八	一、三三二	五〇〇	二五三	八七
	民九	二、二二四	一、三五七	五三四	二八二	一〇五
安徽	民六	一、一三一	九八七	三四四	二〇九	一七六
	民七	一、〇三八	九三二	四〇五	三〇〇	一九九
	民八	一、〇二五	九四二	三八七	二二二	六六
	民九	一、一三五	八九四	四〇三	二二〇	九七

如果上面的表，是可以信用的，那末中國農地的再細分，由此亦可看得出了。就是十畝到三十畝的小農增加，三十畝到五十畝的中農也有增加的傾向，五十畝百畝和百畝以上的地主，在直隸（今河北）河南雖有增加的傾向，而就大體說，卻趨向於減少。

小經營的增加，大經營的沒落，很像合於平均地權，其實對於中國農業，乃有極大的惡影響。關於這一點，考茨基曾比較大農經營和小農經營的優劣。小經營者是將勞動的結果收歸自己的手裏，所以人們都以爲他們比較大經營所雇的工資勞動者，一定勤懇許多，而對於工作的注意力也遠勝過工資勞動者。然據考茨基的見解，他們的勤懇是過度的勤懇，是恐怕不這樣勤懇，生活就無法維持，小經營就無法繼續。他們平日既然困苦於過度的勤懇之中，自然沒有得到任何教練的機會，那末，他的注意力周到，又有如何價值呢？若由技術方面看起來，大農經營有下列許多的利益：（1）耕地面積的損耗較少，（2）有生或無生的生產要具可以節省許多，（3）農具可以完全利用，（4）能夠利用小經營所不能利用的機器，（5）分工容易，（6）可用科學的方法以行有系統的管理，所以大經營實勝過小經營。（仝上七二——七六頁）中國的農業既然都是小經營，則其不能發達，自然是理之當然了。

研究對付農民的政策，除了考察土地分配的狀態之外，還要考察農民私有土地的形式。因爲雖然均是小經營，但其中又可分做自耕農，佃農，傭農等等。他們對於土地的權利，既然各不相同，那末他們的意識和利害，自然也不能一致。中國農民私有土地的形式，可用下列的表來說明：

省區	自耕農	佃農	自耕兼佃耕	總計
京兆（今河北）	三六三、九三七	一四二、一一四	一四九、九六八	六五五、七一九

直隸（今河北）	二、八六〇、六四〇	五三〇、七五九	六四四、五四三	四、〇三五、九五二
吉林	二八六、五九四	一五九、六五一	一三二、三一一	五七八、五五六
山東	四、〇〇七、六一八	六六〇、二二〇	八一九、三二〇	五、四八七、一五八
河南	三、五〇三、九七三	一、六六一、七七五	一、一五四、三五三	六、三二〇、一〇一
山西	一、〇七八、六三六	二三八、七二〇	二一二、一九七	一、五二九、五五三
陝西	八六九、一三二	三〇八、一〇四	二六二、七六五	一、四四〇、〇〇一
安徽	一、二七一、八三五	九〇九、二六〇	五六七、八二六	二、七四八、九二一
江蘇	二、〇六〇、二六一	一、三八二、五六三	一、〇五九、二四六	四、四五〇、二〇七
江西	一、七一四、五一〇	一、二四一、二〇二	一、一〇九、二四四	四、〇六四、九五六
福建	五九五、九七一	五二四、五〇九	四一〇、二一五	一、五三〇、六九五
廣東	一、三一六、五〇〇	一、四六三、七五一	一、一四四、八四二	三、九二五、二一七
熱河	四五四、六六五	一〇〇、五三九	一一六、四一一	六七一、六一五
察哈爾	八九、三一〇	二一、三一七	一四、三二八	一二四、九五五

信用統計表吧！根據上表，可知除廣東外，就全體而論，都是自耕農最多，佃農次之，自耕兼佃農的最少。這是何等樂觀的現象呢！但是我們若把這個表同上面的表對照一下，那末就可知道所謂自耕農大約都是過小地的經營主了。小經濟的弊害已述於上，因此，中國自耕農遂同法國的農民一樣陷入負債之中了。E. Varga說：

「現今中國雖然尚有農奴制度，但是這個農奴制度卻不帶有眞正封建的性質。其經濟的本質不像封建制度那樣，領主用暴力把勞動力束縛於土地之上。在中國因爲勞動力的過剩，所以不要採取這個强制。中國的農奴制是由下述的事情而發生，即貧窮的佃農因爲土地的缺乏，乃束縛於地主，又因爲常向地主借債，以致於本來的地租之外，不能不以工資的大部分，歸於地主，由是在事實上，遂把自己的身分引渡於地主，而舉其全部身靈，隸屬於地主。」Varga 的話稍加修正之後，亦可應用於自耕農，就是自耕農因爲土地過小，入不償出，乃以土地爲抵押，向高利貸借錢，利上加利，於是不但土地的所有權在實質上已歸屬於高利貸，而且年年所得的收穫又須把莫大的部分交給高利貸做利息。所以中國的自耕農，實與佃農無異，甚者其生活乃比佃農爲尤壞。「他，他的家，他的房產以及他的些許的土地，都是屬於高利貸的手裏，他的生活比無產者更覺不安。若是無產者至少也可時時過其安穩的日子，但這個被人迫逼的負債的奴隸，乃絲毫沒有這樣的日子呵！」（恩格爾的話參看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第一部三〇頁）

這樣一來，中國農業更沒有發展的希望了。何以呢？自耕農受了高利貸的剝削，佃農受了地主的剝削，他們自然沒有蓄積，而致再生產只能在同一的規模上不絕的反覆着。換句話說，就是只能實行單純再生產，不能實行擴張再生產，然地力是有限的，收穫是遞減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種，收穫何能不年年減少呢！馬克思曾說明佃農制度可妨害生產力的發展，他說：「在農業普通的生產行程中，比較的短時期的投資，都是由

於佃農，這樣的投資……可改良土地，增加收穫，使土地由單純的物質化成土地資本……那與土地合體而耐長期消耗的比較的永久的固定資本，大多也是由佃農投下，然而一到契約所定的佃租期間滿了之後，這與土地體合的改良，就變成土地不可分離的偶生部分，而歸於地主所有。……這個事實又可妨害合理的農業的發展；因爲佃戶由此，將要避去一切在佃租期間內不能完全收囘來的改良和費用。』（參看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第一部八——九頁）不幸中國的自耕農，其地位又與佃農一樣，他們的土地常有被高利貸剝奪的危險啊！

把上面所說的總括一下，中國農民的特質可歸納如次：

（一）就全部說，中國的農業是過小地經營的。這個過小地經營不但可妨害農業的發展，且可使農民的生計貧窮，所以土地的分配雖甚平均，但對於農業和農民都是沒有利益的。

（二）其結果，不論自耕農也好，佃農也好，都陷入負債之中，變成高利貸或地主的農奴，而妨害農業擴張再生產的進行。

根據上面所述的特徵，那末，對付中國農民的政策，便可容易決定了。但在決定政策以前，我們必須知道農民是有極强烈的土地慾的，他們甯願犧牲一切，絕對不肯放棄土地。他們雖然反對高利貸與地主，但是他們所反對的，是因爲高利貸和地主剝削自己，他們所希望的，則要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給他們，把高利貸的債務取消，使他們有了完全的土地私有權。就是他們不是希望土地的社會化，而是希望土地的個人化。無視這個心理，

則一切政策必將引起農民的反對，而至失敗，所以任何社會黨對於農民的土地，都不主張沒收。恩格爾說：「在我們掌握了政權的時候，卽把小農的土地像地主的一樣收為公有，這是我們的想像所不及的。」（仝上三三頁）考茨基亦說：「眞正的社會主義者必不要求干涉農民，至於抄沒農民的土地，則更不必論了。所以當可使小農民繼續其從來的經營，」（拙譯社會革命論一四四頁）又說：「他們相信貧農與富農的階級利益是相反的，貧農的階級利益乃與城市的無產階級是一致的。另外一種人也患了同樣的錯誤，他們相信小資本家與大資本家有不同的階級利益，并且以為小資本家反抗金融資本，與無產階級反抗資本主義一樣。其實小資本家想變成大資本家，亦如貧農想變成富農，增加其財產一樣，社會主義的社會並不是他們所有的理想。」（黃惠平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眞的，小農的骨髓裏面，是浸透有土地私有慾的。他們的狹小土地，愈瀕於危險，他們要保守土地而作的鬥爭，愈見困難，那末他們愈用悲痛的絕望，謀土地的保存。這個時候，如果主張土地公有，他們一定起來反抗，而與主張者為敵了。

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對於中國農民的政策，可揭其綱領二條：

第一，小農經營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障礙，但們卻沒有促進其沒落的任務，也沒有維持其存在的任務，因為小經營既然可使農民陷入貧窮之中，則設法維持小經營，不過是延長農民的貧窮生活，小農斷不能因此而解放。那末，我們要怎樣對付呢？一方小農經營可以妨害農業的發展，同時他方我們又不可促進其沒落，我們的

政策實在很難決定了。關此，恩格爾的農民政策，實可供我們參考。恩格爾對於大地主是主張沒收的，對於小農則不主張沒收（他對於中農和大農的政策，差不多與小農一樣，）他以爲：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反覆說明凡在資本主義支配之下，小農的地位是絕對的無法救濟；他們的小私有地絕對的不能維持下去；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必將驅逐他們這樣陳舊的小經營，使農民自覺起來。此外更須使他們了解，拯救農民的方法，只惟把他們那種個別的小規模的私有地和經營，改爲協同合作的所有和經營，纔是可能。但是大規模的耕作可以節省勞力，所以在小農地方，合併小私有地，而施行大農經營，則必發生勞力的過剩。在這個時候，就須把近隣的大所有地，拿幾分給農民協會使用，或是對於剩餘下來的勞力，竭力供給以工業的副業的手段和機會。這樣一來，他們的經濟狀況就會良好起來，并且可以照着社會理想，誘導農民協會發展到更高的形態，使協會全體同其會員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能夠與共同社會內其他一切部門的權利和義務相調和。這個方策纔是拯救農民的唯一的方法，並且也是直接合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不過實行的時候，應當注意，不可違反農民的意思，強制施行。所以即使社會黨得了政權，對於農民的私有地，也決不能施行強制的沒收，反而應當誘導他們，使其移爲合作的生產。在這當中，必須提供一切援助的方法，或而把他們的抵當負債全數移歸國立銀行，將利息大大地減低，或而拿他們創設大經營時所必要的資金和機器以及人造肥料等各種生產手段借給他們。這種方策才能拯救農民，并且可使農民成爲社會主義的友人。這是恩格爾的見解。（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第一部三四——三

五頁），恩格爾的主張，後來又爲考茨基與列寧所繼承。他們兩人對於農民的政策都不主張沒收，而主張教育，就是一面用新式的機器和其他一切必要的生產手段借給他們，使他們知道社會主義決不是他們的敵人，同時更用種種宣傳方法，使他們集合起來組織農業合作社，并於國有地內，做出必要的實例，給他們看，使他們知道大經營的利益，然後等他們自己來歸附。不過實行的時候，絕對不可反着農民的意思，强制執行。我們以爲這個方法實可應用於中國的小農。

第二，中國農民差不多都是有土地的，——雖然是過小土地——他們現在所要求的，不是希望再把大地主的土地分割給他們，乃是希望他們的負担可以減輕。租稅，佃租，利息已經形成了他們最苦痛的負担。對於這些負担，如果沒有辦法，不但不能得到農民的同情，而且農業仍舊不能發展，中國古代王朝每於更迭之際，即下詔免除農民的租稅數月或一年者，便是因爲要得農民的同情。關於這一點，我們中國的農民可說是完全與法俄二國革命當時的不同。法國在封建時代，土地盡歸於貴族僧侶的手上，俄國在帝政時代，土地亦爲地主所獨占，二國農民都有「土地飢餓」之病，所以革命時代可以土地爲餌，即煽動農民分割土地，而引誘農民成爲自己的友人。反之在中國，這個方法是不行的。中國農民的希望，既如上述，在於要求負担的減輕，所以中國的農民政策，應該（1）廢除從來賦課於農民的一切苛捐雜稅，（2）免除佃租農民已納租稅者，不必再納佃租，（3）取消抵押負債，農民可將典當的利息，交給國家，以充租稅。（4）設立國立農業銀行，用最低的利率，把資金借給農民。

第七章　人口問題

第一節　人口問題的重要性

亞爾伯特•朗格（Albert Lange）說：「人口法則是社會問題的全部。現今對於這個法則，大約是沒有異論的了。其間雖有不同的見解，然亦不過限於極少數的人而已。只惟理解這個人口法則，纔能了解社會的禍患及其原因；只惟知道如何對付這個人口法則，纔能根本消滅社會的禍患。」真的，人口問題是這樣重大的。

但是人口何以成爲問題呢？

人口問題常表現爲失業問題。在一定社會之下，只有一定的職業，現在的人類，除了極少數者之外，都是用職業以維持其生存的。所以人口過多，則職業不能收容全部的人口，一部分的人們必定因爲得不到職業，而致不能維持其生存，由是種種罪惡因之而生。我們若看下列的表，便可知道近來各國失業者的人數是怎樣多的了。（單位一〇〇〇人）

年月＼國名	英國	德國	意國	波蘭	比利時	奧國	捷克斯拉夫	荷蘭	瑞士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月	五二六	三六八	一〇四	—	四九	一六	二〇	三三	一五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一、八〇四	三一四	四一四	六五	一四七	—	三三	三〇	五六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一、九三四	一四九	五四二	一七三	八六	—	三三	六六	八九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一、四五八	二〇	三七二	八七	三六	三八	二三二	三三	五二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	一、四三二	四三	三八二	七五	二六	一一七	四三七	五〇	五三
一九二三年七月	一、三二五	一三九	一八三	六五	一四	八七	二一五	三一	二三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一、二二七	一、五二八	二五九	六八	二四	九八	一九二	四五	二七
一九二四年七月	一、一三五	五二六	一一八	一五二	二一	六六	六三	一九	八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一、二六〇	五三六	一五〇	一五九	三三	一五四	八一	三五	一一
一九二五年七月	一、三二七	一九七	八〇	一七五	三一	一一二	四二	二三	一〇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一、二四三	一、四九八	一一二	三一四	四四	一七九	四八	四五	一七
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七三七	一、七四一	八〇	二六三	一六	一五二	四六	二〇	一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四三二	一、七四九	一九二	一九〇	三三	二〇五	二九	三六	一八
一九二七年七月	一、一一四	五七三	三九八	一四八	二二	一三七	一二	二一	八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一、一九四	一、一八八	四一四	一六五	五六	二〇七	一四	四五	一四
一九二八年三月	一、一二八	一、〇一一	四一二	一六七	二二	二二〇	一八	一七	八

人口問題又常表現爲物價問題。在一定的社會之下，只有一定的生活資料，人口過多，則需要超過於供給，由是物價天天抬高，一般細民更難謀生。下列的表便是指示各國物價於一九一三年以後抬高的傾向：

年月　國名	日本(日本銀行調查)	法國(中央統計局調查)	德國(統計院調查)	意國(巴奇教授調查)	英國(經濟雜誌)	美國(勞動統計局調查)
一九一三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九一四年	九五	一〇二	—	—	九九	—
一九一五年	九六	一四〇	—	—	一二三	—
一九一六年	一一七	一八八	—	—	一六〇	—
一九一七年	一四七	二六二	—	—	二〇四	一六八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三	三三九	—	—	二二五	一八八
一九一九年	二三六	三五六	—	—	二三五	一九九
一九二〇年	二六〇	五〇九	—	—	二八三	二〇一
一九二一年	二〇一	三四五	—	五三一	一八一	一四〇
一九二二年	一九六	三二七	—	五〇八	一五九	一三九

一九二三年	一九九	四一九	—	五一二	一六二	一四四
一九二四年	二〇七	四八九	一三七	五一二	一七四	一四一
一九二五年	二〇二	五五〇	一四二	五九六	一六七	一四八
一九二六年	一八〇	七〇三	一三四	六〇三	一五三	一四三
一九二七年	一七〇	六一七	一三八	四九五	一四八	一三七
一九二八年一月	一七〇	六〇七	一三九	四六三	一四四	一三八
二月	一七〇	六〇九	一三八	四六一	一四六	一三八
三月	一七〇	六二三	一三九	四六四	一四七	一三八
四月	一〇七	六二四	一四〇	四六四	一五〇	一四〇
五月	一七二	六三二	一四一	四六五	一五〇	一四一
六月	一七〇	六二六	一四一	四六二	一四七	一四〇
七月	一六九	六二四	一四二	四五三	一四五	一四一
八月	一七一	六一七	一四二	四五六	一四三	一四二
九月	一七四	六二〇	一四〇	四五八	一四二	一四三
十月	一七四	六一七	一四〇	四六三	一四二	一四〇
十一月	一七四	—	—	—	—	—
十二月	一七四	—	—	—	—	—

人口問題一面表現爲失業問題，同時又表現爲物價問題，失業的人已經不容易謀生，而又加以物價的抬高，那末自然會引起種種社會問題了。我們不看別的，只看中國，便可知道。到處有失業的遊民，到處感覺謀生的不易，我們雖然沒有統計，但一看這個現象，亦可知道人口問題在中國是有怎樣的重要性了。

現在已經有人欲用人口問題說明中國紛亂的原因了。他們以爲今日在中國搗亂的，只有二種人，一是政客，一是軍隊。有了政客，遂常常興風作浪，使軍閥們發生意見；有了軍隊，軍閥遂有作亂的工具。政客從何而生呢？是因爲士大夫階級的過剩而後產生的。軍隊從何而生呢？是因爲農民階級的過剩而後產生的。簡單說，就是因爲人口的過剩而後產生的。他們由這個思想出發，遂主張殖邊政策，產兒制限。

但是人口問題果然由人口本身發生出來麼？抑或有別的原因，而後人口才成爲問題麼？換句話說，果然因爲人口的過剩，而後才有失業的現象和物價的抬高麼？抑或先以別的原因，引起了失業的現象和物價的抬高，而後才感覺人口成爲問題麼？這個能夠解決，那末中國的問題以及對付這個問題的政策大約都有把握了。

第二節　馬爾薩斯的見解

我們一說到人口問題，就可聯想及馬爾薩斯，一說到馬爾薩斯，就可聯想及人口問題。人口問題幾乎與馬爾薩斯聯爲一體，不可分離。雖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是陳舊的學說，不足信用，但至今尚有權威，所以我在討

論人口問題之前，不能不一聽馬爾薩斯的意見。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以二個前提爲出發點。第一，人類欲保生存，必須攝取食物，第二，色慾是必然的現象，將來亦與現在相同。第一前提沒有說明的必要，至於第二前提，則其意以爲色慾乃人類最强的本能之一，不但過去與現在是很强烈的，就是在將來文化極進步的時候，其强烈也是一樣的，所以生殖能力由過去到將來都是一樣，沒有變更。

馬爾薩斯由這二個前提出發，而比較人口和食物的增加力。他先觀察人口，以爲就當時新殖民地的美洲說，在一世紀又半之中，每二十五年，人口都增加一倍。例如新英格蘭四州，在一六四三年人口僅二萬一千二百人，到了一七六〇年則增加爲五十萬。然在這個期間之內，由外部移住於這些地方的人，乃比較由這些地方移住於外部的爲少。新佐治亞每二十二年增加一倍，魯意斐爾蘭更短，此外尙有每十五年增加一倍的。但馬爾薩斯要使議論確實，乃以最長的二十五年爲標準，說道：

「如果人口沒有制限，則每二十五年當增加一倍，卽以幾何的級數而增加。」

這是馬爾薩斯的第一原則。

其次，食物的增加，是怎樣的呢？關於這一點，他的議論是不像人口那樣有實證的。但他已能認識「收穫遞減的法則」。他說：「改良不毛之地，是要用時間和勞力的。對於農業問題稍有知識的人，當能知道生產額雖隨着

耕種的進步而增加，但其增加乃是漸次減低的。」他以英國爲例，因爲英國研究農業學最盛，而未耕的土地又不少，然在這樣良好的條件之下，英國的生產又如何增加起來呢？若使假定生產額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大約是不算少的。但再二十五年之後，實在不能想像其能增加到最初的四倍。現在試退一百步想，假定每二十五年均能增加一倍。則「無論任何熱心的研究家，大約都不能想像比此更大的增加率，」他由這個考察出發，又說：

「由現在地球上普通狀態看起來，生產資料雖在最好的條件之下，其增加也不能比算術的級數更大。」

這是馬爾薩斯的第二原則。

若把這二個原則對照而觀之，則可生出可怖的結果。即據馬爾薩斯的見解，人口每二十五年乃以幾何的級數而增加，即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反之，生存資料則以算術的級數而增加，即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而四，現在爲說明便利起見，試把牠列表如次：

人口	一	二	四	八	十六	三二	六四
生存資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這樣的進行下去，在二世紀之後，人口與生存資料的比率當爲二五六與九之比，在三世紀之後當爲四〇九六與一三之比。四世紀之後，其相差之遠，更不堪設想了。

那末人口果然這樣增加下去麼？不，人類沒有食物是不能生存的，所以人口雖有不斷增加的力量，但增加

到食物所能養活的程度以上，就要停止。即人口的增加乃受生存資料的增加的制限。我們現在試研究上列的表吧。最初人口1若能利用生存資料1，保其生存者，則二十五年之後，人口2自然也可用生存資料2保其生存了。但再二十五年之後，人口又增加一倍而爲4，反之生存資料則僅增加爲3，於是人口雖有增加爲4的力量，然因爲受了生存資料的制限，亦只能增加爲3，其餘的1，非自始就不生產者，便當死亡而盡。生存資料是生存的基礎。3的生存資料只能養活3的人口，這是自然法則，無可逃避的。

但據馬爾薩斯的第二前提所說，色慾是必然的現象，將來亦與現在相同，因此，人口的制限也成爲必然的現象，制限的原因，在動植物是疾病與夭折，在人類則爲罪與禍。殺兒，墮胎屬於前者；饑饉，貧窮，疾病屬於後者；內亂則兼有二者的性質。

其後，馬爾薩斯又以道德的節制爲制限的原因之一。甚麼叫做道德的節制？是指人們如果不能養活妻子，就要停止結婚，而自保貞操。

在上述三個原因之中，如果一個原因不會發生作用，則其他原因一定發生作用，反之，如果一個原因最能作用，則其他原因又可停止作用。所以馬爾薩斯又說：從來人類社會所以常常發見罪與禍者，就是因爲沒有道德的節制。道德的節制既不存在，則由人口理論的結果，自然非生出罪與禍不可。罪與禍不是因爲社會制度的缺陷而後產生的，乃是因爲我們自己太過不守心而後產生的。所以救濟的方法不可求之於革命或改良，只可

求之於道德的節制。能夠利用道德的節制，而適當制限人口，那末由人口問題而發生的罪與禍，自然沒有存在的餘地了。即馬爾薩斯最後乃高唱道德的節制，以作救濟社會的根本政策。

我們以爲馬爾薩斯的理論是最能辯護有產者社會的。無產階級何以貧窮？因爲他們沒有道德的節制，他們沒有道德的節制，陷入貧窮之中，而乃欲用革命或改良以變革社會組織，這豈但是無理的事，而且絕對不能發生効果。他們應該一面節慾，一面坐聽有產者的搾取。

如果把馬爾薩斯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社會，那末，中國的內亂自然是中國人自取其孽了。中國人是最沒有道德的節制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是中國一般的倫理，「生育呵！生育呵！」是中國人一般的衝動，這樣地粗製濫造小國民，何能不陷入貧窮之中？既陷然入貧窮之中，而殺兒墮胎，饑饉疾病，又不能減少其人數，那末，內亂自然非發生不可了。即據馬爾薩斯的理論，中國的內亂，是因爲中國人沒有道德的節制，而後才發生的。

這個見解，我們能夠承認麼？

第三節　人口和生活資料的實際情形

我們現在先看各國人口到底是不是用同一速度而增加吧。原來人口這個東西在一定的文化以下，其增加率是微弱的，因爲衞生的設備既不周到，而醫學又不發達，生產固多，而夭折者亦復不少的緣故。到了文化進

步到相當的程度之時，人口便急激地增加起來。然文化如果再能進化，人類的生殖能力又復降低。所以人口并不是用同一速度而增加，即不是和馬爾薩斯所說的一樣，每二十年增加一倍，關此考茨基在其所著 Vermehrung und Entwicklung中曾舉各種統計說明，現在試抄譯如左：

「馬爾薩斯的學說何以失去勢力呢？……因爲自一八九〇年左右以來舊工業國的產兒率無不減少的緣故。

這個事情，可用下列統計以證明之。下列統計是對於人口每萬人而指示其每年的出生率的。

年份	英國	比利時	法國
一八四六——一八五〇年	三二八	二九〇	二六七
一八五一——一八五五年	三三九	二九〇	二六一
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	三四四	三一六	二六六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	三五一	三一八	二六七
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年	三五三	三二二	二五九
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	三五五	三二六	二五五
一八七六——一八八〇年	三五四	三二〇	二五三
一八八一——一八八五年	三三五	三〇九	二四七

八八六——一八九〇年	三一四	二九四	二三一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	三〇五	二九一	二二四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	二九二	二九〇	二二〇
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	二八一	二七七	二一三
一九〇六年	二七〇	二五七	二〇五
一九〇七年	二六三	—	一九七

看了上列的表，可知法國於一八七〇年之後，出生率已漸次減少了。十年後，出生率的減少，又發見於英比二個工業國了。

這個現象當然也發生於德國，德國每萬人每年的出生率如次：

一八五一——一八六〇年	三六八
一八六一——一八七〇年	三八八
一八七一——一八八〇年	四〇七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年	三八二
一八九一年	三七四
一九〇一年	三六九

一九〇二年	三六二
一九〇三年	三四九
一九〇四年	三五二
一九〇五年	三四〇
一九〇六年	三四一
一九〇七年	三三二

即在一八八〇年以前，出生率不斷地增加，一八七六年增加到絕頂，每萬人中有四百二十六人的出生。但這不過絕頂，過此以後，出生率又急激地減少了。

出生率的減少，在德國亦發見於猶太人之間。普魯士的猶太人每萬人中，其出生率如次·

一八八五年	二七一
一八九〇年	二三八
一八九五年	二一四
一九〇〇年	一九五
一九〇五年	一七六
一九〇六年	一八二
一九〇七年	一七一

這樣看來，可知出生率的減少，自一八八○年以來，乃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共通的現象，不但發生於歐洲，且又發生於美國及澳洲。

美國的出生率沒有統計，若把五歲以下的兒童與十五歲以上四十五歲未滿的婦女千人比較一下，則如次：

年次	
一八六○年	六三四
一八七○年	五七二
一八八○年	五五九
一八九○年	四八五
一九○○年	四七四

至於澳洲則十五歲以上四十五歲未滿的結婚婦女每萬人中所生的兒童如次：

年次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Queensland	New Zealand
一八八一年	三三六三	二九八四	三一六二	三一二二
一八九一年	二八八七	二九七七	三二七七	二七五七
一九○一年	二三五三	二二八六	二五四○	二四○一

由上表觀之，可知人口最稀薄的澳洲，也發生出生率減少的現象了。」

其次，再看各國的生活資料到底是怎麼樣的？ F. Varga 在其所著安定後資本主義沒落期的經濟，關於最重要的生產物有種種統計，現在試把牠轉載如次：（單位百萬，但金銀例外，表中如一九〇九——一三年，是指由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凡五年中的每年平均生產額）。

食料	面積及噸數	一九〇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小麥	面積（英畝）	七九、八	八三、三	八九、六	九一、八	—
	收穫（噸）	八二、二	八八、七	九〇、二	九一、八	九四、七
稞麥	面積（英畝）	一九、六	一八、三	一八、七	一八、二	—
	收穫（噸）	二六、一	二一、一	二五、六	二〇、四	二三、一
大麥	面積（英畝）	二三、六	二四、五	二五、五	二五、五	—
	收穫（噸）	二八、七	二七、六	三〇、九	二九、五	三〇、九
燕麥	面積（英畝）	四一、一	四四、二	四五、六	四四、一	—
	收穫（噸）	五二、一	五二、〇	五八、二	五三、八	五三、六
玉蜀黍	面積（英畝）	六九、九	七〇、二	七一、七	七〇、〇	—
	收穫（噸）	一〇二、九	一〇八、〇	一一三、六	一〇七、〇	—

米	面積(英畝)	四八、二	五三、六	五四、七	五四、三	五三、四
	收穫(噸)	七七、五	八三、二	八五、三	八四、六	八三、三
馬鈴薯	面積(英畝)	一二、四	一二、五	一二、四	一二、七	—
	收穫(噸)	一二八、六	一二八、八	一四三、六	一二〇、九	一四五、五
甜菜糖	收穫	六九、七	五七、〇	七三、二	六九、一	七六、八
蔗糖	收穫	九六、〇	一三九、〇	一六六、〇	一五九、二	一五七、三

紡織原料

類別	一九〇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木棉(噸)	四、八四	四、三三	六、〇	五、九九	四、四〇
羊毛(廷)	一、四六三、〇	一、二四九、〇	一、三二九、〇	一、四〇五、〇	—
蠶絲(廷)	二九、二	三八、二	四五、八	四七、二	—
人造絲(廷)	一四、一	四九、四	八七、〇	九九、五	一三〇、〇
橡皮(廷)	一一四、〇	三〇三、〇	五〇四、〇	六一八、〇	六〇四、〇

燃料

類別	一九〇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煤炭(噸)	一、〇九八、〇	一、一二六、〇	一、一八七、〇	一、一七七、〇	一、二八三、〇
煤油(桶)	三八五、〇	八六九、〇	一、〇六七、〇	一、〇九五、〇	一、二四八、〇

金屬

類別	一九〇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鐵(噸)	六八、三	五八、九	七六、九	七七、五	八五、〇
鋼鐵(噸)	六五、二	六八、四	九〇、八	九一、六	九九、一
銅(廷)	一、〇三〇、〇	一、〇一五、〇	一、四四三、〇	一、四九一、〇	一、五一〇、〇
鉛(廷)	一、一九四、〇	一、〇八四、〇	一、五二四、〇	一、五八七、〇	一、六四三、〇
亞鉛(廷)	九七六、〇	七六〇、〇	一、一三二、〇	一、二四九、〇	一、三〇〇、〇
錫(廷)	一三三、〇	一一八、〇	一五〇、〇	一四七、〇	—
鉛(廷)	六三、〇	一二二、〇	一七九、〇	二一一、〇	二一三、〇
金(單位千廷)	七六八、〇	五一五、〇	五九三、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銀(單位千廷)	六、九六四、〇	六、四六七、〇	七、五一四、〇	七、四五四、〇	七、四五四、〇

由此可知各種生活資料乃是年年增加了。

E. Varga 又把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二六年的世界人口，比較如次(單位百萬)

洲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一三年的比率
歐洲	四六七、九	四七七、六	二、一
北美及中美	一三三、五	一五七、五	一七、九
南美	五六、五	六九、七	二三、五
亞洲	九八六、七	一、〇三七、九	五、二
非洲	一三四、二	一四三、三	六、八
太洋洲	七、七	九、〇	一七、八
合計	一、七八六、五	一、八九五、〇	六、一

一面人口的增加率已經年年減少，同時生活資料的生產力又天天提高，然而何以尙有人口問題呢？於此，我們便當觀察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

第四節　資本主義與人口問題

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以營利爲目的的，他們營利的方法大約如次。就是資本家用一定的貨幣，(G)購買生產手段(Pm)和勞動力(A)的商品(W)，經過了生產行程，變成新商品(W')之後，更販賣出去，而收回

比較資本更多的貨幣（G'＝G＋g）。所以資本家營利的方法，可歸納爲下列的公式：

G（元本）—W $\begin{cases}\text{Pm（生產手段）}\\ \text{A（勞動力）}\end{cases}$ ……生產行程……W'（新商品）—G' $\begin{cases}\text{G（本元）}\\ \text{g（利潤）}\end{cases}$

在這個公式裏面，現在成爲問題的，則爲 Pm 與 A。Pm 是投於機器原料的資本，叫做不變資本：A 是投於勞動力的資本，叫做可變資本。在這二種資本之間，乃有一定的比例關係，前者增加，後者亦須增加；前者減少，後者亦須減少。比方現在有一位資本家，他有十萬元的資本，他把其中四分之三投於不變資本，四分之一投於可變資本，那末這個時候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率爲三與一之比。其後資本家又增加資本二萬元，則在這個二萬元之中，亦須把四分之三投於不變資本，四分之一投於可變資本，所以不變資本愈增加，可變資本亦必隨着而增加。

但是技術是不斷地進步的，技術進步的時候，人類的勞動生產力亦見增加。這時候，人們可用較少的勞動力以運用較多的生產手段，由是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率亦不能不變更了。比方人類的勞動生產力如果倘甚幼稚，在總資本六百之中，當以三百投於不變資本，三百投於可變資本，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比率爲一與一，那末這個時候，若欲把三百人的勞動者增加爲六百人，只須增加總資本一倍即可。反之，人類的勞動生產力如果已經進步，此後在總資本六百之中，當以五百投於不變資本，一百投於可變資本，即不變資本與可變

資本的比率爲五與一，那末這個時候，資本若不增加，則須解雇勞動者二百人而只留一百人充用，反之，若欲把三百人的勞動者增加爲六百人，則在事實上非把總資本由六百增加爲三千六百不可。所以技術愈進步，則可變資本愈少，不變資本愈多，前此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比率爲一對一，現在則漸次變爲一對二，一對三，一對四，一對五，一對六，一對七了。換句話說，技術愈進步，則資本家投資於勞動者方面的，漸次變爲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七分之一，八分之一，反之，投資於生產手段方面的，漸次變爲三分之二，四分之三，五分之四，六分之五，七分之六，八分之七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投於勞動力的資本，由勞動者方面說，便是有了職業，有了生活資料，所以投於勞動力的資本愈少，則失業的人愈多。這個失業的勞動者叫做勞動預備軍。勞動預備軍的存在，對於資本家方面，是有很大的利益的。何以呢？現代市況的興衰，是沒有一定的。資本家須應着市況的興衰，時或擴張生產，時或收縮生產，所以雇用勞動者的人數，亦須時或增加，時或減少。然市況旺盛的時期很短，大抵不過數月，長者亦不到一年，所以資本家要想增加勞動者的雇用，絕對不能坐待勞動人口之自然的增殖，須於平時預先有勞動預備軍的存在。如是，則在擴張生產的時候，可於勞動預備軍中，召集所必要的人員；收縮生產的時候，又可送還不必要的人員於預備軍之中。這種預備軍愈多，則資本家要臨時擴張生產，愈可不必提高工錢。

這樣看來，失業問題並不是因爲人口之絕對的過剩而後發生的；反之，人口問題卻是因爲資本主義的社

會有了缺陷而後發生的。至於物價問題亦可歸咎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原來現代的資本主義已由自由競爭進爲獨占的階段。在自由競爭之下，一切貨物都受市場的支配，而表現爲市場價格。在獨占之下，一切物價不受市場競爭的影響，而可自由提高。萬一供給過多，則他們甯願把貨物焚毀，或沈於海中。這樣一來，物價天天抬高，自然是勢之必然了。

最後，人類的生存資料，最重要的是農業，然農業在資本主義之下，實在不容易發展。關此，考茨基在各種著作之中，已有詳細說明，現在只把其大旨摘錄如次：

「第一妨害農業的發展的，則爲地租。地租何以會使農業陷入窮途呢？在資本主義社會，農業者欲取得土地的私有權而經營之，必須用其大部分的資本購買土地，即當用其農業資本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購買土地。至於眞能投入於生產過程的資本，則不過極少部分而已。因此，在這個場合，經營遂變成小規模，又變成非集約的，不過在實際上肯用這樣多的現款購買農地者，卻是很少的事，大半都是抵押借金。這樣一來，土地的買主當用利息的形式，把地租給與債權者，所以債權者乃是土地所有主，而農業者在實質上乃與佃戶無異。然則佃戶又復如何？佃戶對於地主當支給佃租。佃戶所得的收穫，除去工資，還卻資本的普通利潤之外，多下來的一切剩餘，都包括在這佃租裏面。一國的佃戶年年交給地主的金額是很大的。得了這個金額的地主，則不使用於農業的改良，而祇空白地花費，或是用以購買工業股票，由是佃農制度遂由農業界中奪去能

夠增大生產力的資本了。不僅此也，由佃戶方面觀之，佃租契約期間愈短，則必不肯設法維持地力，只求各種耕作方法能夠由土地之上得到最大的利益。如果有人願意投資改良土地，然在佃租契約改訂的時候，那與土地合體的改良就變成與土地不可分離的偶生部分，而歸於地主所有。因此地租無論在自耕經營的場合或在佃農經營的場合，都可成爲農業發展的障礙。

第二是繼承制度，因爲有了繼承制度，而實行有產者的平等繼承法，致繼承地不能不細分的緣故。縱令在繼承權者之中只惟一人繼承其全部土地，不再分割，然該繼承人對於共同繼承權者亦須用金錢賠償他人所應得的部分。可惜他們大約是沒有現金的，因此，不能不抵押其繼承地，向人借債，由是他們的境遇亦與上述的陷入抵押負債的自耕農相同了。

第三則爲都市搾取農村，都市常用佃租，利息，租稅的形式，搾取農村。農民的負担漸次增加，然在佃租，租稅及利息之中能夠消費或蓄積於農村者，不過極小部分，其他大部分則皆流出於都市，而且日益增加起來了。農民所生產的價值，竟然沒有甚麼對價，日益流出於都市，那末，農村自然要感覺資金的缺乏了。

第四則爲農村人口的減少。一切文化關機和娛樂機關都集中於大都市，而都市又瀰漫自由的空氣。反之，農村則過於單調，而且沒有甚麼設備，可以慰勞農民生活的悲愁，所以他們每每羨慕都會生活而移住於都市。何況逃亡的人又是身體健壯，知識發達，卽對於農業的發達極其必要的人們呢？

第五是工資勞動者制度工資勞動在形式上雖是自由，其實還是一種强制勞動。在這一點上，工業雖與農業一樣，但工業勞動者乃密聚在一個工廠之內，各做一定的工作，所以容易監督他們，而且做出來的結果，又能精細地檢查測定。反之，農業則不然，農業勞動者乃分散在很大的地面工作，而且又須時時變換其工作的種類和地點，所以要想監督他們，實在不是容易的事。何况農業勞動的品質，大多都是不能明瞭判斷的，所以監督農業勞動，差不多可說是不可能。」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實在可以阻礙農業的發展了。農業既然不能充分發展，食糧自然要減少下去，於是物價問題遂因之而生。

第五節　中國的人口問題

上面所述的理論不但可以全部應用於中國，并且中國的人口問題更是因為受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後造成的。何以呢？在經濟先進國產業革命是漸次進行的，換句話說手工業的崩壞是漸次發生的，因此，資本主義一面雖然破滅了手工業，但同時又可把失去地位的手工業者收容於工廠之中，所以在資本主義方才發生的時候，絕對不會發生人口問題。反之，中國當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尚未侵入以前，其經濟乃是「亞細亞的生產形式」，就是「農業與手工業的統一」。當此之時，紡織是農家的副業，農家只惟依靠副業的紡織，

而後才能維持其一家的生計。如果由農家奪去紡績，則農民的生計便難維持，從而農村亦當破壞。然自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以來，這種現象果然發生了。

帝國主義者最初是用甚麼東西與經濟後進國通商呢？不消說，是用輕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的。手工製造的紡織品何能與機器製造的紡織品爲敵，自然要由敗北而至於消滅，這樣一來，豈但市城的手工業者失去職業，便是農民也要因爲副業被人剝奪，而陷入貧窮之中。

他們既然陷入貧窮之中，他們能夠逃出農村跑到都市討生活麼？不能，因爲帝國主義者是用商品侵略中國，不是用工業侵略中國，所以在都市之內，不但中國的工業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不能發達，就是帝國主義者自己的工業，也不存在於經濟後進國的都市。到處看見新式的商品，到處看不見新式的工廠，他們那裏有謀生的地方？

經濟先進國的手工業是漸次崩壞的，而且崩壞了之後，尙有工廠可以收容一部分的無產者，反之在經濟後進國，則手工業乃於一舉之下，忽然崩壞的，崩壞之後，又沒有工廠可以收容他們，所以經濟後進國的人口過剩，常比較經濟先進國爲厲害，弄到結果，這些無數的失業者非淪落爲盜賊乞丐土匪不可。

原來帝國主義者把經濟後進國變爲自己的殖民地的時候，一面爲了販賣商品起見，雖然要摧殘殖民地的工業，但同時爲了收集原料起見，又不能不設法整頓殖民地的農業。日本對於台灣，改良甘蔗的栽培，對於朝

鮮，改良五穀的耕種，英國對於印度，力謀棉花和小麥生產的增加，便是一個例子。因此，殖民地的人民，在都市失了職業，尚可跑到農村，爲工資勞動者。如果帝國主義者侵略殖民地的形式，能夠由商業資本主義進化爲工業資本主義，那末，在殖民地的都市中，亦可發見了帝國主義者的工廠，這個時候，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自然更有就職的機會了。我們不看別的，只看印度，便可知道。英國對於印度本來是禁止其工業化的，所以印度的木材，必送到太晤士河畔，建造船舶，印度的棉花，必送到曼徹斯特（Manchester）紡織紗布。然到了大戰之後，英國對於印度的政策已經變更了。即不但許印度振興輕工業，且又許印度振興重工業——固然企業家差不多都是英國人，但此由無產階級觀之，實在不成問題。——下列的表，可以證明印度工業發展的迅速。

第一表　煤炭（單位千噸）

生產及消費	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每年平均）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六年
生產額	一三五〇九	一六二〇八	二二六二八	一九九六八
輸入額	四三四	六五四	六八	四八三
輸出額	七九五	八八一	一四四	二二九
消費額	一三一四八	一五九七一	二二五五二	二二二二一

第二表　大工業（單位千）

工廠及工人	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二四年
工廠數	二、二	二、九	三、五	六、四
工人數	七〇五、九	九五一、〇	一二七一、五	一四二五、五
男工	六一九、〇	七四六、八	九二七、六	一一四七、七
女工	一一四、五	一四四、二	一七七、四	二〇五、三
童工	五二、四	六〇、〇	六六、五	七二、五

第三表　鐵與鋼的生產額(單位千噸)

產物名稱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鐵	二〇七	三一六	八九一	八九四	九二七
鋼	三二	一五九	三四〇	四五八	四五七

第四表　纖維工業

工廠及產量	一八九九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四年
工廠數	一六七、〇	二一八、〇	二三八、〇	二四九、〇	二四五、〇	二七四、〇
綻子(單位千)	四五五〇、〇	五六六二、〇	六三二〇、〇	六五六三、〇	六八四六、〇	七八六一、〇
織機(單位千)	三八、〇	六六、〇	九二、〇	一一六、〇	一二四、〇	一四六、〇

生產額紗	五一四、〇	六五八、〇	六八三、〇	六一五、〇	六九三、〇	七一九、〇
布(單位百萬磅)	一〇二、〇	一九二、〇	二七四、〇	三四九、〇	四〇三、〇	四五九、〇
紗輸出	二四四、〇	二四二、〇	二〇七、〇	七三、〇	八八、〇	四六、〇
布輸出(單位百萬碼)	一一二、〇	一一三、〇	一三〇、〇	一八七、〇	一八七、〇	二三〇、〇

中國不是一國的殖民地，乃是各國的殖民地，由各帝國主義者互相牽制的結果，遂致任何一國都不能單獨參與中國的內政，因此中國的農業遂無人整理了，而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工廠亦不能發達了。既然受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而又不能霑潤帝國主義者的餘唾，中國人口自然愈益過剩了。

不但此也，帝國主義者侵略經濟後進國，既然一面要販賣生產物，同時要收集原料品，那末中國農產物雖甚幼稚，自然也不能不輸給帝國主義者了。大豆，棉花，高粱，米，麥，茶葉，便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大宗。

於此，我們就可看出一種奇怪的現象，一面物價天天抬高，細民幾乎不能生活，同時農產物又源源輸出於外國，這是因為甚麼理由呢？是營利經濟的結果！質言之，就是買辦階級用廉價採集農村的生產物，運到外國販賣，由此而得到巨大的利潤」考茨基在其所著 Vermehrung und Entwicklung 中曾述愛爾蘭的現象如次：

「舊工業國欲發展其工業的資本主義，必須不斷地擴張世界市場，換句話說，必須把現代工業的大量生產物賣給從來在世界市場以外的國家，這樣一來，該國的工業就見破壞，然同時農業生產乃帶有商品生

產的性質，而出現於市場。他們欲用最小的努力，由土地中，得到最大的收穫，乃用暴亂的耕作方法，終而使地力枯竭。

資本主義國的工業品，若使有了交通機關，而容易輸入於農業國，那末農業國的過剩勞動力，亦必輸入於資本主義的工業國。由是移住遂流行了。這好像農業國的人口已經過剩，住民不能生活，但豈知這個國家卻是輸出食糧的國家呢！一八四〇年左右的愛爾蘭便是一個例子。當時愛爾蘭的人口，是過剩的，所以當移民於國外，但同時食糧也輸出於國外。這個現象，現在還是一樣的。愛爾蘭的人口如次：

一八〇一年	五、三九五、〇〇〇
一八四一年	八、一九七、〇〇〇
一九〇一年	四、四五九、〇〇〇
一九〇八年	四、三六三、〇〇〇

請看自本世紀初頭以來，人口已經減少吧！若與人口最多的一〇八四一年比較，幾乎減少一半了。然愛爾蘭尚感覺「人口過剩」，愛爾蘭的青年，每年出外做工者極多，但同時食糧又源源輸出於英國，這不是矛盾的現象而何！

的確是矛盾的現象，現在中國也是一樣。不過愛爾蘭是白種，白種有移住於美洲及澳洲的權利，中國人是

黃種，黃種沒有移住的權利，所以愛爾蘭的過剩人口，尚有解決的方法，反之，中國人口的過剩則完全沒有辦法。

中國人口問題所以發生，中國人口在最近數十年來所以愈益成爲問題，大約如上所言。